

文博信息



3

总 24 辑
2005 年第 3 辑

Three

INFORMATIONS OF HERITAGE AND MUSEUM

采集自互联网的最新资讯
欢迎进入首都博物馆网站浏览
www.capitaimuseum.org.cn

首都博物馆
资料信息研究中心 编 印

目 录

2005 年 第 3 辑 总 24 辑

博物馆

- 北京：“国际博物馆日” 顶级文物专家为市民鉴宝(1)
- 故宫博物院首次招聘志愿者 加强宣传力度(1)
- 国博“克隆” 30 件馆藏珍宝(1)
- 百封家书精品将入藏国博(2)
- 首都博物馆新馆亮相：为现代与历史融合(2)
- 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闭馆布展 8 月 15 日正式开放(3)
- 颐和园大修 11 处建筑内发现辟邪“镇物”(3)
- 内蒙古博物馆新馆奠基在呼市举行(4)
- 中国首家辽墓博物馆在赤峰市南山生态园建设(4)
- 甘肃定西市拟全面整合利用馆藏文物资源(5)
- 殷墟博物馆破土动工(6)
- 湖北省十堰市政府投资近 4000 万建设市博物馆(6)
- 长沙杜甫纪念馆 5 月 1 日将建成开放(6)
- 曲阜将建“海外中国文物回归博物馆”(7)
- 杭州：西湖博物馆、严官巷南宋遗址国庆开放(7)
- 无锡耗巨资整治古运河 打造古运河“露天博物馆”(8)
- 中法联合主办的中国博物馆高级管理人员 2005 年培训班第一期即将开课(8)
- 以色列举行大屠杀纪念馆新馆落成仪式(8)
- 英国的独立博物馆(9)
- 国外博物馆与文化遗产财税政策撷英(9)
- 博物馆陈列工作的几个观念问题(10)
- 戏剧表演与英国博物馆的教育功能(12)

考古与文物

- 国家文物局启动 2005 年度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课题申报工作(14)
- 北京将于 2008 年前修缮近 300 个文物项目(15)
- 北京“人文奥运”文保工程一开工一竣工(15)
- 北京今年投入 2 亿元资金推进“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16)
- 故宫百年大修探秘：上漆不用刷 工艺祖孙传(16)
- 《清明上河图》将“住”进高科技展柜(17)
- 北京国子监孔庙古建筑群大修 将恢复原生态环境(18)
- 北京先农坛挖出国宝级文物 尚有四大谜团未解(18)
- 北京石景山区发现由纪晓岚、刘罗锅（墉）撰写的墓志(19)
- 北京房山云居寺唐代古井出土千年石经及辽代碑刻(19)
- 地坛建国后最大一次整修 力图恢复 475 年前原貌(20)
- 2004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揭晓(20)
- 山东：中日文物专家联合考察胶东史前稻作农业(25)
- 平遥古城墙修复工程展开 全部采用传统工艺(25)
- 西安启动“皇城复兴”计划(25)
- 布达拉宫壁画修复工程复工(26)
- 丹凤发现宋代八卦全井墓葬 外观呈金字塔形(26)
- 昭陵考古有新进展 唐代皇陵寝宫气势宏大(27)
- 安徽凤阳明中都皇故城遗址修缮工程全面展开(27)
- “国宝”文澜阁将恢复原貌 藏书楼现状仍堪忧(27)
- 秦阿房宫“烽火台”验明“正身”实为“皇家公园”观景台(28)
- 山西绛县西周墓地考古有重大发现(29)
- 山东济南郎茂山路发现元代家族墓(29)
- 河北宣化发现一处汉唐墓群(30)
- 考古证明清江流域是人类起源地之一(31)
- 河南郑州商城遗址保护首引民间资金(32)
- 全国首家木质文物保护基地落户湖北(32)
- 重庆大足石刻防风化保护取得成功(33)
- 重庆万州大坪发现东周巴文化墓群(33)
- 江西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考古发掘又有新收获(34)
- 江苏淮安市中心发现六朝家族墓(36)
- 无锡越国贵族墓改写中国制瓷史(36)
- 中美加强文物保护合作(37)
- 埃塞俄比亚国宝阿克苏姆方尖碑回归故里(37)
- 德科学家利用硅酸脂保护天然石材文物(38)
- 文化沉淀与中国文物保护现状(38)
- 以“镜”为主题的沟通——由汉阳陵文物在挪威斯塔旺哥市的展出引起的思考(40)

历史研究

楚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影响(42)

“巫术时代论”影响下的中国古史研究(45)

近现代北京城乡关系研究(45)

文化资讯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规定降低旧城人口密度(49)

全球最大的中华古籍全文数据库“国学宝典”开通(49)

西安规划恢复古都风貌 新城古城实行“分治”(49)

深圳市政府确定今年为“文物保护年”(50)

海峡两岸及香港专家在港纪念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50)

2005 年申报世遗项目巡礼：走近“澳门历史建筑群”(5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利用宇航技术保护世界遗产(52)

“欧亚非考古与文明系列讲座”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举行(52)

印度开始测量泰姬陵尖塔最新倾斜度(52)

『名城』岂能『创』出来(53)

展览动态

《光凝秋水——清宫造办处玻璃展》在永寿宫开幕(55)

《太阳王路易十四——法国 凡尔赛宫珍品特展》(55)

揭开“舍利”谜底 国宝重器“五一”光耀世纪坛(55)

大型艺术展览《激醒——中法艺术的碰撞与融合》在京举办(56)

“2005 毕加索北京艺术大展暨毕加索时尚艺术季”在京展出(56)

“国际华人诗书画印艺术大展”在京举行(56)

文博法规

文物拍卖管理暂行规定(57)

首博动态

首都博物馆 3 月—4 月动态(59)

首都博物馆新馆工程进展(60)

欢迎进入首都博物馆网站浏览

<http://www.capitalmuseum.org.cn>

北京：“国际博物馆日” 顶级文物专家为市民鉴宝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从“五一”黄金周开始北京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邀请国内顶级文物鉴定专家为市民鉴宝。今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在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举办文物鉴定咨询活动。

文物鉴定咨询活动由故宫博物院鉴定专家叶佩兰、单国强，市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张茹兰，首都博物馆原馆长马希桂等在京的多位著名文物鉴定专家为市民鉴定书画、瓷器和其他类别的文物藏品；仅向市民收取每件不超过20元的文物鉴定咨询费。

据悉，自5月16日早9时开始主办单位

提前在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门票售票处发放“文物鉴定咨询号”，书画、瓷器、杂项文物三项每项100个“文物鉴定咨询号”，共300个号，发完为止。

往年“国际博物馆日”开展文物鉴定活动时，总是门庭若市。许多北京市民及外省市群众携带自己的收藏品前来鉴定，有一些收藏品被鉴定为珍贵文物，但也有一些市民从市场上花费几万甚至几十万高价购买的“文物”，经鉴定却往往是赝品，而且，这个比例高达九成以上。

（北京晚报）

故宫博物院首次招聘志愿者 加强宣传力度

为充实和加强故宫博物院的宣传教育力量，提高服务质量，提升服务效果，增强故宫知识和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力度，故宫博物院首次招聘志愿工作者工作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情支持，共收到1300余份应聘者简历，有在校大学生、在职人员以及退休的老同志。经过面试和笔试，共有286人通过测试。故宫博物院组织专家对测试合格者进行了岗前、展览问询和交流性讲解等

方面培训。预计，经过培训合格的第一批志愿者将在今年3月份正式上岗，利用个人业余时间到故宫珍宝馆、钟表馆、石鼓馆和戏剧馆等专馆为观众进行义务讲解和咨询等服务。故宫将积极探索，认真总结经验，更好地把这项借助社会力量，充实专馆讲解力量、丰富宣传教育方式和手段的工作做好，使志愿者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更好地服务于观众。

国博“克隆”30件馆藏珍宝

包括唐伯虎、郑板桥等书画名家在内的20幅国博馆藏书画，涉及清朝三代的10种国博馆藏名瓷昨天出了“克隆版”。国家博物馆依照这些馆藏文物精心限量仿制出了一批绝版国宝级文物，花30余万元人民币，就可完整收藏一套。据悉，这些国宝仿制品的发行工作于4月8日在国博举行。

20幅被仿制的古画均为我国元、明、清三代蜚声中外的绘画大师作品，最为珍贵

的是元四家之首倪瓒的代表作《水竹居》。10种被仿制的古瓷器是从中国瓷都景德镇定作的珍品，均为国家一级文物，年代涉及清朝三代。

据悉，像国家博物馆这样以当代官窑、当代御画院的方式推介国宝仿制品，这在国内还是第一次。这20幅古画、10种古瓷器每件作品绝版仿制100件，每件均有绝版编号并配有国家博物馆收藏证书。《北京晨报》

百封家书精品将入藏国博

抢救民间家书项目在京正式启动。活动发起单位国家博物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遗产抢救工程办公室等将面向海内外公开征集散落在民间的中国家书。所有应征家书将捐赠给正在实施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其中经过专家评选的 100 封“最具价值的优秀家书”将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家书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民间文化的组成部分，是集文学、美学、书法、礼仪、邮政、包装、纸张等文化于一体的综合载体。千百

年来，家书承载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血缘文化，维系着人间的亲情，也真实地记录了时代的变迁。然而，家书本身所具有的私密性和现代通信方式的变革使传统家书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家书这一传承千年的优秀民间文化遗产正面临着悄然消亡的命运。费孝通、季羨林等数十位文化名人近日向海内外炎黄子孙发出倡议：留住家书，抢救家书，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添砖加瓦。

（人民日报）

首都博物馆新馆亮相：为现代与历史融合

春天的阳光洒在北京市重点工程首都博物馆新馆的建筑上。站在木樨地的长安街西延长线边打量已经“剥”掉围挡的首博新馆，悬挑的大屋顶气度不凡，点挂式玻璃幕墙晶莹透亮，而一座锈迹斑驳的巨大青铜鼎竟然破墙而出，斜倚在幕墙上，现代与历史融合在一起。

负责指挥进行精装修施工的建工集团首博新馆工程经理部的臧红星，兴致勃勃地带着记者参观。围着总建筑面积 61680 平方米的首博新馆的外墙走上一圈，除了那个破墙而出的青铜鼎，记者发现新馆的外立面并不“整齐划一”，它的北面 and 东面是点挂式玻璃幕墙，西面是木板幕墙，而南面是仿古石板砖幕墙。看上去，玻璃幕墙炫目，木板幕墙古朴，而仿古石板砖幕墙透露出凝重。臧红星说：“这个木制幕墙使用的是防虫、防腐、防火处理的材质，那种仿古石板砖幕墙也不一般，石块大小和长城城砖一模一样。”

再看新馆南墙，嵌在仿古石板砖幕墙上的一横列玻璃窗，似乎窗框的大小也不统一匹配，有何奥妙玄机？臧红星乐了，“这些窗户开得挺有讲究。你站远点再看……”原来，不同大小尺寸的窗框在幕墙上组成了一组组“乾、坎、艮、震、巽、离、坤、兑”的卦形图案。

首都博物馆新馆既是收藏展示古代、近代文明的场所，又是展示今日北京城市形象

的窗口。新馆的设计匠心独具，既有现代建筑元素，又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

如今，首博新馆的土建部分已经完成 95%，预计本月中旬土建部分即可完工。虽然首博新馆的外观已经气派地亮相，但走进馆内，却仍是一片忙碌的施工景象。

首博新馆内部虽然只能看出个“大模样”，但记者发现两个大型展厅设计得别具一格，两展厅都有五层，一个酷似早年间老辈人放置私物的“木匣”，另一个简直就是个青铜鼎。询问之下才知道，那个长方体的巨大“木匣”，是未来的现代史、近代史和北京民俗民风展馆，而那个青铜鼎是个专题展厅，首博新馆北面外墙破墙而出的就是这个展厅巨大的“一角”。记者走进“青铜鼎”，发现它有 16.75 度的倾斜，沿着“青铜鼎”的内墙铺设设有盘旋而上的环形坡道，可以引人一直登顶，从容仰视、平视或俯视巨大的展厅。

种种独特的设计都有来历和寓意——倾斜的“青铜鼎”破墙面而出，是在表现文物发掘；悬挑的大屋顶演绎了中国传统的“出檐”设计……

作为北京市重点工程，首博新馆不仅建筑表现形式丰富多彩，还采用了许多新技术用于文物的保护。新馆的天花板上有一些小圆点，臧红星说，“这是开天窗用的。这里的天花板可以像百叶窗似的开天窗。”原来，新馆内的轻钢屋架中央部分可以一片一片地打

开，覆在上面的玻璃窗也可以一片一片地翘起……无疑，新馆可以用最“亲近自然”的

方式通风换气。按照计划，首博新馆将在 10 月建成并具备开放条件。（北京青年报）

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闭馆布展 8 月 15 日正式开放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为组织好有关纪念活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于昨天闭馆，进行重新布展及部分设备设施改造。根据纪念馆发布的公告，该馆计划于 8 月 15 日正式对外开放。

据了解，改造后的纪念馆基本陈列将力图突出以下四大特点：一是全面反映中国抗日战争——这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斗争中第一次取得彻底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二是深刻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三是充分展现中国在抗击法西斯侵略的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四是大力弘扬抗日战争中体现出来的伟大民族精神，努力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

诚团结和艰苦奋斗的崇高品质。

据透露，纪念馆除了对馆藏基本陈列进行重新设计外，还将采用一系列新材料和科技手段对馆内展示设备进行升级换代。此外，纪念馆还将补充一些从未展示的抗战新文物。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落成于 1987 年，1997 年 7 月曾进行过一次大规模改造。据统计，纪念馆自建馆以来已累计接待国内外观众 1200 余万人次，其中 70% 为中小学生。1997 年整改后，经过 7 年多无休息日的对外开放，已累计接待观众 450 万人次。目前基本陈列的形式和内容显得陈旧，已不能满足国内外观众了解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要求。

（中新网）

颐和园大修 11 处建筑内发现辟邪“镇物”

玉石、五彩布、铜钱、元宝等大批神秘物品近日纷纷在皇家园林颐和园大修工程中被发现——昨天，记者独家获悉：这些藏于大殿外正脊下的物品就是被封建时代视为具有辟邪功能的“镇物”，对于颐和园来说，这是第一次发现。

颐和园“镇物”首次亮相

11 处古代建筑内发现“镇物”

对于此次“镇物”的发现，颐和园管理处文物科的秦雷表示，这是第一次发现，原来并不清楚还有“镇物”。即使在 1953 年颐和园大修时，也没有发现“镇物”，而且在颐和园的有关资料内也没有关于“镇物”的记录。

此次在颐和园大修工程中，共有 11 处古代建筑内发现“镇物”，它们的藏身之处都位于主殿后配殿的屋脊正中间部位，外面覆盖琉璃瓦，如果不进行落架大修，根本无法发现“镇物”的踪迹。

在 11 处“镇物”的发现地，有两个地点的“镇物”比较完整，即排云门和玉华殿，两处地点的“镇物”完全一致，包括 5 枚金属钱、5 块各色石块、2 个金属元宝、2 柄金属如意以及一些破损彩色布条等。

但是在目前已经落架修缮的古建中，有两处古建内没有发现“镇物”，如芳辉殿和二宫门，这让颐和园文物研究部门颇感费解。

宫廷建筑“镇物”源自民间

民间盖房就有抛元宝做法

“宫廷内建筑使用镇物，大概是受到了民间的影响。”颐和园副园长高大伟认为，中国传统建筑有科学的方面，但也有迷信、神话的一面，如“镇物”就是。中国历史上对于房屋建筑都是格外重视的，因为这是子孙、家族传承遗产的载体，古代著作《黄帝宅经》、《木经》、《鲁班经》及《营造法式》等都有相关记载。

民间盖房上梁时有悬挂“上梁大吉”字

条、抛元宝等等祈求平安的方式，这也算是一种“镇物”形式，表达了对吉祥、美好事物的追求，同时期盼驱利(利器)避害。皇家宫廷建筑也应受到了民间的影响，这应属于一种历史文化现象。

一般来说“镇物”多存放在建筑本身的核心部位，如大梁、角梁等承重木结构，都是建筑的核心，如果这些地方出现糟朽，肯定会影响到建筑的安全，因此在这些地方放置“镇物”，自然有祈求平安的意思。

颐和园“镇物”将归原位

仿制“镇物”以备研究使用

高大伟表示，随着颐和园大修工程的进展，已经被取下的“镇物”将全部放归原位，这是为了保持世界文化遗产、皇家园林的完整性。可能会将一些有代表性的“镇物”进行复制或仿制，将信息进行留存以备研究时使用。

此次大修后，如果等到下次大修至少需要数十年或上百年(正常状态下)，因此现在留下信息可以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依据，避免

产生因历史信息遗失，而无法让后人传承文化遗产。

谈到“镇物”，高大伟认为，故宫及颐和园这些皇家建筑的角兽也算是一种“镇物”。他还估计，颐和园的3000间建筑内，大约都存放着“镇物”，但是数量、等级可能有所差别。

马尾丝为何成为“镇物”

古代“镇物”带出四大谜团

尽管有专家进行了解释，但是仍有一些问题让人不能得知准确答案，记者整理了一组“镇物”的谜团，高大伟也希望社会各界人士，如果有关于这些“镇物”的详细知识，可以告知颐和园管理处或拨打本报热线电话96101。

谜团一：颐和园不同建筑“镇物”等级、数量为何不同？

谜团二：为何有的大殿无“镇物”？

谜团三：马尾丝为何成为“镇物”？

谜团四：不同“镇物”都有什么象征意义？（来源：《北京晨报》）

内蒙古博物馆新馆奠基在呼市举行

4月18日上午，内蒙古博物馆新馆奠基开工典礼在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隆重举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光林、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乌兰，以及广大建设者、文博工作者欣喜地参加了奠基仪式。

内蒙古博物馆新馆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总高6层计49米，位于呼和浩特市东二环路机场元与花园交叉处，包括陈列展览

区、科研区、行政办公区、多功能厅等，预计于明年10月竣工，2007年8月投入使用。届时，将以传统的民族历史文物精品展览，来迎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大庆。共同开工的还有内蒙古体育馆、大剧院，统称为“内蒙古文化体育三大重点工程”。

（中国文物报）

中国首家辽墓博物馆在赤峰市南山生态园建设

中国首家辽墓博物馆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南山生态园建设，投资100多万元的一期工程——辽庆陵中的永庆陵复原工程，经过约半年时间的建设于近日完工。

该博物馆主要展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辽代考古发现的精华。博物馆将对13座辽代壁画墓进行复原，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其余12座壁画墓的复原将于2006年开工，

预计全部工程将于2010年完工。一期工程辽庆陵中的永庆陵按原比例复原，一共有7个室、600多平方米。辽永庆陵的壁画、辽圣宗的两个皇后的哀册，辽圣宗和两个皇后的梓宫，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据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理事张松柏介绍，由于辽代壁画破坏严重，残缺不全，所以在复原的过程中，以1939年日本考古学

家田村实造、小林行雄对辽庆陵的临摹为蓝本进行复原。

辽墓博物馆壁画中最精彩的是“四季捺钵”的场面，在中主室里一共绘了4幅，采用中国画的工笔重彩，非常形象的表现辽圣宗四季游猎的场景。“四季捺钵”图出自辽代宫廷画家之手，是扛鼎之作。此外，还复原了3方辽圣宗和两个皇后的哀册。“哀册”的内容，主要是论定死者生前的功绩等。辽庆陵“哀册”呈墓志形状，分别镌刻契丹、汉

两种文字，每方近2000字，3方“哀册”填补了辽圣宗和两个皇后在历史上记载的不足。从916年太祖耶律阿保机创建辽朝起，到1125年天祚帝逃往西夏途中为金兵追获为止，辽代在历史上存在了210年，历经9个皇帝。辽庆陵埋葬的是辽朝第六、七、八三代皇帝及其后妃，位于赤峰市巴林右旗大板镇北70公里，白塔子乡北面的大兴安岭中，古称庆云山。

（新华网）

甘肃定西市拟全面整合利用馆藏文物资源

定西市位于甘肃省中部，经济困难，社会事业发展缓慢，文物工作举步维艰。目前全市8个县区均设有博物馆，共有馆藏文物23000多件，其中三级以上珍贵文物1416件。由于各县（区）文物藏品总量较少，类别相似，精品不多，8个博物馆均形不成优势和特色，同时，由于经济条件所限，各博物馆基础设施都十分滞后，8个博物馆中，3个有馆无址，其余的只有简陋的文物库房而没有展厅，安防设施也跟不上，不具备对外开放的条件，文物长期被锁在库房中，无法得到有效利用，整个博物馆工作基本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博物馆应有的作用没有得到发挥，更谈不上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针对这种现状，定西市文化出版局通过几年的调研、酝酿，结合落实定西市委、市政府实施“陇中特色文化名市”的战略，于去年提出了整合全市文物资源的设想。其主要内容为：把各县区博物馆藏品调配充实到市级文物收藏单位，集中资金建设市级文物中心库和博物馆，以此推进全市文博事业进入快车道。集中保管后，文物的所有权不变，不收藏文物的博物馆改建为文物管理所，主要承担本县区野外文物管护的职能。通过这种资源整合，一是可以把分散的文物资源汇聚起来，集中资金建设区域性中心博物馆；二是可提高文物藏品质量和数量，丰富藏品

内涵，凸现地域文化特色；三是可集中文物资源优势，有利于文物的保护管理和科学研究；四是能够运用现代化管理手段，充分发挥文物的特殊作用，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五是形成区域性文物旅游资源优势，推动和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定西市委、市政府经过充分讨论，并广泛征求各县政府、职能部门、社会名流和文博界的意见，统一了思想认识，决定实施馆藏文物资源整合。据此，定西市文化局制定了文物资源整合和博物馆建设的具体方案，目前正在广泛征求意见。

甘肃省文物局充分肯定了定西市的思路和所做的工作，认为定西市文博事业要发展，必须进行体制改革，盘活文物资源。走整合之路，符合定西实际，也是2003年修订后的《文物保护法》所倡导的文物藏品管理思路，通过整合，可以将长期沉睡在库房里的文物真正变成资源、变成亮点，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对此，省文物局全力支持，尽力促成，定西市作为甘肃省经济最贫困的市州之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结合实际，开拓创新，大胆提出并艰难推进馆藏文物资源整合的思路，不仅在甘肃，甚至在全国也是颇有启示意义的，必将为甘肃乃至全国文物管理体制的优化改革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甘肃文物局）

殷墟博物馆破土动工

一座以收藏、保护、展示、研究殷墟出土文物为目的的博物馆——殷墟博物馆 3 月 16 日在河南安阳破土动工。

博物馆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区西北洹河西岸、宫殿宗庙遗址与洹河之间的狭长地带、洹河河床的摆动区域。经过考古钻探，选定区域内无任何古代文化遗存，符合遗址保护和博物馆建设的基本条件。

殷墟博物馆由中国建筑设计院设计，为地下一层建筑(地面上露 1 米)。建筑面积 3535 平方米，展厅面积 2354 平方米，包括展厅、文物库房、研究室、报告厅等设施。

博物馆按照科学、环保、安全、符合遗址保护并与遗址景观相协调的要求进行了建

筑设计。从平面上看，新的博物馆酷似甲骨文的“洹”字，即取依附洹河之意，象征洹水在孕育商代文明中的重要作用。所有的建筑全部修建于现有地表之下，地表植被覆盖，继续维持殷墟遗址的原有面貌。据介绍，总投资 1600 万元的殷墟博物馆是安阳市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重点建设项目，计划 8 月底前竣工开馆。目前，殷墟的文物保护工作初见成效，申报工作受到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和联合国专家的充分肯定，殷墟也作为明年中国唯一的申报项目被联合国列入审议日程，即将在 8 月接受联合国专家的最后审验。

(中国文物报)

湖北省十堰市政府投资近 4000 万建设市博物馆

在近期召开的湖北省十堰市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十堰市人民政府将市博物馆建设作为市政府向全市人民郑重承诺的 10 件实事之一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市发改委也将博物馆建设作为今年、明年唯一的社会发展项目列入投资计划。目前，十堰市博物馆建设已正式立项，占地面积 45 亩，建设规模 1 万平方米，投资近 4000 万元。博物馆预计可于明年底全面开放，供市民大众参观使用。

十堰市是湖北省文物大市，有着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已查明的各类文物点 2063 处，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6 处，在全省排第三位；一级文物 936 件，排全省第一。

有国内外罕见的恐龙骨骼化石和恐龙蛋化石群，有“郧县猿人”、“郧西猿人”、“郧县人”等重要的古人类遗址，有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等一批重要古建筑等。政府多年来一直考虑筹建一所博物馆，以展示十堰地方特色的历史文物、文化艺术、民风民俗等。日前，市政府就博物馆建设组成了基建、陈列展览 2 个专门工作班子，正紧锣密鼓地开展博物馆建设工作。陈列展览初步议定不搞通史式陈列，而以主题展览的形式，分为恐龙、古人类、武当山、汽车、水电 5 个专题展览。

(中国文物报)

长沙杜甫纪念馆 5 月 1 日将建成开放

据了解，在长沙，杜甫江阁与天心阁、岳麓山道林二寺和岳麓书院形成一条文脉带。位于正中间的杜甫纪念馆，高约 20 米，为 4 层建筑，采用中国传统仿唐古建筑形式。杜甫江阁总平面布局按南北带状规划，形成一排纪念性建筑群。南北连廊为诗碑廊，柱两侧立石碑刻杜甫诗歌。杜甫江阁北向布置六角形碑亭，南向靠湘江大道人行通道路边建方亭与诗碑廊相连。

据新华网报道，目前，南北连廊上的诗碑廊、方亭、六角形碑亭等附属建筑已基本建成，即将转入地面绿化阶段。

据介绍，杜甫纪念馆东向设集会广场，方亭南北规划为绿化广场。杜甫江阁入口北向广场中将立杜甫与唐代名人李龟年塑像。方亭北向立石景，上刻“诗圣”或“诗魂”二字。

有关方面已为“杜甫江阁”向社会征联、

征记，目前已收到全国参赛楹联 4000 多幅，记 10 余篇。据悉，征联、征记工作将在 3 月 20 日结束，专家将从所有参赛作品中遴选出

500 幅对联集成册，最优秀的 16 幅对联将交由国内不同流派的书法家书写，永久篆刻在杜甫江阁。（华声报）

曲阜将建“海外中国文物回归博物馆”

随着美国亚洲艺术有限公司与曲阜市合作项目的正式签订，“海外中国文物回归博物馆”的项目建设在孔子故里曲阜正式启动。这是曲阜把明代故城建成一个大型露天博物馆的又一新举措。

该博物馆将建在刚刚修复的曲阜明代故城墙内，馆内将展出由美国亚洲艺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路平先生近年来倾力收藏的 2000 余件中国文物，这是曲阜在明故城墙内继“中

外酒瓶博物馆”之后的又一大型博物馆，这将进一步丰富曲阜的旅游内涵。

据了解，路平先生是美国收藏界知名人士，在华侨中有较高威信，一直致力于将流失国外的中国文物重返祖国。路平先生经过多次对曲阜的考察，认为把自己收集到的 2000 多件文物放在曲阜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中展出，意义十分重大。

（中新社）

杭州：西湖博物馆、严官巷南宋遗址国庆开放

投入 1.5 亿元延续杭州的历史与文化

2005 年，杭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经费计划安排 1.5 亿元，比去年增加 2000 万元。同时，一批历史建筑将被列入第二批保护名单；西湖博物馆、严官巷南宋遗址保护工程国庆将和大家见面。昨天，全市文物工作会议透露了许多大家关心的信息。

一座古宅就是一个中医特色诊疗馆

2004 年，杭州建立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资金制度，并拨下 1.3 亿元文保专项资金。如今，梁宅、高家花园等修缮工作先后竣工，汪宅等文物建筑维修即将完成。但是，杭州需要保护、修缮的文物古迹、历史建筑太多了，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文物部门开始探索文物建筑合理利用的新途径。

市文保点梁宅就是一个先例。目前，经过精心修缮的梁宅已开始与医药部门合作，并渐渐成为一个展示中医文化、开展中医特色诊疗的场馆。文物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这种利用方式既为祖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展示提供了载体，又使文物建筑得到了有效保护、管理，而且减轻了政府财政负担。

历史建筑保护名单上将添百余“大将”

2004 年，杭州市宣布了 75 处历史建筑保护名单和《杭州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

保护管理办法》。目前，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单已基本确定，有 100 多处。另外，还有 150 余处建国前后历史建筑的调查论证工作也在进行之中。

西湖博物馆、严官巷南宋遗址国庆可参观

全面展示西湖历史文化的西湖博物馆是我国第一座湖泊类专题博物馆。目前，博物馆的建筑主体已经完成，陈列设计方案已基本确定，为确保西湖博物馆在国庆节开放奠定了基础。同时，目前已征集了约 200 件新石器时代以来的珍贵文物和 2000 余件西湖文献资料，现已进入陈列布展阶段。

此外，严官巷南宋遗址保护、展示工程也将在国庆开放。迄今，市文物考古所对严官巷南北两侧进行的抢救性考古发掘面积已达 1000 余平方米，获得南宋皇城御街、三省六部北围墙、白马庙遗址等重大考古发现。据了解，三省六部遗址和白马庙遗址上将建立南北两座遗址展示厅，供游人参观这见证杭州 2200 多年建城史的实物遗址。

为白塔请一位“保护神”

钱塘江畔的白塔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通体用白石雕刻而成，每个层面都有壶门和精致的雕塑。可是，像这样的“野外不可移动文物”可能会遇到火灾、盗窃。今年，

园文局将为白塔安装上电子监控设备，这样文保部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获悉可能发生的

任何情况。
(每日商报)

无锡耗巨资整治古运河 打造古运河“露天博物馆”

颇受海内外关注的无锡古运河整治工程今日在此间启动，无锡市官员介绍，此项工程总投入达二十七亿元人民币，旨在将古老的运河修建成“古今对话，中西结合，演绎历史长河，再现人与水共生的繁荣景象”。

古运河又称京杭大运河，全长一千七百九十四公里，始凿于春秋末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航程最长的一条人工河道，与万里长城齐名，居于世界著名古运河之首。无锡运河段已有两千四百多年历史，九点五公里的狭长河道波光粼粼，两岸紧贴着粉墙黛瓦的古民居，形成了“水弄堂”的绝佳风光。城中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优美的风光名胜，令人流连。沿河的主要景点有清帝康熙、乾隆驻足处黄埠墩、中国四大米市之首得三里桥米市、建于公元五百四十七年的江南名刹南禅寺、建于明代的运河石拱桥清名桥。

古运河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使它在当

代旅游业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据悉，此次无锡古运河整治方案通过国际招标，由英、法两国联合打造。专家们认为除了要保护古运河古老的水道、驳岸、码头、两岸建筑等运河原貌的要素之外，还要对其进行开发利用，要创出江南的历史文化特色，特别要充分展示“四大米市”和“水弄堂”等历史遗迹。

据介绍，此次按美国曼哈顿理念规划的占地十六万平方米的沿河公园群将集中展示古运河经济发展史，成为古运河的“露天博物馆”。根据规划，工程将利用地块分布，由高到低，由内到外，逐步形成退台。由东向西，分别建造以“观山水”、“水弄堂”和“文化娱乐”为三大主题的公园。同时还仿造上海新天地的模式开发沿运河段较长的南长老街。

(中新社)

中法联合主办的中国博物馆高级管理人员 2005 年培训班第一期即将开课

由国家文物局、中央美术学院与法国国家文化遗产学院合作主办的“中国博物馆高级管理人员 2005 年培训班”第一期将于 4 月 11-19 日在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开课。本次培训班是在 2003 年“中国博物馆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基础上的一次延续和深化。法国拥有世界上最早的文化制度和博物馆管理体系，其管理经验对于中国同行来说，值得研究和借鉴。本次培训班邀请了法国国家文化遗产学院、巴黎第一大学、卢浮宫博物馆、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法国博物馆研究与修复中心、里尔市现代艺术博物馆等单位的专

家授课，内容涉及博物馆学术与文化规划、公众政策与经营、藏品保护和修复的管理与技术、展览的策划和实施等方面，法方专家还将与中国各博物馆的同行展开交流，共同探讨未来合作的前景与渠道。本期培训班培训对象为全国各博物馆的馆长和保管、修复、陈列部门的负责人员；各地文物局局长、文物和博物馆处处长；高校文博、考古、文化遗产专业教师；文物考古研究机构负责人等。学员完成学业后，将颁发由中央美术学院和法国国家文化遗产学院联合签发的结业证书。详情可查询中央美术学院网站。

以色列举行大屠杀纪念馆新馆落成仪式

以色列纪念大屠杀纪念馆新馆落成仪式日前在耶路撒冷举行，以色列领导人、联合

国秘书长安南和世界近 40 个国家的政要出席。安南在纪念仪式上发表讲话说，他希望

大屠杀纪念馆能给世界人民以警示，并帮助人们找到战胜仇恨和狭隘的办法。以色列总理沙龙说，以色列国让犹太人拥有了保护自己的能力和能力，这有力地保证了大屠杀历史不会重演。以总统卡察夫说，纪念馆新馆落成标志着世界各国领导人不忘大屠杀惨痛历史的承诺，并让人们重新审视人类自身的价值。卡察夫总统为纪念馆新馆剪了彩，并与一些国家的政要一起参观了这座耗资 5600 万美

元修建的纪念馆。为保证落成仪式顺利举行，耶路撒冷市加强了安全警戒。交通部门对政要们下榻的饭店和纪念馆周围道路实行了交通管制，武装直升机不时在城市上空盘旋。大屠杀纪念馆是为了纪念在二战中被纳粹德国杀害的 600 万犹太人修建的。以色列每年都在“大屠杀纪念日”举行活动，教育后代勿忘历史。

英国的独立博物馆

张文立

独立博物馆(independent museum)的快速发展是二战后英国博物馆领域中一个引人注目瞩目的现象。

所谓的独立博物馆，是指独立于英国政府系统之外的一类博物馆。其创建者不是英国的中央或地方政府，而是民间有热情的个人或团体，其中以慈善机构为多。它们完全是依靠自身的能力去吸引和取悦观众，维持自己的运行和发展，通常没有来自中央或地方政府的定期拨款。

独立博物馆的资金来源主要有观众支付的入场费、博物馆商店或餐厅的利润，以及可能的来自企业、个人或公共团体的赠款。因此，独立博物馆能否生存下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们能否有效地满足社会的需求，能否得到社会的认可以及能否广泛地为社会所利用。可能正是这样一种资金构成模式，造成了独立博物馆具有下列一些突出特点，一是这些博物馆的馆长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者，而更像是剧院或音乐会的经理人，需要懂得经营与运作；二是这些博物馆通常更加关注人，对人的关注甚至要胜于对“物”的关注；三是它们对于国家的经济状况异常的

敏感；四是良好的营销、良好的管理和优秀的产品，对于这些博物馆的生存和成功而言，是绝对必要的，而不是可有可无的；五是其中的成功者通常表现出比较强的创新能力。事实上，在英国，有关博物馆的认识和运营方式上的许多具有革命性的创造常常都是产生于这一类博物馆当中。它们所创设的不少新的方式和方法已经影响到国家和地方管辖的博物馆或为后者所吸收。从这一意义上说，战后英国博物馆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独立博物馆。

在英国，二战后特别是上世纪 80 年代，是独立博物馆快速发展的一个时期。据统计，到 90 年代初，英国独立博物馆约有 1100 余座，占英国博物馆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博物馆如铁桥峡遗址博物馆等。与此类博物馆发展相适应，在英国还出现了一个专门的独立博物馆协会。不过，进入 90 年代后，新建馆越来越少，与此同时，每年还不断有独立博物馆消失或被迫关闭。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 90 年代后英国博物馆生存环境的某些变化。

国外博物馆与文化遗产财税政策撷英

匈牙利在国家文化遗产部内部设立国家文化基金会。该基金会为保护和加强匈牙利的文化遗产而向大量的文化和艺术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基金会的决策和管理机构是国家

文化基金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国家文化遗产部指派 1 名主席及 11 名成员构成，任期 4 年。

国家文化基金会的经费来源是向文化产品和服务(比如光盘、书籍、电影、音乐会、

表演、译著)以及与文化有关的电子产品(电视机、复印机、计算机显示器)征收 6%的文化税。这些税收每年合计约有 60 亿匈牙利福林(1 欧元=250 匈牙利福林)。在 2000 年的匈牙利全部预算中,分派给文化的预算占 1.87%。

国家文化基金委员会指定将 50% 的基金用于诸如歌剧院、国家博物馆和国家交响乐团等 30 个国家机构的项目和计划。其余 50% 的基金分配给基金会的 17 个专业委员会(比如电影委员会、民间艺术委员会和博物馆委员会等),由专业委员会发给申请者。

对于艺术的商业支持更加难以估算,因为根据匈牙利的税收立法,文化捐赠不被列入赞助而是被列入广告或慈善捐赠。

私人支持文化事业可以采取捐赠文化基金会的形式。对“最高国家重要性地位”组织的捐赠可以获得 100% 的收入所得税扣除。但是,如果给予那些不具备这个标签的机构,

只有 20% 的捐赠可以获得免税。文化基金会完全是非营利组织。但在匈牙利,非营利组织获得的收入只有在用于具体的文化目的时才是免税的,如果用于满足薪水成本等目的则是应该缴税的。

还有一项添加法律即《1%准备金法》,允许私人将其个人所得税的 1% 抵押于该项立法包括的某些非营利组织(比如博物馆或者学校)。这些资金随后被国家财政部转入有需要的组织并制作一份有关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交给个人。虽然 1% 的准备金不足以构成税务优惠,但这对于文化筹资来说则是一个宝贵的来源。

上述情况说明,现行的优惠政策对鼓励私营部门赞助艺术、文化及遗产活动的激励是十分有限的。

(原作: Miklos Cseri,匈牙利露天博物馆主管;编译:赫俊红)

博物馆陈列工作的几个观念问题

邓佳平

中国博物馆学会陈列艺术委员会两年前在湖南长沙召开了第六次学术讨论会,与会者一致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尽快出台有关博物馆陈列展览工作的规范,使陈列工作有章可循,为博物馆陈列工作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合理的工作环境。

据悉,有关部门正在起草这个规范,使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依稀看到了希望。高兴之余冷静思考,觉得仅有规范是不够的。要做好陈列工作不仅仅要有好的规范,重要的是还要理清陈列工作中的一些观念、一些是非。

上世纪 80 年代至今,中国博物馆经历了快速发展的 20 年。这种高速发展的成果不仅体现在博物馆的硬件建设成就上,还体现在人们的知识结构、观念更新和视野开拓上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时至今日,陈列工作依然存在着不同观念之间的隔阂和差异,有必要加以讨论、整理和澄清。

一、 陈列布展工程与建设、装饰工程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建设工程一般

是指基建,即建筑工程。装饰工程则是对建设工程的一种延伸,即修饰、打扮的工程。从目前的情况看,基建和装饰工程是隶属于国家建设部,受建设专业管理机构已出台的行业标准来规范。从本质上讲,这些标准和规范并非针对博物馆的陈列展览工程。

博物馆陈列布展工作有其特殊的规律性,其主要的区别在于它是一个以博物馆特有的语言进行综合艺术创作的过程。而这种艺术创作很难套用其他行业标准,只能通过符合这种艺术创作的客观规律来制订本行业的设计、制作标准。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三者虽都带有“艺术”的血缘关系,但的确有各自的规律和要求。本行业的规范并没有出台,而招投标又有一套完整的程序和法规,这种情况下很多陈列布展去搞招投标,但套用个并不适合自己的行业规范,无异于削足适履。

其次,既然没有行业规范也就无从从业人员的资质可言。若以博物馆陈列艺术设计人

员无设计资质(资格),而去认定其他行业的设计资质(资格),无疑是犯了常识性和逻辑性的错误。有人戏言这类似兽医给人看病。事实也表明:为什么许多博物馆陈列做成了装饰工程?为什么许多博物馆陈列似曾相识、千人一面?其诟病就在于此。

二、 陈列设计

按照国家绝对权威机构(国家文物局)主编的教材,《中国博物馆学基础》对陈列设计进行了科学系统、详尽明晰的归纳和说明。陈列工作的程序如下:首先是总体研究与设计。按笔者的理解,凡从事陈列设计(内容和形式)的“领队”均应了解、熟悉和掌握这些知识以及利用这些知识来驾驭和完成这些工作;其次才下分有内容设计和艺术设计。即便如此,内容设计和艺术设计的沟通与互动仍然显得十分紧密和重要。

回到现实,我们的陈列工作常常走火入魔,矫枉过正地走入偏执的境地。通常的表现:有意无意地将总体研究、设计和内容设计相互混淆,将形式设计的艺术创作过程简单地视为修饰、打扮的美工过程,人为地割裂两者之间内在的联系。其观念上的错误在于对陈列工作没有一个正确、深刻的认识,以及过多地考虑了个人自身的利益得失。

陈列设计方案要做到有个性、有特色并符合陈列工作的规律,必须要有优秀的内容设计和形式设计,两者同等重要且要做到高度协调、完美统一。而工作中有人常常简单(有时是粗暴)地以“内容决定形式”(实则是内容设计者决定形式设计者)来处理陈列工作,歪曲了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这无助于对陈列深层次开掘,更谈不上形式对陈列主题的准确表达以及陈列特色的形成。这里,我们无意讨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只想强调二者对于陈列设计的重要性。套用一句时尚的广告用语,那就是:大家(内容与形式)好,(陈列)才是真的好!

博物馆陈列艺术设计人员没有设计资质(资格)会对陈列工作产生影响,那么,博物馆陈列内容设计人员有无设定资质(资格)

的必要呢?从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起草博物馆陈列工作规范的情况看,博物馆陈列内容设计人员“持证上岗”亦是显得十分必要。按照《中国博物馆学基础》的说法:陈列内容设计应为内容研究与设计两大任务。所谓陈列内容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陈列主题所要表现的有关学科内容,一是表现陈列主题所需要的文物、标本以及其他展品。很显然,一个合格的陈列内容设计人员起码要具备两个必要条件:其一是了解陈列的整个工作程序,了解并掌握博物馆陈列的特殊规律;其二从业人员不仅要求是某一方面专家,还应该具备广博的知识面,是一个能组织各有关学科内容进行陈列内容设计的驭手。换言之,即使是某一方面专家也不一定是一个合格的陈列内容设计者。因此,规范和“持证上岗”就存在必要。

由于内容设计对于陈列的重要性,因此不合格的人员不宜担任此项工作。现实工作中,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一些现象,以为学过历史、学过考古、学过地质……就可以做陈列,甚至以专家自居,这种观念尤其可怕且危害性也最大。人们在评价一个人时可以说没有内涵、没有品位、没有修养,即使长得一副漂亮的脸蛋也枉然。但客观地分析,难道脸蛋长得好看也有错吗?明明是“内容”不好嘛!想必这和做好陈列有些同理。

三、 陈列的语言

众所周知,书有书面语,口有口语。陈列有陈列的语言。1991年国际博协博物馆学委员会将陈列的语言定义为:博物馆工作人员与博物馆观众之间进行交流的方法和途径。

工作中,我们常常缺失了对受众的研究。观众喜欢什么?喜欢什么方式?倘若我们对此没有研究,没有一个很好的陈列语言定位,没有一个很好的陈列语言的表达能力,没有一个很好的陈列语言感染力,我们是无法很好地与观众交流和互动的。纵使你有再大的学问,想展现再多的研究成果,想告诉观众一个多么动人的故事,而陈列语言或条理不

清，或故弄玄虚，或词不达意……怎么传达给观众而使之感兴趣？因此，陈列的语言要考虑观众的感受。陈列语言是一门综合艺术的语言，是靠艺术形式作为媒介的，正如电影是靠音画来传达故事情节、思想内容一样。陈列语言研究，在陈列设计中，既是陈列形式设计的重点，也是陈列内容设计的研究课题，它是陈列内容设计与形式设计的交汇点。如果陈列设计时能够树立起陈列语言意识和观念，我们就会在博物馆与观众之间构筑起一座心灵沟通的桥梁。

四、陈列的态度

或许有人问陈列还有态度吗？回答是肯定的。陈列设计人员所具有的专业设计水平和所持的陈列观念反映在陈列中，这就是陈列的态度。陈列的语言运用不当，陈列的态度也许就不佳。

这样的例证信手拈来，不胜枚举，在此仅举两例。人们常说博物馆是一个教育机构，据此就把陈列做得很严肃，很刻板，你板着

个面孔，公众买你的账吗？因为你只注重了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忽视了博物馆的娱乐和文化休闲功能，忽视了寓教于乐的陈列语言表达方式。不当的观念就会造就生硬的陈列语言，反映出一种缺乏亲和力的陈列态度，观众只会望而却步。

陈列就得做“科普”，它不是专家学者的纪念碑；要转换角色，改变方式，不要以“专家”示人，拿专业术语唬人。要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娓娓道来。倘若博物馆陈列不仅是儿童能读懂喜欢看，甚至行家也认可，这个陈列才算是一个完美的陈列。毕竟博物馆是为公众服务的，不是少数人的俱乐部，不能因为博物馆的专业性和陈列语言表达的不当而与观众产生隔阂，继而失去博物馆陈列的终极目标。

总之，随着博物馆事业的飞速发展，博物馆陈列工作要善于不断地总结和提高，唯有我们更新观念、更正观念，才能创造出最生动、最完美、最受观众喜爱的陈列展览来。

戏剧表演与英国博物馆的教育功能

陈成军

教育是博物馆的基本功能之一。关于博物馆的教育方式，《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修订本）做了较为全面的概括。该书认为“博物馆的教育方式生动形象。与其他教育设施相比有其特有的长处。它大量地运用文物标本、模型等实物资料，作用于观众的感官。”英国的一些博物馆则采用戏剧表演这种特殊的方式，将博物馆的教育功能蕴涵在其中，走出一条迥然不同的博物馆教育之路。

潘趣和朱迪滑稽戏是英国一种传统的滑稽木偶剧。1850年，寇德曼教授的曾祖父把木偶剧带到利物浦后，这项表演在他的家族中传了几代。如今，每隔两星期，寇德曼教授都要在利物浦生活博物馆进行潘趣和朱迪滑稽剧的表演。该表演成为利物浦生活博物馆一道亮丽的风景，也是向观众普及民俗教育的重要场所。

潘趣和朱迪表演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罗马

时代，但有的历史学家坚信近代潘趣和朱迪的表演肇始于17世纪。到18世纪，以潘趣和朱迪、婴儿、鳄鱼和刽子手为主要内容的手套木偶剧表演非常受欢迎。寇德曼家族在英国潘趣和朱迪表演者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尽管潘趣和朱迪的表演属于传统的木偶剧，但这项表演在电影、电视和所有孩子所拥有的小巧机械的冲击下得以生存。它已经适应观众的需求而对表演做出改变。早期的寇德曼教授常常吹奏排箫来招徕观众，然后这项表演会在一天时间里连续上演。如今，为了加快表演的速度以迎合观众的需求，寇德曼家族的表演已经从过去的一个小时缩短到25分钟。因为他们知道在这个时代，观众不会有耐心观看一个小时的表演。

利物浦生活博物馆非常重视与寇德曼家族的业务联系，并对寇德曼家族的表演和在

博物馆教育中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很多学者也认为，寇德曼家族的表演是活的历史，是英国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于对寇德曼家族潘趣和朱迪滑稽剧表演的认识，在利物浦生活博物馆展览着寇德曼家族维多利亚时代的表演台，一些手工雕刻的寇德曼家族的木偶也成为博物馆长期租借的物品。配合这种展览，利物浦生活博物馆让当今的寇德曼教授在馆内小剧场进行表演。这个剧场经常变得拥挤不堪，以至于寇德曼教授不得不在一处较大的场地内进行表演。在表演台上，观众能够看到鳄鱼喷出一串香肠、吞食潘趣的拐杖，能看到一对拳击手坚硬的脑袋在舞台上撞来撞去。而寇德曼教授旋转俯冲，在舞台上同时操纵着四个木偶人，在咯咯的笑语中和歌声中疯狂地冲来冲去。然后他从表演台下来，揩掉眉宇间的汗水。他动情地说，潘趣和朱迪表演从来没有丧失它的吸引力，它已经融会在我的血液里，成为我们家族生存的一部分。而孩子们也在寇德曼教授的表演中如醉如痴，真正感受到充满滑稽的快乐。

在曼彻斯特大学从事戏剧研究的高级讲师托尼·杰克森的带领下，研究者在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和曼彻斯特人民历史博物馆进行专项研究，旨在阐明戏剧对学校孩子们理解力和记忆力的影响。研究报告表明，在博物馆中使用演员可能是一种强有力的教育工具。

这项研究以在校学生为研究对象。学生们被分成两组，一组观看戏剧表演，另一组是一次具有实践意义的旅行，或者是参加一个教育实验班。无论哪一组，研究者都对学生们进行提问，鼓励他们做各种活动。

研究者发现，当某个故事是由一个扮演重要角色的演员说出的时候，学生们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更强，他们也容易对人物深表同情，容易理解问题消极和困难的方面。“根据学生们告诉我们的，似乎这种表演容易得到认可，因为演员们仿佛是在与朋友、邻居而不是与小學生进行交谈。”而在非戏剧组，学

生们的理解力和记忆力均存在着很大的变数。该研究表明，多感官、多渠道地向观众传播信息，能提高记忆效果，因为无论从人的生理机制或者认知过程来说，都会使观众感到亲切，易于接受和理解。

在曼彻斯特人民历史博物馆的教育官员皮特·布朗说，博物馆通过自我评估，已经发现戏剧课受到不同类型的博物馆参观者的欢迎。博物馆已经专门为学校编排 5 个角色，还有 2 个角色是用来与一般观众互动的。在这些角色中，有的是历史人物，比如说威廉姆·库费是一位黑人宪章运动的领导者。而其他角色表演的是依然健在人物的故事，其中一个就是根据一位名叫加不列里的妇女 20 世纪 50 年代从圣·基特到曼彻斯特的一段旅行设计的。

尽管这些表演鲜活有趣，在观众中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但是要想维持这种表演，没有资金的帮助是难以为继的，因为戏剧表演日复一日，完全是博物馆自己在硬撑着。如今，编写和排演一个新的角色可能花掉的费用达 4000 欧元，这对于博物馆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样看来，在英国博物馆教育中发挥着传统作用的戏剧表演也面临困境。

诚如《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修订本）所言：“特别是一些设施先进的博物馆，不仅可以眼看、耳听，而且可以触摸，亲自实验和操作，通过电影、数字化录音导览机、光碟自动导览系统、多媒体电视墙、展示电化设备等多媒体辅助系统，观众可以依自己的意愿吸取博物馆展示的科学文化等最新信息。”现代化的设备确实拓宽了博物馆的教育方式，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传统的教育方式就已经失去了以往的魅力而应该退出历史舞台呢？英国一些博物馆使用传统的戏剧作为博物馆教育的一种重要方式，其效果和影响值得我们深思。

（本文有关资料编译自 Tough as old booths museums journal oct 2002 和 Actors dramatically boost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new research says museums journal nov 2002）

国家文物局启动 2005 年度 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课题申报工作

近日,国家文物局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局(文化厅、文化局)、文管会发出《关于组织开展 2005 年度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

根据国家文物局工作计划,经研究,决定自 4 月 20 日起开展 2005 年度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课题申报工作。现将《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课题管理办法》、《历史文化遗址保护领域科学和技术研究课题指南(2004-2005)》、《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课题汇编(1990-2004)》、《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课题申请书》、《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课题申报流程》印发给有关单位,并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并按去年全国文物局长工作会议、去年全国文物保护科技工作会议确立的文物保护科技发展总体思路和中长期发展规划的要求,认真开展 2005 年度课题申报工作。

二、课题的申报要着眼于推进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整体创新能力,以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重大问题为主攻方向,鼓励原创性研究和关键技术创新,提倡研究中加强多学科交叉和技术集成。围绕《历史文化遗址保护领域科学和技术研究课题指南(2004-2005)》,开展自由探索性课题。重点支持基础理论研究,以及应用技术的研发与科研成果推广研究。基础研究要力求具有原创性或开拓性;应用研究要突出针对性和实效性,避免低水平重复研究。各组织单位和课题承担单位要认真按照有关要求,严格把关,切实做好课题申报的组织和管理工作的,保证课题申报质量,切勿盲目追求申报数量。

三、此次课题申报,国家文物局对课题的补助经费一般不超过 10 万元。课题经费总额不受限制,鼓励课题自筹经费。所报课题承担单位和课题负责人需符合《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课题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课题负责人只能申报承担一项,所从事的课题尚未完成,不得申报新课题。课题组成员承担的课题不超过 2 项。凡被撤销课题的负责人 3 年内不得申请新课题。禁止同一课题多头申报。

四、各省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和中国文物研究所为本次申报工作组织单位,各省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有关单位课题申请书的审核推荐工作;中国文物研究所负责国家文物局直属单位,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有关单位课题申请书的审核推荐工作。各组织单位要对所报课题申请书进行认真审核,特别是课题设计的科学性、可行性和创新性,课题组是否具有完成研究任务的充分条件等方面,并签署明确意见。国家文物局科研课题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课题办)负责课题申报、评审、立项的组织工作。

五、本年度课题采取网上申报形式,该通知及附件均同时在历史文化遗址保护领域科技平台(网址: www.chst.cn,以下简称科技平台)上发布,申报者可直接上网查询和下载。请各组织单位、课题承担单位和申请人认真阅读《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课题申报流程》,做好申报工作。具体程序安排如下:

(一)课题申请单位及申请人登录科技平台,点击“课题申报”,按所列程序进行注册、填报;

(二)课题组织单位在网上对课题进行审核,通过审核后于 7 月 10 日前报送课题办;

(三) 课题办组织有关专家对课题申请书进行函审,结果将于7月20日前在科技平台上予以公布;

(四) 通过函审的申报课题,根据专家函审意见修改完善后,打印课题申请书一式3份,经报课题承担单位和组织单位审核签字盖章后,于8月10日前寄至课题办;

(五) 课题立项专家评审会由国家文物局组织召开,具体时间另行安排。评审结果

将在科技平台上公示,公示期15天。

六、其他事项

受理单位:国家文物局科研课题管理办公室

联系人:杨朝权 刁道胜

联系电话:(010)84631969 65551603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高原街甲2号 文博大厦1203室

邮编:100029

电子邮箱:ktb@sach.gov.cn

北京将于2008年前修缮近300个文物项目

随着2008年奥运会临近,北京文物保护也加快了进程,一项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文物保护计划正在北京全面实施。

北京市文物局昨天宣布,将根据北京市《人文奥运文化保护计划》对颐和园、明十三陵、卢沟桥等一些著名历史文化景观进行大规模修缮。《人文奥运文化保护计划》是北京市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而制定的一项文物保护计划,旨在对北京的文物建筑进行大规模修缮和成片整治,重现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风貌。根据这个计划,北京仅在去年一年就投入资金1、2亿元,对圆明园、周口店、宛平城等26处历史文化遗址开工修缮。其中,去年完工的北京永定门城楼修复工程不仅恢复了北京旧城城市中轴线的完整性,也从整体上为进一步恢复古都风貌奠定了重要基础。

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梅宁华:到2008年之前,我们大概有近300个文物项目能得到保护和修缮,这次投入的力度、保护的项目和保护的效果都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个阶段。

(央视国际网站)

北京“人文奥运”文保工程一开工一竣工

4月12日上午,醇亲王墓修缮竣工暨孚郡王墓修缮开工仪式在孚郡王墓修缮施工现场举行。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梅宁华、副局长于平及海淀区有关领导出席了仪式。

醇亲王墓、孚郡王墓位于海淀区苏家坨镇大西山风景旅游区,是北京现存明十三陵皇陵外等级最高、保存较为完整的王坟,被北京市列为“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醇亲王名奕劻(1841-1890),为清道光皇帝第七子、光绪皇帝的生父,慈禧太后的妹夫。曾任满洲都统、御前大臣,管理神机营事务、总理海军衙门等要职,1890年病逝。醇亲王墓(俗称七王坟)建于明法云寺旧址上,坐西朝东,依山而建,由阴宅、阳宅2部分组成。阴宅前方后圆,东西长200、宽40米,分为3层,由碑亭、石拱神桥、隆恩门、隆恩殿、南北朝房以及宝城、宝顶等建筑组成。阳宅

由五进院落构成。1937年,该墓被盗。但整体格局至今保存完整。阴宅建筑除碑亭于1998年进行过抢险修缮外,余皆损毁严重。

2004年,由北京市文物局组织,海淀区文化委员会协助投资30余万元对其进行了抢险修缮,使其整体环境得到改观。孚郡王奕(1845-1877)为清道光皇帝第九子,七王之弟,1877年亡故,享年33岁。孚郡王墓(俗称九王坟),位于海淀区苏家坨镇草厂村西南,坐西朝东,前方后圆,阴宅东西长约200、南北宽80米,主要建筑有碑亭、石桥、隆恩门、隆恩殿、南北朝房以及宝城、宝顶等。该墓解放前已被盗空,多年来,因失于管理,损毁严重。这一投入195万元资金的工程将对其阴宅的主要建筑进行修缮。修缮后的孚郡王墓将成为北京地区保护最为完整的王墓之一。(中国文物报)

北京今年投入 2 亿元资金推进“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

据北京市文物局 4 月 1 日介绍,今年北京将投入 2 亿多元经费,重点对《“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中的 32 个项目实施保护和修缮。

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孔繁峙在 1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北京将着力推进颐和园佛香阁景区、十三陵泰陵的修缮工作及长城怀柔段和密云段的抢险加固等工程。

北京还将按照“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规划的总体设想,加快实施“两线”“五区”“六景”的重点项目。具体是,结合环境整治、

危旧房改造的重点,对中轴线的正阳门及箭楼,城区的地坛、月坛,京西的法海寺、慈善寺、承恩寺及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等进行保护和维修。

北京还将重点消除太庙、戒台寺、康有为故居等 10 余处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隐患。

据介绍,《“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于 2003 年启动,计划 5 年投资 6 亿元,对北京全市文物建筑进行大规模修缮和成片整治,重点营造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基本格局和风貌。(新华社)

故宫百年大修探秘:上漆不用刷 工艺祖孙传

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故宫正在进行 1911 年辛亥革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维修,包括武英殿在内的故宫西路的修缮将在今年 5 月份完工,故宫东路修缮将赶在今年 10 月故宫 80 周年院庆前夕完工。此外,基本修缮完毕的武英殿、建福宫花园,预计可在院庆后向游人开放。

古老工艺祖孙传承

故宫古建部主任李永革日前表示,他对一些媒体所说的“故宫大修缺乏古代相关技艺”的说法表示反对,“我们掌握了大部分的古建工艺。”

“比如,故宫古建筑群在主要木质结构上都不用钉子,而采用榫卯结构。”李永革说,“在这次武英殿的修缮中,我们也保证了原来不用钉子的地方,现在依然不用钉子。”

榫卯结构是古代木工技艺的一种。据介绍,我国传统家具在相连接的两构件上并不采用金属钉子,而采用一种凹凸处理的接合方式。其中,凸出部分叫榫(或榫头);凹进部分叫卯(或榫眼、榫槽)。

李永革说:“有的故宫古建施工队员工祖孙三代都在这里工作,手艺就这样传承下来。”

中年北京人当主力

据悉,现在故宫古建修缮中心的在职人员有 100 人左右,这些工匠的平均年龄有四

十六七岁,他们全都是北京人。在这次大修中,这些工匠是绝对主力。

另据了解,在这次大修中,古建修缮中心还招了 600 多名农民工进行一些不需要技术性很强的修缮工作。之前,这些农民工都进行了古建修缮方面的培训。

并非更换所有地面金砖

对于大修,有传言称故宫将把路面全部换为“金砖”,对此,李永革说,这一说法不准确。

“故宫在这次大修中不会全部更换地面现有石砖为金砖”。李永革说。古代的故宫铺设金砖的面积也很有限,集中在东、中、西 3 条路线上。

“而且,明清时代铺设的故宫金砖,等级也是不一样的,有五六种规格。在故宫的核心建筑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所在的中路上,用的金砖是最大的,有两尺。中路外侧的金砖稍小,有一尺七的,也有一尺四的。”

“这里说到的尺是古代单位里的尺,相当于现代的 32 厘米。”李永革特别解释道。

碎金砖能磨刀

“为什么要叫金砖?有人以为它的颜色是金灿灿的,这是不对的。金砖制成后,其实是青色的,但它敲击起来有类似于金属的回音,质地又很坚硬,所以叫金砖。”李永革说。

“以前曾经有人用被换下来的破碎金砖，切成一条当磨刀石用。用金砖给刀开刃，同样很锋利。还有人将金砖打成一小块，上面滴上墨，用来做砚台。”李永革回忆说。

“油漆也是这次大修的重要组成部分。”李永革主任说，“本次大修中使用的油漆的制作工艺和上油漆的工艺与古代基本一致。”

上漆采用丝头搓

据了解，故宫曾经在“文革”时期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使用刷子将油漆刷上，

“这其实与传统不符，”李永革说，“刷子是舶来品，古代的工匠上油漆是不用刷子的，而是用丝头，也就是蚕绸做衣服用的下脚料，把油漆搓到柱子和其他需要上漆的东西上。”

而且，这么搓出来的油漆厚度大于用刷子刷的，而且搓的时候手能用上劲，有利于油漆向柱子内部渗透。

用丝头搓三到四遍之后，油漆就算上完了，但是这时候的油漆是不平整的，接下来就该用一种叫做栓的东西将油漆刮平。栓是由猪鬃编成片制成。

调制颜色全凭经验

“油漆的制作也是非常有讲究的。”李永

革说。“古代的油漆和现代的很不一样。古代的油漆是用桐油熬出来的，里面再放上一些配料，需要黄色的就放石黄，需要青色、绿色就放石青石绿。一些壁画用的红色，会将桐油对上名贵的朱砂做成颜料。”

据了解，颜色的深浅全凭工匠根据经验放入这些矿物质的多少。所以调制出来的颜色就和现在用化工原料调制出来的颜色不一样。“为保持原有的样貌，此次大修中使用的油漆也由传统工艺特制而成，这种油漆的色彩更自然、厚重，而且更为耐久。”李永革说。

大修投资逾 19 亿元

故宫大修始于 2002 年 10 月 17 日，预计到 2020 年完工。一期工程计划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前完工。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晋宏逵介绍，这次大修是 1911 年后故宫的首次整体大修，预计投资 19.52 亿元人民币。

著名古建筑专家郑连章表示，这次大修是故宫历史上最细致的一次修缮，从细节上恢复故宫面貌，比如地砖上坑洼的地方，城墙内侧被侵蚀严重的地方，以及石雕上的裂缝等，全要加以整修。(中新网)

《清明上河图》将“住”进高科技展柜

由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明上河图》将在今年故宫院庆期间公开展出，为保证这件稀世国宝的安全展出，北京工业大学的科研人员日前制造出高科技展柜，给它安了新家。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绘制的不朽杰作，是我国绘画史上的无价之宝，被誉为“中华第一神品”。虽然原画仅长 5.28 米，但连同题跋总长超过 15 米。对于这样珍贵的国宝，一方面要供游人参观，另一方面还要保证其在展览过程中不被损伤，如何实现长期固定的全卷展出是一个科技难题。北京工业大学环境科学与能源工程学院院长刘中良教授说，《清明上河图》文物展柜是目前世界上最长、恒温恒湿充氮的文物密封展柜，

其照明系统也应用了先进的专利技术，各项设计指标都达到或超过了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据刘中良介绍，近年来，北京工业大学就文物保存技术的开发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对珍贵文物保存及相关温度、湿度、照明、惰性气体保护、展柜密封与安全技术开展了一系列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工作。目前，对于我国特有的书画长卷展柜的开发，北京工业大学已提出了包括温度控制系统、湿度控制系统、照明防紫外线系统、充氮密封系统、机械启闭系统、蓄热系统、自动控制显示系统和安全防盗系统等 8 个子系统组成的全面解决方案。

(李江涛)

北京国子监孔庙古建筑群大修 将恢复原生环境

北京国子监、孔庙古建筑群 4 月 7 日开始大修，恢复原生环境。维修期间照常开放，旅游参观不受影响。整个修缮工程计划于明年完成。

央视国际的消息称，这次大修包括改变国子监、孔庙现存文物的破损状态，治理综合布线凌乱、消防设备不全、安全设备落后的现状，重点进行结构和彩绘的修缮，将国子监、孔庙进行综合管理，恢复原生环境，整个修缮工程计划于明年完成。

这两古建筑都被列为“人文奥运”修缮工程，北京孔庙是元、明、清三代祭祀孔子的场所，始建于元大德六年，南北三进院落。国子监是元、明、清三代的国学最高学府，也是掌管国学政令的机关，距今已有 700 多年历史，是中国至今惟一保存完好的封建时代中央官办最高学府的校址。国子监位于孔庙西侧，共同构成“左庙右学”的建筑格局。（中新网）

北京先农坛挖出国宝级文物 尚有四大谜团未解

北京市文物局经过数十年艰苦寻找，一座重 40 多吨，曾在民间传说，却不见于史书记载的无名乾隆御题石碑，昨天在先农坛北坛区一家食品厂内的地下出土，该石碑堪称国宝级文物。

主持此次考古发掘的，北京首都博物馆副馆长王武钰介绍，出土的这座石碑由两个碑座、一段碑身和 2 个碑帽组成，大部分组件刚刚出土，目前仅剩一件碑帽仍在土中。经初步测绘，这座石碑为汉白玉材质，全高 6.7 米，重 40 多吨，上刻乾隆皇帝手书的《皇都篇》和《帝都篇》，由满汉两种文字刻成，碑座为束腰须弥座，刻有卷草花纹，花饰精美，雕工极为精细。这座御碑保存完好，碑上文字清晰可见，属国家一级文物。

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舒晓峰介绍，这座石碑的规格很高，是清代皇家御碑，上面刻的《皇都篇》和《帝都篇》，是乾隆皇帝亲手书写的楷书，其内容是乾隆皇帝历数中国适合作为国都的大城市，并一一比较，最后的结论是北京最适合作为国都，并讲出了理由。这座御碑虽然级别高，但却未见任何清朝正史记载，倒是在野史和民国报刊中有零星记述。“这座石御碑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北京出土的极为重要的文物。”

在这块无名乾隆御碑发掘的过程中，曾有专家认为，该石碑是雕凿燕墩乾隆御碑时

留下的废碑，因为出了错误，所以被抛弃在先农坛。在考古现场，首都博物馆副馆长王武钰和首都博物馆研究员王春城都驳斥了这种说法。王武钰说，这座无名乾隆御碑的材质和雕工都非常好，上面的《皇都篇》和《帝都篇》中也没有错字，显然不可能是废碑。而且这座碑上的楷书字体舒展，观赏性雕刻得比燕墩乾隆御碑要高。舒晓峰透露，这座御碑将在不久即将落成的首都博物馆新馆中展出。御碑重达 40 多吨，首博新馆的地面能否承受这么重的重量，还需要专家测算，寻求解决方案。王武钰透露，运往首都博物馆前御碑还将进行清洗和保护。至于清洗的方式，将先用蒸馏水后用超声波，让御碑恢复往日模样。

四大谜团

首都博物馆研究员王春城告诉记者，这块乾隆御碑身上，还有四大未解之谜：

首先，位于永定门外的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燕墩上，也有一块形状和规格相似的乾隆御碑，燕墩御碑上，刻的也是乾隆皇帝手书的《皇都篇》和《帝都篇》，同是隶书体。为何同样的内容要刻在两块石碑上？

其次，永定门外和先农坛相距很近，为何要在如此近的地方立两块如此高规格的皇家御碑？

第三，该御碑在民间广为流传，野史也有记载，但清朝档案中并未记载有这样一块

石碑存在。有皇帝御题的石碑为何史书中未见记载呢？

第四，当初是谁，为何要刻立这块石碑呢？发掘结束后，首博专家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寻宝经历

据北京市文物局的专家介绍，民国以来，民间一直传说先农坛附近有这样一块乾隆御题石碑。几十年来，市文物局一直对该传说高度重视，曾于1999年指示位于先农坛的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寻找这块石碑。

• 2000年，市文物局会同宣武区政府对先农坛北坛区的居民、工厂进行了大规模搬迁，迁出了70余户居民和11家小工厂，但勘探后依然一无所获。

• 2004年9月，文物局再次决定寻找神秘乾隆御碑。

• 2004年10月27日，在建博物馆会同

地矿局利用探地雷达对先农坛北门居民区进行扫描，发现食品厂所在院落中，数间办公室的地下有异物存在。

• 2004年10月30日，建馆随即对这几间办公室的地下进行挖掘，但没有收获。发掘失败后，建博物馆再次找到当地一些老人了解情况。其中有位老人称，他见过这块石碑。

• 2004年11月5日，考古工作人员对老人指认的地区再次进行扫描，在食品厂院落中的地下发现了新的异常，并精确定位。

• 2004年11月6日，建博物馆对该处进行了紧急勘探，7日上午，终于在距离地表50厘米处，发现一段汉白玉石段，上面刻的文字赫然是楷书乾隆御笔《皇都篇》和《帝都篇》，震惊了考古界。发现石碑后，首都博物馆对石碑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

北京石景山区发现由纪晓岚、刘罗锅（墉）撰写的墓志

4月18日，北京石景山区鲁谷南出土了一合清代墓志，志盖上篆：“皇清诰封光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杏浦李公合葬”墓志铭字样，墓主人是清乾隆时都察院左都御史李绶。李绶字杏浦，卒于乾隆辛亥年（即乾隆五十六年·1791），李绶任官时深受乾隆的喜爱，墓志提到“赐紫禁城骑马，口掌风宪四年”，李绶卒时77岁，为李绶撰写墓志的是清乾隆时

2个名人纪晓岚（昀）和刘罗锅（墉），墓志记：经筵讲官礼部尚书兼文渊阁直阁事河间纪昀撰，经筵讲官吏部尚书兼管国子监事直上书房诸城刘墉书。纪昀和刘墉由于电视剧热播已经家喻户晓，纪的文采和刘墉的书法能够在一方墓志上出现，实属难得，文字和书体都十分优美，是一方难得的墓志。

（陈 康）

北京房山云居寺唐代古井出土千年石经及辽代碑刻

北京房山云居寺因珍藏14278块佛教大藏经而著称于世。而石经山是石经刊刻起源之处，不仅保存着隋唐时期所刻石经、唐代古塔、佛祖舍利，还存有北京地区最大的石凿古井群。唐代开凿的2口古井规模最大。隋唐时期，石经山上僧人、工匠众多，为解决用水问题，在山上开凿了石井，汇聚泉水、雨水备用。千年石井经过多年的沉积，几被杂物所填满。为了恢复千年石井之风貌，云居寺文物管理处决定对古井进行清掏。首先清掏大石井，此井井口直径2.6米，日前清

至深7米，已抽出积水5吨。此项工作从3月30日开始，截至4月7日，井中陆续出土石经残石3方，碑刻残石1方，题记类残石1方；诗刻碑1通，方形香炉1件，共计7件文物。

其中一块高23厘米、宽10厘米的残石，经文物工作者鉴定为唐代早期静琬所刻，与雷音洞内石经基本相同，其字体隽秀，刻工精美，字里行间透出虔诚的信仰，具有珍贵价值。

而4月7日出土的宋宾王诗刻碑，高70、

宽 60、厚 15 厘米。右起第一行刻有“成拜佛巔徘徊碑似鏡瞻”十字，第二行刻有“松斜挺岩深龍自旋塵情”十字，第三行刻有“前”一字，落款为“口江宋賓王題于”六字。

经与《白帶山志·卷十 藝文 五·詩》

对照，此碑为辽代宋宾王题写的《小西天》诗，与书中所录完全一样。估计全碑高度应为 100 厘米，现存 2/3，1/3 损坏。这通佚失几百年的碑重见天日，为一重要考古发现。

（王艳华）

地坛建国后最大一次整修 力图恢复 475 年前原貌

地坛公园的方泽坛、皇祇室等古建筑将使用传统材料，按照传统工艺，力图恢复到 475 年前的原貌。

记者获悉，地坛公园开始了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整修。修整期间，方泽坛和皇祇室将不对游人开放。整修工程将于 9 月完工。

记者了解到，地坛公园此次大修将方泽坛的水泥地面全部铲除，在原有二城样大方砖做成的“垫层”上再铺一层。这种砖是比以前北京城墙砖小一号的灰色青砖，砖与砖之间的缝隙也将按照传统工艺以白灰、青灰填充。

此外，方泽坛坛墙去除现有的红色墙面，

涂上“麻刀灰” 白灰加红土，再刷上纯红土制作的“红浆”。

地坛公园有关人士表示，在传统的皇家建筑上，黄琉璃瓦瓦面和底面都由钉子来固定，为了美观和防止钉子生锈，还要为其戴上黄色“钉帽”。

由于地坛公园皇祇室的屋面自建成至今从未做过任何修缮，经过多年的风雨侵蚀，其屋面的椽子和在椽子上铺就的木板已开始破损，进而漏雨。因此，这次将对皇祇室屋面进行“挑顶”检查，以更换新的松木木板。在皇祇室内由于部分地面受损严重，本次工程还要对室内破损的“金砖”进行更换。

（北京娱乐信报）

2004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揭晓

1、河北易县北福地史前遗址

时代：新石器时代

发掘单位：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考古领队：段宏振

易县北福地遗址发现于 1985 年，是河北最重要的史前遗址之一，对研究北方地区史前文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2003—2004 年度的发掘，发现了 3 个阶段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其中北福地一期遗存是此次发掘最重要的发现，其年代与磁山文化、兴隆洼文化的年代大体相当（公元前 6000—5000 年），在地域上填补了此 2 支文化之间的空白。遗址中发现大量的房址、灰坑、还发现了祭祀场遗迹，出土了玉器、石器、陶器等重要遗物，特别是发现了大量刻陶假面面具，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史前面具作品，为研究原始宗教或

巫术提供了重要新资料。

北福地遗址正处在新石器时代中原、北方、山东三大文化区之间的夹缝交界地带，文化地理关键，是研究三系统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
重要地域。此外，遗址属于史前村落遗址，是



早期新石器文化生存发展于环境人地关系研究的较好个案标本。

2、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

时代：新石器时代

发掘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考古领队：薛新明



芮城清凉寺墓地属于寺里——坡头遗址（即“坡头遗址”），遗址最早发现于1955、1965年，属新石器时代庙底沟二期文化，墓地总面积近5000平方米。2004年的发掘共清理墓葬262座，墓葬排列有序，南北成行，东西成列，同时也存在着比较复杂的打破关系。墓内共出土玉璧、玉钺、玉琮等玉石器200余件。

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的大规模墓地在全国还是首次发现并发掘。发掘者认为，该墓地的发现和发掘促进了对以前一些认识的重新思考和定位。清凉寺墓地代表的时代是史前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而墓葬所在的区域是中原的核心地区，也是庙底沟二期文化腹心地区，当时中原地区正在发生一次大规模的文化变革，周边各种文化因素和理念在这里汇聚。这批以随葬玉石器、特殊葬制为特色的墓地，对诠释这一地区的复兴历程具有着毋庸置疑的作用，对中原地区文明起源及与此相关的学术课题研究也将有所助益，是近年来少见的重要发现。

3、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

时代：夏商

发掘单位：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考古领队：许宏

2004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发现了宫城城墙以及大型夯土基址、车辙、绿松石器及其制造作坊等重要遗存。

发掘确认宫城平面略呈长方形，面积约10.8万平方米。宫殿区内已发掘的大型建筑基址达9座，最新的发掘结果表明，其中至少存在2组具有明确中轴线的建筑基址群。二里头遗址宫城是迄今可确认的我国最早的宫城遗迹。纵横交错的中心区道路网、方正

规矩的宫城和排列有序的建筑基址群，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缜密规划、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二里头遗址的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营建制度的先河。

在宫殿区大路发现的车辙痕，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车辙遗迹，它的发现将我国双轮车的出现时间上推至二里头文化早期。而属于二里头文化四期的大型夯土工程和绿松石器作坊的发现表明，二里头遗址在此期仍属高规格的大型聚落。二里头文化四期正值一般认为的夏商王朝更替的关键期，上述发现为夏商文化分界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二里头文化早期贵族墓出土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全长逾70厘米，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的细小绿松石片粘嵌而成。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

4、新疆若羌罗布泊小河墓地

时代：青铜时代

发掘单位：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考古领队：伊弟利斯



发现罕见的具有祭祀功能的泥壳木棺墓、墓地规格最高的木房式墓葬、成排布列的“木尸”墓。

部分墓葬尸体、服饰、随葬品保存较好，采集30多具古尸标本，出土数以千计的珍贵文物。

遗存的时空关系基本廓清。

小河墓地在上世纪初由罗布猎人奥尔德

克首次发现，1934 年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进行了调查发掘。从 2002 年底以来，通过跨 4 个年度的沙漠考古，共计发掘墓葬 167 座，出土珍贵文物数以千计。

墓地的外观为一个巨大的椭圆形沙山。在不断的自然风积和构筑墓葬时的人工堆沙过程中，沙山越来越高。墓葬区南北两侧各立一排整齐の木栅墙，客观起到减缓风蚀作用。

墓地绝大多数墓葬结构一致，一般是先挖沙坑、坑中置胡杨木棺，然后在棺前后栽竖标志死者性别的立木作为墓葬标志物。一墓一棺。还发现少量特殊的泥壳木棺墓及一座木房式墓葬。

小河墓地上层的 100 多座墓葬已被破坏，完整保留下来经过科学发掘的墓约是原来整个墓地的一半。墓地上部采集到的高 3 米左右的木雕人像、数千根的短木楔在发掘墓葬中未见，表明上层被破坏的墓葬和已发掘的墓葬有较大的区别。发掘墓葬分层明确，早晚之间遗迹遗物发生明显变化，这些现象都表明墓地使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上限有可能早于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年代，即公元前二千纪初。

楼兰地区史前考古资料表明，在这一地区存在一支文化面貌独特的考古文化。由于良好的埋藏条件，墓地诸多方面的信息得以较为全面的保存，尤其是极为丰富的与原始宗教有关的遗存，一批保存相对完整的古尸、服饰等等，都为国内外史前考古所罕见。它将在更宽的领域对周边其它地区的考古产生影响。小河墓地的全面发掘是新疆史前考古的一个重要进展。

5、湖南宁乡炭河里西周城址

时代：西周

发掘单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考古领队：向桃初

发现、解剖并确认了西周时期的城墙，揭露 2 座大型人工黄土台建筑基址，清理出 2 座可能为宫殿建筑的大型房屋遗迹。在城内外均发现了与城墙同时的壕沟线索，并对

壕沟的走向、形成原因、沟内堆积情况及时代等进行了发掘。在城外台地上发现清理了西周时期小型贵族墓葬 7 座，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和玉器。



西周时期古城址是首次在湖南发现，在整个南方地区也不多见。炭河里西周方国都城遗址的发现，对研究湖南地方史、地方青铜文化和早期国家社会的形成等具有重大意义。找到了备受学术界关注的“宁乡铜器群”所属的考古学文化，为湘江流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商周青铜文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

6、江苏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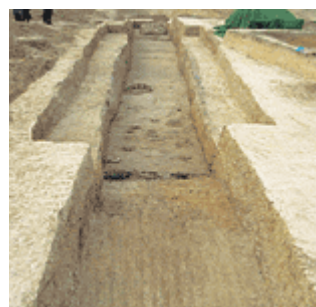
时代：春秋战国

发掘单位：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

无锡市锡山区文管会

考古领队：张敏

首次完整地揭示了春秋战国时期越国贵族墓葬在同一墓地的埋葬规律，并将墓葬分为小型、中型、大型和特



大型墓，代表了越国贵族的 5 个等级；7 座墓葬共出土 2000 件随葬品。其中丘承墩一座长 57 米的“中”字形特大型越国贵族墓葬，是仅次于绍兴印山越王墓的越国第二大墓，分为墓道、主室、后室 3 部分，主室还用木板隔成南北侧室。该墓共随葬各类器物 1100 余件，大多为精美绝伦的成组成套的青瓷礼器、乐器和玉器，展示了迄今为止江浙一带所发现的最高等级的越国随葬品的风采。500

余件青瓷和硬陶乐器堪称庞大的地下乐器库，既有中原式甬钟、磬，也有越式的淳于、丁宁、铎、铃形器，还有以往从未确认的缶，乐器的数量和品类可与曾侯乙墓相媲美；玉器中既有葬玉、剑饰，亦有佩玉，而成双成对的“五璜佩”，当为春秋战国时期最高等级的配饰；尤其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玻璃釉盘蛇玲珑球形器，是研究玻璃起源与中外文化交流的难得材料。

鸿山贵族墓地的时代为战国早期，即越南最强盛的越王勾践时期，出土文物丰富，等级差别明显，是继印山大墓之后越文化考古的重大突破，对越文化及越南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7、辽宁朝阳十六国三燕龙城宫城南门遗址

时代：十六国时期

发掘单位：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考古领队：田立坤



2003年，辽宁省朝阳市政府对朝阳市老城区内的北大街及周边地区进行拆迁改造，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改造工程，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从2003年7月—2004年12月，共发掘11个地点，发掘面积1万余平方米，揭露出多处十六国时期至清代的重要遗迹，出土了包括北燕纪年陶瓮在内的大量重要遗物。其中3号地点即朝阳北大街城门遗址的发掘，是本次考古工作最大的收获之一。考古发掘表明，这座门址坐北朝南，始建于前燕，彻底废弃于元代，共经历了前燕、后北燕、北魏、唐、辽和金元6个时期的建筑和改建，历时1000余年，这在我国城市考古中是极为罕见的发现。三燕时期的城门是首次在朝阳城内发现，其门道结构保存完好，建筑风貌独特，为研究十六国

时期北方城市的城门形制提供了实物资料。更重要的是，这座城门遗址位于朝阳老城区的中轴线上偏北处，根据其位置判断，应为三燕龙城宫城的南门，这为研究三燕龙城的布局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坐标点。寻找和确定三燕都城龙城遗址，是十六国时期考古的重大课题，也是辽宁西部地区历史时期考古的一项主要任务，虽不断有有关遗迹现象显露，但都较为零散。此次考古发掘有较好的解决，为辽宁城市考古积累了经验，是学术上的一次突破。

8、广东广州大学城南汉二陵

时代：五代十国

发掘单位：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考古领队：冯永驱



2003年2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和广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兴建广州地区高校新校区（广州大学城），选址广州市番禺区新造镇小谷围岛。3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岛上文物进行全面调查。2003年6月—2004年10月，对施工范围发现文物的地点进行考古勘探和抢救发掘。分别在小谷围岛西部的北亭村的青岗和大香山发现2座南汉时期的砖室大墓，经发掘考证，为南汉的德陵和康陵。南汉是五代十国时期割据于岭南的一个独立王朝，前后经历了55年的时间，其疆域最大时包括今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及湖南、贵州、云南的一部分，是岭南地区继南越国之后的第二个地方政权。此次发现的南汉德陵和康陵，是南汉考古的重要收获。经发掘，德陵虽未发现陵园建制，且墓室被盗，但墓道中出土的青瓷罐和釉陶罐，是广州第一次发现如此众多的五代瓷器，属官窑制品无疑。其胎质坚硬，釉色青中闪灰，晶莹透亮，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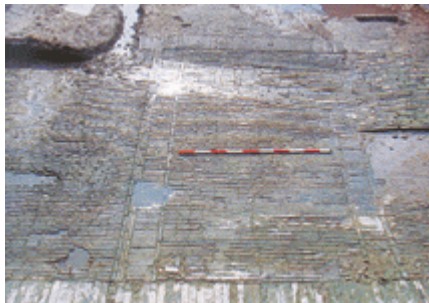
五代青瓷中的上品。为研究五代十国陶瓷器提供了实物资料。康陵哀册文碑的发现，不仅明确了墓主人的身份和下葬年代，还更正了《蕃禺县志》等文献史志对德陵和康陵的错误记述，解决了历史悬案。康陵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这一时期唯一布局完整的陵园，围垣四隅双角阙和陵前设廊式建筑的建制也与历代陵寝制度有所不同。将为研究我国古代陵寝制度的发展，提供新的材料。

9、浙江杭州严官巷南宋御街遗址

时代：南宋

发掘单位：杭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考古领队：杜正贤



为配合浙江杭州市万松岭隧道东接线（严官巷段）的道路建设，杭州市文物考古所于2003年12月—2004年8月对严官巷的南北两侧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共计1200余平方米，发现了南宋时期的御街、御街桥堍和桥墩基础、道路、殿址、围墙、河道、石砌水闸设施以及元代石板道路等重要遗迹。严官巷位于杭州市上城区紫阳街道，南距南宋皇城约400、北距南宋太庙遗址约100米，是一条长不过200、宽约5米的小巷。

南宋临安城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封闭式的里坊布局转变为开放式的街巷布局的一座典型城市。严官巷地处南宋临安城遗址的核心地带，与南宋皇城遗址、太庙遗址和三省六部遗址毗邻，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本次发掘发现的遗迹包括南宋御街、御街桥堍和桥墩基础、道路、殿址、围墙、河道、石砌水闸设施以及元代石板道路等，不仅种类多，而且保存较好，这在临安城考古中极其罕见。特别是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南宋御街遗迹，从

而确定了南宋临安城的中轴线。而御街桥堍和桥墩基础及河道遗迹的发现，是中国古代南方城市中采用河路并行体系布局的典型实例，也是南宋临安城的最大特点，对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发展和变迁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10、四川绵竹城关镇剑南春酒坊遗址

时代：清~民国

发掘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考古领队：陈德安



2002年，四川绵竹剑南春集团进行绵竹市棋盘街两侧第一生产区拆迁工程，为配合剑南春“天益老号”酒坊的维修、整治工程，2003年4—8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剑南春“天益老号”酒坊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2004年8—11月，再次在“天益老号”酒坊西南侧进行了发掘。“天益老号”酒坊遗址位于绵竹市棋盘街传统酿酒作坊区，其保存和延续了传统酿酒生产工具及其工艺流程，是一处较为全面体现剑南春传统酒文化的典型老作坊。

2年共发掘面积800平方米，清理出土一大批和白酒酿造工艺密切相关的遗迹现象，包括水井、酒窖、炉灶、晾堂、水沟、池子、蒸馏设施、路基、粮仓、柱础和墙基等类，初步了解到酒坊群布局配套设施齐备、遗迹保存完整。揭示出遗迹表明从原料浸泡、蒸煮、拌曲发酵、蒸馏酿酒到废弃用水的排放等酿酒工艺全过程，工艺流程遗迹比较完整，是一处保存较好的酒坊街区遗址，遗址年代为清代——民国。剑南春“天益老号”酒坊遗址的发掘是一次重要考古发掘，其规模之大，酿酒遗迹之全、保存之好超出以往的发现，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山东：中日文物专家联合考察胶东史前稻作农业

日前，山东大学考古研究中心、烟台市博物馆与日本九州大学考古系联合对胶东史前稻作农业及相关学术课题进行了科学考察，圆满完成了预定的各项考古计划，取得了重要的考古成果，为今后中日稻业考古工作的继续开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中国的稻作农业大约起源于公元前 6000 年以前。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就发现了许多出土稻米的新石器早期遗址，而日本目前发现最早的水稻则是弥生时代(前 1000 年左右)。所以，追溯日本水稻的源头，便成了中日考古学家和农学家孜孜以求的科学探索。目前，许多中日学者赞同日本水稻“源于中国”的论证，而中国水稻东传日本的线路又是其中的一个重大研究课题。20 世纪 80 年代初对烟台市栖霞杨家圈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龙山时代(距今 4500 年)的水稻，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其后，大连地区的大嘴子遗址也发现了晚于杨家圈遗址的水稻(青铜时代)。这就使稻作东传日本的北方

路线有了连续的 2 个关键点，即胶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九州的传播路线日渐凸显出来。稻米是日本人生活的基础之一，关于稻米东传日本的课题的研究和探索，在学术上的价值和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讲，并不亚于研究中西交通史上的“丝绸之路”。

本次考古合作是由山东大学考古研究中心申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日本九州大学考古系和烟台市博物馆共同参加的一项重大考古项目。在山东大学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栾丰实教授和日本九州大学考古系主任宫本一夫教授的主持下，山东大学、九州大学和烟台市博物馆有关科研人员正在有计划地对杨家圈遗址的周围地理环境以及出土的石质工具进行全面考察，并进行科学测试，以期在以前科研的基础上有更新、更细、更科学的发现。这次考古合作对开拓烟台市考古工作视野、提高考古技术水平、了解国际上最前沿的考古技术手段都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中国文物报)

平遥古城墙修复工程展开 全部采用传统工艺

平遥古城墙 17 米坍塌段的修复工程全面展开。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项总预算 87 万元的修复工程全部采用传统工艺，施工现场不见一台现代机械，目前地面上已经砌起 5 层砖。文物保护单位称：到今年 5 月份全部修复才能结束，但时间要服从于质量，如质量无法保证，宁肯到期不完工也不抢时间赶

进度。

2004 年 10 月 17 日下午，平遥古城南门瓮城外墙发生坍塌。关于古城墙坍塌的修复方案去年就已经通过专家论证，并报请国家文物保护管理部门批准，但因为气候原因，修复工作一直到今年 3 月份才正式开始。

(山西晚报)

西安启动“皇城复兴”计划

西安市市长孙清云日前在市人大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西安将启动“皇城复兴”计划，加大对文物古迹、历史街区和传统民居的保护力度。

西安唐皇城复兴，主要是针对西安老城区(唐皇城和宫城)约 4/5 面积加上大明宫区域在内拟定的长远规划，规划最长时间达 50 年。古唐皇城位于今西安城墙内南城区西部，宫城位于西北部，两者面积约为 9.41 平

方公里。规划内容主要根据老城的历史文化内涵，以及经济、社会形态，结合商业、科技、旅游，保护及恢复传统街区，进行城市改造，还原西安历史古都风貌，重振盛唐雄风。

规划初步设想将城市空间发展结构分为中心发展区、顺城旅游服务区、城市功能发展区和入城区。中心发展区以东、西、南、北 4 条大街为轴线，钟楼、鼓楼和城楼为标

志，区内以延续彰显老城整体形象为主。顺城旅游服务区为顺城巷及周边区域，主要发展观光旅游，缓和中心发展区的压力，构建和城墙的互动模式。城市功能发展区位于中心发展区和顺城旅游区之间，保留原有城市功能，以确保城市历史文脉传承并提供老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入城区以城楼、护城河、环城公园及影响入城转换质量的区域为范围，其中以东、西、南、北门及朱雀门为标志，提供绕、进城交通转换和停车、旅游相关的服务设施。同时，通过对交通系统的改

善、文物古迹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改善、人口控制、建筑形象规划和通视走廊控制等多项举措，降低人口和建筑密度，改善老城环境，打造人文化、生态化西安，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理念。

根据规划，若干年后，“皇城”（老城区）内人口将从 45 万降到 25 万以下，取缔部分高层建筑，城市交通将以步行为主，辅以轻便简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电瓶车、马车等交通工具。城市风格将以唐风为主，同时保留明清、民国时期的优秀建筑。（中国文物报）

布达拉宫壁画修复工程复工

自 2004 年冬季停工后，2005 年 4 月 18 日上午，布达拉宫壁画修复工程正式复工。

据西藏三大重点文物维修保护工程办负责人尼玛次仁介绍，布达拉宫壁画修复工程总投资为 569.61 万元，目前壁画维修已经完成投资过半。

布达拉宫管理处副处长丁长征介绍说，布达拉宫病害壁画总面积为 1722.68 平方米，截至目前已经完成对 687.24 平方米病害壁画的保护修复加固工作。布达拉宫今年需要完成的壁画修复主要是布达拉宫红宫南门正厅壁画、圣观音殿壁画、五世达赖灵塔殿壁画、八世达赖灵塔殿壁画、白宫门厅壁画等。

承担布达拉宫壁画修复保护工程的敦煌

研究院专家和技术人员在病害壁画保护修复实施中，遵循“先救命，后治病”的原则，按壁画病害的严重程度，对空鼓、起甲、酥碱、烟熏及壁画地仗墙体裂隙等病害分步进行保护修复加固。

布达拉宫是西藏后弘期佛教建筑的杰出代表，其殿堂、回廊、门厅内的壁画，具有显明的时代艺术特色，总面积达 2500 多平方米。这些壁画绘制于布达拉宫修建后的历史岁月中，反映了西藏不同历史时期绘画艺术的发展轨迹，体现了西藏丰富多彩的绘画艺术风格，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及文化价值。（新华网）

丹凤发现宋代八卦全井墓葬 外观呈金字塔形

近日，丹凤县商镇堡子村一村民在建房挖地基时，挖掘出一座宋代八卦全井墓葬，文物工作者推测墓葬属于宋代晚期五品以下官员或当地望族。

该墓葬位于 312 国道堡子村北塬地段，坐北朝南。外观呈金字塔形，墓道为三角形。墓室高约 3 米，面积约 6 平方米，北面有一砖砌停尸床。床上尸骨消蚀磷化严重，下颌骨较完整，其右侧残存有臼齿一枚，有光泽。墓室北壁正中有一方形呈暗红色的浮雕冥门，东北两面墙角交叉处有两幅造型逼真约 30 厘米见方的黑色陶砖类浮雕富贵牡丹图。

南面墓道内室两侧距地面约 1.5 米处各有一凸出放置长明灯的砖台。墓室四周两米高处向上逐渐内收，呈井字形，顶部留有 30 厘米见方的天窗。

丹凤县博物馆馆长刘凤皋介绍说，该墓葬属典型宋代八卦全井墓葬，可能为



宋代晚期五品以下官员或当地望族之墓。墓

主年龄大约在 40 岁至 50 岁之间。据刘馆长讲，堡子村是明清时期的城堡建筑，近年来

当地群众在耕田及建房时，不时会挖掘出陶器、剑、车轴类文物。（西安晚报）

昭陵考古有新进展 唐代皇陵寝宫气势宏大

帝陵寝宫是何等模样？前不久，陕西省考古所昭陵考古队在九山南麓缓坡地带，发掘了唐昭陵寝宫等遗址。

西安晚报报道，寝宫是唐代帝陵内高等级的祭祀设置，寝宫内供奉着先皇的衣冠和使用过的器具，住有守陵宫人各司其职、看管照料。依其生前起居方式每日按时侍奉，即“随鼓漏、理枕被”，像伺候活人一样。为搞清寝宫宫城的总体布局 and 结构，陕西省考古所此次对遗址做了钻探、调查和局部试掘。

通过钻探发掘得知，昭陵寝宫为一组完整的宫殿建筑，外周是近长方形的宫城城墙，南北长 304 米，东西宽 238.5 米，夯土城墙

厚 2.5 米左右，外表原有白灰墙皮，顶部覆瓦。寝宫北部用一道东西向内城墙隔出南北宽 47.5 米的夹城。城墙西北拐角为弧形连接，西南拐角外有放大加宽的护坡。宫城东西两面没有发现城门，南北两面辟有城门，夹城城墙上与北门相对的位置又开设一座重门。3 座门址虽破坏较为严重，但总体结构仍然大体可辨，门基址均为包砖的夯土台，结构为庑殿式，与陵园北司马门已发掘的门址结构大体相同。城墙范围内经初步钻探，发现了纵横分布的夯土墙体遗迹和大量砖瓦堆积。

本次考古还对陵园南司马门遗址进行了发掘，也取得丰厚的收获。（中新网）

安徽凤阳明中都皇故城遗址修缮工程全面展开

近日，位于安徽凤阳县府城、城西两乡境内的明中都皇故城遗址修缮工程正式启动。此举标志着明中都皇故城遗址修缮保护工程已全面展开。据了解，工程总投资 5000 万元的明中都皇故城遗址修缮保护工程是本届凤阳县委、县政府履任后首个大规模文物保护修缮项目。是为保护悠久历史文化遗存，打造人文凤阳、旅游凤阳，营造良好经济发展环境而采取的重大举措。明中都兴建有内、

中、外 3 道城，最内一道城即皇故城，此次抢救性修缮的是内城，该工程修缮范围东起午门，自东逶迤至西华门，总长约 3.68 华里，工程包括午门台基、西华门台基、皇故城南城墙、西城墙、宫殿、金水河及桥梁构筑物，搬迁居民 500 户左右，拆房 1600 多间和城内绿化等。全部工程分 2 个阶段实施，一期工程将投资 1000 万元于年底完工，并将首次向游人开放其中一段。

“国宝”文澜阁将恢复原貌 藏书楼现状仍堪忧

收藏《四库全书》的著名藏书楼文澜阁修缮工程已于 3 月 10 日开工，工程总投资 300 万元，工期为 6 个月。“文澜阁终于有救了！”中国文物协会会员徐敏喜形于色。

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国宝文澜阁面临倒塌危险。近年来，徐敏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文澜阁的保护和修缮问题。2004 年年底，他专门找到记者反映情况：“保护文澜阁刻不容缓了！”如今，修缮工程终于动工了，人们在庆幸之余，也不禁反思：这样一个“国宝”，何以残败不堪？

破败现状令人忧

位于西子湖畔的文澜阁，其前身为圣因寺藏经阁，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最初为康熙的行宫，后经乾隆改为藏书阁，为当时皇家收藏《四库全书》的七大书阁之一。如今，七阁还剩下四阁，文澜阁为江南三阁中仅存的一阁，2000 年被国家文物局确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记者来到文澜阁，只见整个阁楼木质霉烂、粉刷剥落，屋顶杂草丛生，廊亭路面残破。工作人员介绍说，每当下雨，文澜阁屋

顶就会漏雨，“如果将空调开动，感觉整栋楼都在颤动。”

根据维修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勘测：文澜阁的部分墙体已出现沉降；下水道有待疏通；部分木柱的柱根已被白蚁蛀蚀，二层楼梯间东侧的枋子已被白蚁蛀空；下屋檐飞椽霉烂达 90%……此外，文澜阁主楼前的假山也有松动。原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周贵泉称，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只怕文澜阁经受不住狂风暴雨的袭击！

几次维修收效不大

实际上，文澜阁并不缺乏维修。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文澜阁经历过 1974 年、1984 年和 1993 年等多次维修，算起来，几乎每隔十年就维修一次。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黄滋副院长甚至说：“十年维修一次，这个时间太短。”但如此频繁的维修，文澜阁仍然面临倒塌的境地，这引起了文保人士的关注。

徐敏介绍说，文澜阁里装了几台空调，一到炎热季节，工作人员就会启动，而文澜阁南门前建了个停车场，无论是空调还是汽车尾气，都对文澜阁的木质建筑造成污染。周贵泉则认为，这主要与南方潮湿的气候有关。前有西湖水汽，后有孤山湿气，而南方长期多雨，空气湿度很大，这导致了木质建

筑腐朽较快，同时也加速了油漆和粉刷物的脱落。

力求“恢复原貌”

文澜阁的几次维修中，1974 年和 1993 年两次属大修，这次修缮算第三次大修。为此，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前不久来到杭州时专程来到文澜阁，就修缮事宜作出了指示：“要确保文澜阁的修缮质量，不要盲目赶进度，选材上要选最好的。”

而此次修缮最大的特色就是“恢复原貌”。据考证，文澜阁屋顶本应该为琉璃瓦，而现在为砖瓦；文澜阁亭柱原来是墨绿色，而现在有的为红色，有的为绿色；路面原为方砖，而现在为水泥地面……在前几次维修中，文澜阁许多地方都已经被改变了原样。本着“不改变文物原样，保持原有文物的历史信息”的原则，此次修缮将尽量恢复文澜阁的原貌。

浙江省图书馆事业研究所所长林祖藻介绍，浙江省历代共有大小藏书楼 846 座，如今大概只有 10 来座。无论是浙江，还是其他地方，藏书楼的保护现状都令人堪忧。对文物的保护，还需要政府更大的投入、更多的重视。

（人民日报）

秦阿房宫“烽火台”验明“正身”实为“皇家公园”观景台

西安市西去 10 余公里有一处自古遗留的夯土台，长时期被世人认为是秦阿房宫“烽火台”遗址。阿房宫考古队日前科学发掘验证了它的真实“身份”，这一遗址原是战国时秦国上林苑的观景台类建筑，其建造年代应早于阿房宫。

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联合组成的阿房宫考古队在寻找、确定阿房宫的界线和范围时，对所谓阿房宫“烽火台”遗址进行了科学勘探和发掘。这一遗址位于战国秦上林苑一号遗址正南 1300 米处，即阿房宫前殿遗址西南 2450 米处。遗址下部为夯土台基，上部原应有建筑，可明显看出有每层厚 5 至 7 厘米的

夯筑层。夯土台基南北长 48.7 米，东西现存长 73.5 米，通厚 3.6 米。上部建筑遗址现存底部南北长 28 米，东西长 13.2 米；顶部则南北长 9 米，东西长 5.5 米，现存高 4.1 米。考古工作者在夯土台基南 2 米处发掘出土了一些板瓦及筒瓦残片。板瓦表面为细密交错绳纹，内面为素面；筒瓦表面全是细绳纹，内面为麻点纹且泥条盘筑痕迹明显，这些完全异于晚期瓦的特征，而与战国秦上林苑一号遗址出土的瓦片完全相同，应属于战国秦时代遗物。

阿房宫考古队长、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毓芳据此推断，这处遗址应是战国时期秦上林苑中建筑之一，秦上林苑早在秦统一全国

之前就已建造,比阿房宫前殿的时代早得多。

李毓芳介绍,在残存遗址南部、自底部向上 1.4 米处发现一未扰动过的柱础石,说明这一遗址上部原应有类似回廊的建筑。从出土遗物单一、均为建筑材料(板瓦片和筒瓦片)且数量很少来分析,其顶部的正式建

筑应较简单,并非复杂的宫殿建筑。因此,这一建筑遗址应为一处观景台类的建筑,原来认为这一遗址为阿房宫中的烽火台是没有科学根据的,“烽火台”这种军事报警设施建在“皇家公园”里也不合常规。上林苑里宫殿台观众多,有观景台类建筑是合乎情理的。

山西绛县西周墓地考古有重大发现

经过 4 个月多的紧张发掘,山西省文物局考古所在山西绛县横水村北部的山坡上发掘出一处可能是西周时期比古代晋国低一级的诸侯国国君墓。墓中发现多部铜质车马器构件的陪葬车和大量的玉器、铜器,其中出土的荒帷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好、面积最大的墓内装饰图案实物。专家认为,该墓地对研究西周时期当地的文化、经济有极大价值。

此次发掘的墓地是一处西周并可能沿用到东周和汉代的大型墓地。目前已清理出的 3 座大墓中,1、2 号墓是一组夫妇并穴合葬墓。1 号墓中出土了铜质车马器构件的陪葬车及大量玉器、铜器和骨器,其中骨器中的骨牌玛瑙管料管组佩达 10 组之多,骨牌上镶嵌有绿松石图案;玉器中的玉璜无论是玉质还是纹饰都非常精美。2 号墓随葬品有车马器、铜鼎、铜辖、陶鬲、簋、尊、觥、盘、爵、卣、甬钟等。鼎、盘、尊和卣内均有铭文,铭文共 230 个字。其中鼎和盘上的铭文为“□伯□作宝鼎……其万年用永”、“□伯□作宝盘其万年用永”。第一个字不太清楚,但从笔画上

看,似与“𠂔”相同。专家分析这可能是一个封国的国名,如再结合后面的“伯”字分析,该封国应是较晋国低一级的诸侯国。第 3 字漫漶不清,但与前面的“伯”连起来,可能是该国国君的名字。尊和卣上的铭文几乎相同,其中有“东征……于成周”等字,作何解说,专家说有待深入考证。

据专家介绍,1 号墓最重要的发现是椁室内出土的总面积达 10 平方米之大的荒帷。荒帷即当时的棺罩,位置在棺椁之间。此次出土的荒帷围在一个长方体架子上,主体为红色纺织品布,布的外面有非常精美的刺绣图案,图案内容是凤鸟呈祥。布北面的图案保存较为完整,目前至少可观察到 3 组大小不同的鸟纹图案痕迹,图案中间是一个大风鸟纹的侧面形象,大勾喙、圆眼、翅和冠的线条以夸张的手法作大回旋,流畅舒展,气势磅礴。在大凤鸟的前后,各有 4 只小凤鸟,上下排列,造型与大凤鸟基本相同,只是稍含蓄点。

考古人员认为,从埋葬习俗和随葬品看,该墓地埋葬的是一个不见于文献记载的西周时期小封国的国君。(光明日报)

山东济南郎茂山路发现元代家族墓

1 月,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接到群众报告称位于济南市市中区郎茂山路 32 号的天宇房地产公司工地发现古代墓葬,随即派人进行了调查,初步确认是一处元代家族墓地。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对此处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墓葬 3 座,出土各类文物 20 余件。

现场的 3 座墓葬,在郎茂山西部的山坡上自东向西排列依次为 M1、M2、M3,均为

石室,石墙厚度均为 0.4 米,皆用大小不一的巨石错缝砌筑而成。而且 3 座墓葬均为 2 人以上的合葬墓。

M1 总体呈“甲”字形,方向 190 度,由墓室和墓道组成。墓道残长 4、宽 1.5 米,墓道的前段为阶梯形,残留 2 个宽 0.35、高 0.4 米的台阶。后段靠近墓门处变为斜坡形。墓室通过墓门和墓道相连,墓门外侧两边有用不规则石块垒成的 2 米高的仪墙,墓门位于

两仪墙正中，用长 1.3、宽 0.85、厚 0.22 米的石板封门。封门石上方是一块长 1.3、厚 0.4 米的门楣；门楣外侧有 4 个石雕团花图案，周围用红彩绘菱形花纹。门楣内侧位于墓室内部，正中自左向右楷书书写“寿春堂”3 个大字，左侧楷书自上而下小字书写“至元庚辰年九月吉日造”。墓室平面形状上圆下方，最底部用厚 8 厘米的石板铺成，墓室内侧南北长 3.6、东西宽 3.5、高 3.54 米，用规整的巨石垒成，石块较大，但大小不一，其中北边一块最大，长 3.5、宽 0.9、厚 0.4 米，最小的也有 1.6×0.4×0.4 米，在距墓底 1.3 米处开始券顶，墓室平面也变为圆形。墓室顶部遭到机械破坏且有盗洞痕迹，情况未知，墓顶距地表约 3 米。M1 棺尚未腐烂，但遭到施工的严重破坏，仅可看出棺厚 10 厘米，皆为柏木制成。M1 内发现 2 个头骨，可能最少有 2 人合葬。M1 出土 2 件瓷器和数枚钱币，瓷器一件为敞口深腹刻花青瓷碗，另一件为蓝釉大圈足盘。

M2 在 M1 西 22 米处，除 M2 外侧门楣上方，有石块垒成的女墙与墓顶持平外，形制与 M1 完全相同，也由墓室和墓道组成，方向 190 度，整体比 M1 向南 1 米。M2 墓道残长 2.5、宽 1.5 米。门楣内侧楷书自左向右书“幽邃堂”，左侧无题年纪款。墓室内侧南北长 3.6、东西宽 3.55、高 3.5 米。顶部用直径为 0.8、厚为 0.4 米的圆形石块雕成圆形莲花藻井，在莲花座的花瓣上嵌一圈圆形方孔钱。墓顶左侧有一圆形盗洞。M2 内填满淤土，表明早年大量进水，骨骼漂移，加之被盗也不能分清葬式及棺槨，仅见 3 个头骨。M2 出土 3 件瓷器、1 件陶砚台、1 件铁犁铧、2 件金饰品和 1 块残石碑及 30 余枚钱币。瓷器

一为影青瓷香炉，一为白釉黑花碗，另一为月白色瓷盘；金饰品一为耳环，另一为发饰并配绿松石；石碑残，仅断断续续可见“…处士…王氏…氏之墓”、“…春三月十有二日哀子有…志石”。

M3 位于 M2 西侧 13 米处，比 M2 的墓室整体向南 1.5 米，与 M1、M2 不同，M3 整体呈长方形，无墓道。内侧东西长 3.9、南北宽 3、高 1.35 米，墓室内用厚 0.36 米石墙把整个墓室分成中室和东西侧室 3 部分，中室宽 1.2、东侧室宽 0.94、西侧室宽 0.92 米，两侧石墙中部各有一个 0.52 米见方的孔与中室相通。底部用石板铺地，顶部用 20 厘米厚的石板封顶。棺已经腐烂，仅见痕迹，人骨漂动，但可判断 M3 内每室一棺，皆头向南。M3 出土瓷器 13 件，钱币 10 余枚。瓷器有：开片纹白瓷玉壶春瓶 1 件、影青瓷双耳罐 1 件、白釉浅盘碗 3 件（碗底有毛笔写的“曲”字）、白釉黑花碗 1 件、折沿蓝釉瓷碗 1 件、圈足蓝釉杯 1 件、大敞口小圈足蓝釉碗 2 件、黑瓷罐 1 件、白釉黑花“元”字碗 1 件和白釉瓷盘 1 件。其中除 2 个侧室内各放一个碗外，其余随葬品皆为中室所出。

3 座墓葬内出土的钱币多已腐朽严重，从可辨清的钱纹来看多为宋代通宝钱，主要有：元丰通宝、嘉祐通宝、崇宁通宝、淳化通宝、政和通宝、天禧通宝、皇宋通宝等。

从 M1 门楣上纪年款和 3 座墓葬的形制及排列看这是一处元代家族墓地。在元代有 2 年为“至元庚辰年”，一是元世祖在位期间即 1280 年，一是元惠帝在位期间即 1340 年。

这种形制的元代家族墓在济南是首次发现，特别是墓室使用“堂”字号命名更使墓葬多了几分雅致。

河北宣化发现一处汉唐墓群

2004 年秋—今年春，河北省宣化市文物管理所在宣化工程机械厂基建工地上，经过文物调查和勘探，发现了一处规模较大的汉、唐时期的墓葬群。已进行抢救发掘的有汉代砖室墓 3 座，唐代砖室墓 4 座。

这处墓葬区距宣化城东南 1 公里左右，墓室建在地下 4.6 米。其中，3 号汉墓规模宏大，墓室南北长 18.6、东西宽 10.3 米（未加墓道），墓室多达 8 个，占地面积 98.7 平方米。该墓的形制也很独特，墓门朝向东，并

列建有双墓道、双墓门、双主室。2 个主室之间有甬道连通。主室各自又有后室、侧室相连，成为 2 个相通的单元结构，从而构成一座完整的大墓。这种结构的墓葬在当地首次发现，由于毁坏较严重，出土随葬品不多。1、2 号汉墓也是并列修建，相距 5 米，应该属于同一家族。墓门朝向北，也为多室结构。出土了青铜剑、漆盒和大量陶质随葬品。3 座汉墓的墓葬形制、出土器物与当地东汉中期墓葬相近，应属这一时期。

唐代墓葬在汉墓北侧，抢救发掘了 4 座，均为弧方型单室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构成。墓室顶部叠涩成穹窿顶，室内四角有仿木砖雕的柱子、斗拱，四壁有砖雕板

门，方格窗及椅子、衣架、灯架等装饰。出土有白瓷碗、陶罐、塔型器座等随葬品。其中，4 号唐墓出土了一件鎏金芦雁纹四曲海棠式银杯，非常精美。这件银杯，椭圆形、花口，口径 16.2×10.5、高 4.6、圈足高 1.3 厘米。杯内外髹黑漆，口沿和四曲处鎏金，杯内阴刻描金纹饰，为芦雁游鱼图案。银杯造型别致，图案精美，是一件价值很高的艺术品。这批唐墓与当地发现的一些有纪年的唐代晚期墓葬相似，应属同一时期。

这处汉唐墓群的发现，增加了汉代墓葬的类型，丰富了出土文物的种类。为研究历史上张家口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新的资料。（颜 诚）

考古证明清江流域是人类起源地之一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善才 15 日向记者公布了清江流域考古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并证明了清江流域是人类起源地之一。

清江是长江中游南岸的最大支流，也是长江出三峡之后的第一条支流。全长 440 多公里，流经鄂西地区，其流域面积近 17000 多平方公里，总落差 1500 米，有着极为丰富的水力资源。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配合清江梯级水电工程建设开发，湖北考古工作者对该地区进行了为期 10 年的全方位考古发掘。王善才研究员告诉记者，在清江流域发现了“建始人”化石，经中科院有关专家鉴定，距今 215 万-195 万年前。继此前在长阳地区发现有距今近 20 万年的“长阳人”化石之后，考古工作者在发现地附近的清江流域，又发现了伴峡小洞、鲢鱼山和伴峡榨洞等几处旧石器遗址。伴峡小洞发现了距今 13 万年左右的旧石器和人类用火的遗迹，鲢鱼山发现了距今 12 万-9 万年的人类用火遗迹，榨洞发现了距今 27000 余年的旧石器和人类用火的灰烬层。此前的考古研究一般认为，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因为有不少年代在 200 万年以上的早期人类化石在非洲发现，虽说有专家提出“亚洲起源说”，我国也发现了北京人、元谋人、郧县人等不少直立人化石材料，

但没有超过 200 万年的，使亚洲说缺乏有力的实物材料作支撑，难与非洲说相提并论。考古研究认为，距今 10 万年前后，现代人类走出非洲，走向欧洲、亚洲等地，灭绝了那里当地土著人，繁衍后形成了现代的白种人、黄种人。这也就是说，近 10 万年来我们中国人的直系祖先源自非洲。

王善才表示，清江流域发现的“建始人”化石距今 200 万年以前，这为亚洲起源说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王善才还说，在清江流域长阳地区发现了 13 万年、12 万年前的旧石器和人类用火的遗迹，就证明中国现代人是由自身本土连续发展起来，否定了近 10 万年来中国人的直系祖先源自非洲这一说法。清江考古的这些重大发现无疑是对人类起源单一说的挑战，证明了中国现代人是本地人的直系祖先传下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认为，从距今 20 万年的长阳化石，到距今 10 万年左右的鲢鱼山遗址和伴峡小洞遗址，再到距今 2 万多年的伴峡榨洞遗址，以及清江流域我国已发现的最早古人类“建始人”化石及旧石器，这些考古发现足以证明现代人类在我国发展具有连续性，对于当今中国乃至东亚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对于探讨人

河南郑州商城遗址保护首引民间资金

日前,《商都建设项目贷收资金信托计划》发行仪式在郑州商都文化广场隆重举行。居民可通过购买该信托产品的方式投资郑州商代遗址保护等政府投资的文物保护项目。这种以信托方式吸引民间资金用于文物保护在河南省尚属首次,是郑州市政府对郑州商城遗址保护的创新举措。

近年来,郑州市政府非常重视郑州商代遗址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已经累计投入资金4000万元,其中大部分资金用于拆除商代城墙上的建筑物及对城墙本体进行绿化植被保护、商都文化广场建设等。现在,商代遗址较以前面貌大为改观,但因保护资金仍有较大缺口,商代遗址有部分地段还没有整治。

为深入挖掘郑州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内涵,营造古都文化氛围,今年郑州市政府计划对商代遗址进行综合整治。主要包括:商代城墙遗址保护工程、文庙复建工程及城隍庙修复工程三大部分。其中商城遗址保护是对东城墙南段及南城墙进行保护治理,总长约3740米;文庙复建工程包括对现有古建筑的维修保护及按文庙规制进行恢复建设;城隍庙维修包括对古建筑群进行屋面维修及油漆彩绘等。

商代遗址保护与综合整治本来已列入了去年郑州市政府的改造项目,但因改造项目所需资金量较大,融资困难,又列入了今年的政府改造项目。单纯依靠政府投资来保护商城遗址存在一定困难,文物保护资金缺口问题,必须通过多渠道筹措来解决,吸纳民间资金参与保护是可行之策。民间资本投入文化遗产保护,在国外已非常普遍,而在中国才刚刚起步。

文物保护资金短缺在全国都很普遍,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谈到“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加大了文物保护经费的投入,使部分濒临毁坏的文物得到妥善的保护。但是,文物保护的经费投入仍远远赶不上需求的增长,资金短缺始终制约着文物保护工作。”

郑州市政府此次发行《商都建设项目贷收资金信托计划》目的是用信托投资方式吸引民间资金用于文物保护,引起社会大众对文物保护的关注,提高民众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为商城遗址将来的保护与发展找到可行之路,也是对解决文物保护事业经费不足问题进行的新的探索。

(郑州市文物局)

全国首家木质文物保护基地落户湖北

全国首家木质文物保护基地日前落户湖北。这为中国漆木竹器等木质文物的保护提供了科技成果推广和应用的科技平台。

据从湖北省文物局获悉,这个保护基地设在湖北省文物保护技术研究中心,集中了湖北省博物馆相关业务骨干近30人。其主要职责是,对木质文物保护中出现的难题进行攻关,推广应用成熟的文物保护科技成果。

文物保护技术的推广应用是中国文物保护事业亟待解决的问题,近年来,中国文物

保护技术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由于诸多条件的限制,无法得以推广。例如已基本成熟的漆器保护技术,因为推广不到位,以致很多单位的漆器文物泡在水中达数十年之久。

湖北省文物保护技术研究中心在漆木竹器的脱水保护方面,取得了多项科研成果。目前,在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的具体指导下,基地正组织编制文物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等,基地将逐步推广漆木器脱水保护、糟朽纺织品修复、利用细菌纤维素修复保护木质文物等科研成果。(新华网)

重庆大足石刻防风化保护取得成功

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其防风化保护工程取得成功。笔者日前从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获悉：面积达 600 多平方米的首期“地狱变相龕”项目段，已成功攻克渗水、局部加固和整体封护三大难点，工程已经结束。

大足石刻造像，从 7 世纪开始，已历经 1400 多年的沧桑。个别龕窟早年崩塌，部分造像存在严重的风化现象，有的局部残损，细部湮蚀，岌岌可危。作为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防风化保护近年来受到各方关注重视。全国各地的专家提出过许多可行的保护方案。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从去年 8 月开始，对宝顶山石刻内的“地狱变相龕”项目段实施防风化加固修缮工程。在龕窟岩体加固中，主要采取垫、砌、支撑、锚固等

手段，并用化学材料灌注岩体裂隙。对少数风化严重的造像，采用化学材料封护表层等。另外，还通过堵截、引导等手段，治理渗水。该项保护技术经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敦煌研究院等全国文物保护专家的现场检查后，对此给予首肯。

据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馆长郭兴建介绍，大足石刻防风化自 1977 年算起，至今已完成保护工作 70 余项。这次工程为规模最大，成效最显著。记者在现场看到，经过各种手段加固封护，有“东方蒙娜丽莎”美誉的“养鸡女”造像，又恢复了昔日一位农家少妇掀开鸡笼，2 只鸡正在争啄一条蚯蚓的栩栩如生场面，雕像充满了浓郁诗意般的乡村风情。

重庆万州大坪发现东周巴文化墓群

为配合三峡工程建设，对三峡库区地下文物进行抢救和保护，湖南省益阳市文物管理处配合重庆市文物考古部门于 2001-2004 年，对万州大坪墓群连续进行多次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达 11680 平方米，共发掘东周至六朝时期墓葬 158 座，其中东周巴文化墓葬 67 座、汉墓 61 座、六朝墓葬 30 座，出土各类文物 600 余件，其中各种铜器 200 余件。

大坪墓群位于重庆市万州区 渡镇石山村大坪社，墓地形状为一长条形台地，东临长江，自南往北为一陡坎，台地南部地势平坦，北部呈缓坡状。东周墓集中分布于北部靠江边一带，汉墓和六朝墓则整个台地从南往北均有分布。

这批东周墓葬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残存深度 0.5-2.9 米不等，大部分墓坑为狭长方形(54 座)，少部分系墓口大于墓底的宽坑墓(13 座)。墓室最大的面积达 10 平方米，面积最小的仅 1.6 平方米，头向以东向的居多，少数为南北向。墓坑填土均系黄沙泥土回填，墓坑上下均未发现白膏泥。少数几座宽坑墓底有枕木沟，葬具已全部腐朽无存，

仅部分墓葬可看出葬具痕迹，从残存痕迹分析有单棺和一棺一槨。从保存下来的部分人骨架观察，葬式以仰身直肢为主，有少量仰身屈肢葬和二次葬，有的保存人骨架的墓未见头骨或仅见下半身。

这批东周墓随葬器物以陶器、铜器为主，其中铜器多达 130 余件。另有少量的玉器、琉璃器、铁器等。除少数几座空墓外，其他墓随葬器物少则 1-2 件，多的达 30 余件。陶器以泥质红陶、夹砂灰陶、褐陶为主。纹饰以绳纹为主，另有少量弦纹、篮纹、刻划纹等。制法主要为轮制，个别器物的某些部分为手制。器形以罐、壶、豆为主，另有少量鼎、敦、鬲、高足小壶等。陶器组合以罐、罐、壶；罐、豆为主，仅见一组鼎、敦、壶、高足小壶(豆)的组合。青铜器以青铜兵器(剑、矛、钺、斧、箭镞等)和青铜容器(釜、釜甑、壶、盒等)为主，另有少量的斤、匕、铜铃、印章及青铜带钩饰件。青铜兵器中的剑、矛、钺或剑、矛、钺、斧的组合是这批东周墓铜器的主要组合形式。

陶器中的绳纹釜、花边口沿罐，灰陶平

底罐，青铜器中的釜、釜甗、扁茎无格无首柳叶形剑(饰虎纹、手心纹)、柳叶形矛、钺、虎纹戈、图形印章以及玉饰件等为巴文化中常见的典型器物。因此，这批东周墓葬的文化性质应属于巴蜀文化，其年代大致在春秋末至战国中期。从墓葬形制和器物组合分析，应相对早于云阳李家坝以及开县余家坝巴文

化墓地。推测大坪墓地在春秋战国时期应为巴人某一群落的公共墓地。在一个墓地集中发现如此众多的东周巴文化墓葬，在三峡库区尚属少见。墓中出土铜器较多，其中，M136出土的精美青铜带钩链饰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在渝东地区巴文化遗存中系首次发现。

江西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考古发掘又有新收获

2004年9-12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继续联合对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755平方米，出土了一批墙、窑炉、掩埋落选御用瓷器的小坑等遗迹和一大批明代早、中期的落选御用瓷器等遗物。

墙是去年发现的主要遗迹之一，出土多道，较为重要的是第13号墙。该墙遗迹发现于珠山北麓，与2003年出土的第10号墙遗迹是一个整体建筑。这2道墙揭露出来的部分合在一起构成一个矩尺形，基本为东西、南北走向。揭露出来的长度，第13号墙(东西向)19米，第10号墙(南北向)8.7、宽0.6、残高0.5-1.66米。墙体以匣钵片等材料立砌而成，转角处以砖砌制，每隔6米左右便在墙体中砌一砖垛，以起加固墙体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第13号墙的下部、距转角8.4米处留一高0.35、宽0.2-0.3米的孔洞，洞左右上三壁均为砖砌。该墙建在元代至明代初年地层之上，叠压在明宣德早期地层之下，并在墙体砌建材料中发现有明洪武早期烧造的板瓦。由此推断，其年代为明洪武至永乐时期。其用途，据其形制、规模、位置和墙下部留有孔洞分析，很有可能是院墙。明代王宗沐《江西



遗迹的出土，不但证明明代初年(洪武至永乐时期)珠山北麓有建筑，而且还是御器厂活动和生产的主要区域。只是在宣德及其以后才成了堆放窑业废弃物和掩埋落选御用瓷器的场所。这一发现填补了文献记载的空白。

窑炉是去年发掘出土的重要遗迹，可分为葫芦形窑和馒头形窑2类。葫芦形窑遗迹3座，出土于珠山北麓，即御窑遗址的东北部。皆以楔形砖砌制，均由窑前工作面、窑门、火膛、前室、后室、护窑墙等部分组成，形制相同，大小基本一致。其中第6号窑遗迹保存比较完整，窑前工作面长4.8、宽6.2米；窑门呈“八”字形，向左右弧撇，宽0.7、残高0.6米；火膛呈半圆形，进深1、最宽处3.2、低于窑床前沿0.5米；前室亦为半圆形，与火膛合成一个圆形空间，进深1.46、直径3.2米；后室窄长，左右两壁齐直略外斜，后壁为弧形，长6.9、宽1.96-2.28米；窑床前低后渐高，倾斜度为10度；窑壁厚0.3、残高0.5米；窑壁外侧有一道宽约0.14-0.44米的护窑墙，以残砖、断瓦和匣钵片砌制而成。这3座葫芦形窑炉遗迹是一个整体，均叠压在明宣德层之下，窑床前沿挡土墙砌制材料中有较多的明洪武早期烧造的板瓦，并在第6号窑的护窑墙内发现一块明永乐时期的白瓷砖。由此可见，其年代为明洪武至永乐时期。馒头形窑遗迹14座，出土于珠山南麓，即御窑遗址南部的西侧。皆以小砖砌制而成，均由窑前工作面、窑门、火膛、窑室、烟道、排烟孔、烟囱、护窑墙等部分组成，规制较小，形制相同，大小相差不过0.3米。第14号窑遗迹基本保存完好，窑前工作面宽广；

窑门呈“八”字形，弧线外撇，宽 0.54、残高 0.48 米；火膛呈半圆形，进深 0.46、最宽处 2.02 米，低于窑床面 0.42-0.52 米，左右两角以砖封砌；窑室左右两壁齐直，平面呈横长方形，床面平整，长 1.38、宽 2.02 米；窑床后为一横向烟道，长 2.02、宽 0.22、深 0.18 米；后壁下部设 6 个排烟孔，宽 0.12-0.16、高 0.12 米；烟囱平面呈横长方形，后两角为弧形，长 0.35、宽 2.02 米；窑壁厚 0.3、残高 0.1-0.68 米。这 14 座馒头形窑炉遗迹也是一个整体，相互间有明显的打破关系，发现有 3 层窑炉遗迹叠压的情况，说明其延续时间较长。这批窑炉遗迹均叠压在明万历至清代初年地层之下，明宣德时期的窑业废弃物皆堆放在最下层窑炉遗迹的护窑墙外。其年代应为明宣德至万历时期。葫芦形窑和馒头形窑遗迹的发现及分析结果表明，明代御器厂，明洪武至永乐时期主要使用葫芦形窑，宣德及其以后主要使用馒头形窑。这 2 种形制的窑炉，在明代以前的民窑就已被使用，但明代御器厂不是照搬，而是做了调整、改造，使其更有利于烧成，更适合于御器厂的生产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在出土的馒头形窑炉遗迹中，有的烧得很重，壁内侧挂满了厚厚一层“窑汗”；有的则烧得较轻，壁内侧没有生成“窑汗”。这显然不是偶然的情况，前者可能就是《江西大志·陶书》等文献中记载的专烧高温小件器物的“青窑”，后者可能就是专烧低温颜色釉的“色窑”。

掩埋落选御用瓷器的小坑、小堆和小型片

状堆积，是御窑(官窑)遗址内所特有的一种遗迹。去年共发现清理了 14 个小坑，均为宣德时期，其中 8 个坑内出土的瓷器为永乐时期烧造的。第 22 号小坑，内掩埋的落选御用瓷器是永乐时期的，该坑为圆形，直径 0.59、深 0.12 米，出土红釉碗、盘、靶盏计 48 件；第 21 号小坑，掩埋的瓷器均为宣德时期，该坑基本为圆形，直径 0.8、深 0.1-0.26 米，出土碗、盘、靶盏、梨形壶等瓷器计 52 件。共清理了 2 个小堆，均为宣德时期。是将落选御用瓷器打碎后堆在一起而形成的。

第 1 号小堆平面基本呈圆形，底径 0.4-0.5、高 0.2 米，出土梅瓶、梨形壶、大罐、碗、盘等瓷器 10 余件。小型片状堆积，保存比较好的有 2 个，年代均为宣德时期。其是将落选御用瓷器打碎后倾倒在窑业堆积层的上面，面积不大，形状不甚规则。第 10 号小型片状堆积平面略呈椭圆形，直径 1.2-1.8、厚 0.08-0.29 米，出土缸、碗、盘、梨形壶等瓷器 10 余件。掩埋落选御用瓷器的小坑、小堆、小型片状堆积的发现，为研究明代御器厂落选御用瓷器的处理方式乃至管理制度提供了宝贵资料。

出土遗物相当丰富，以瓷器为大宗。御窑产品主要是明代早、中期烧造的，其中以永乐、宣德时期的数量最多，也最精美。这些御窑产品均出土于小坑、小堆、小型片状堆积内



和普通的地层中，大多都可以复原，有一部分还可以粘对起来。其种类较多，有釉里红、红釉、紫金釉、蓝釉、白釉、黄釉、孔雀绿釉、青花、斗彩、仿哥釉、仿宋官青釉、仿龙泉青釉瓷器等。器类也较多，有梅瓶、玉壶春瓶、梨形壶、大罐、罐、碗、盘、杯、靶盏、盒、调色碟、炉、觚、爵、缸等，以碗、盘数量为多。胎细白、釉莹润。装饰技法有刻花、印花和笔绘等，纹样以龙纹最为常见。部分器物上印制、刻写或书写年款，永乐时期少数器物上印制或刻写“永乐年制”篆书款；宣德时期部分器物上刻写或以青料书写“大明宣德年制”或“宣德年制”楷书或篆书款；成化、弘治、正德时期多以青料书写“大明成化年制”、“大明弘治年制”、“大明正德年制”、“正德年制”楷书款。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批瓷器中，有些品种在以往同时期的考古资料和同时期的传世品中所不见，如永乐里红釉外点釉里红碗、永乐红釉印花花果纹盖盒、宣德孔雀绿釉鱼藻纹梅瓶、宣德孔雀绿釉鱼藻纹梨形壶、宣德洒蓝釉刻

花海水云龙纹大罐等；有的则是罕见之佳作，如永乐白釉里印龙纹外釉里红云龙纹靶盏、宣德蓝釉白鱼藻纹碗、宣德青花花卉纹调色碟、宣德青花云龙纹大缸等。这批明代御窑瓷器，数量多，内容丰富，有些属于首次发现，有的还是孤品，其资料价值不言而喻。虽然有一些见于传世品中，但它对于揭示明

代御器厂的发展变化和生产活动等有着传世品所无法替代的作用。

2004 年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考古发掘收获颇丰，出土遗迹、遗物为研究、探讨明代御器厂的发展变迁、烧成技术及其渊源、落选御用瓷器的处理方式、产品种类等提供了新的科学资料。(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考古队)

江苏淮安市中心发现六朝家族墓

3 月 3 日，淮安市博物馆接到群众报告称位于江苏淮安市市中心的财富广场工地发现古代墓葬，随即派人进行了调查，初步确认是一处六朝家族墓地。淮安市博物馆对此处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墓葬 14 座，出土各类文物 20 多件。

14 座墓呈雁阵式排列，墓向在 160° -180° 之间，墓与墓之间相距 50-80 厘米，由东向西依次排开，墓葬均为长方形单室券顶砖室墓，由短斜坡墓道、墓门、墓室组成，建筑设计合理，布局规范对称，墓道长 200-300、墓室长 280-340、宽 140-240、高 120-160、墓顶距地表 700 厘米左右，墓壁均以“三顺一丁”组砖上砌，2 或 3 组后以 3 层平砖及楔形砖上砌起券。墓门构筑同样采用双砖“三顺一丁”或“二顺一丁”2-3 组叠砌，丁砖采用楔形砖宽窄结合竖砌而成，其上平砖顺砌至顶，顶上再铺楔形砖压券。墓葬一般都有 1-3 个近方形壁龛，位于墓室左右后壁丁砖上，左右壁龛对称，后壁壁龛位于正中。墓室底部铺斜“人”字形地砖。

M1 为墓群中最大的一座墓，位于墓群最东面，墓室四壁均采用双砖叠砌而成，墓室长 340、宽 240、高 160 厘米，墓壁四组三顺一丁后起券，丁砖两头均模印有圆形莲花纹饰，墓室左右两壁砌置有 4 个对称的壁龛，后壁中部砌有一个壁龛，墓底铺斜“人”字形地砖。

M4M5、M6M7 为 2 对夫妻合葬墓，4 座墓葬两两连为一体，墓壁之间有小型券顶甬道相通，在甬道中部有木质痕迹，可能为一扇小门。在 M6 底部清理出一段腐朽木头，应为棺具。墓葬砌法和其他墓葬无异，只是墓室内的砖为灰黑色，可能是墓室经过烟熏处理过。

这批墓葬在清理中均不见人骨，在 M1 中发现了铁质棺钉和几块炭化较严重的木块，这些应为棺具残留物。此次发掘共出土青瓷器 20 多件，器形有四系盘口壶、四系罐、平底小碗以及灰陶四系罐。这些随葬品摆放比较有规律，一般是在墓室前面摆放一壶或一罐加一小碗，墓室后部紧贴墓壁放置一平底碗，一座墓基本出土 3 件器物，器物釉色较好，保存状况不错。出土几枚钱币，但锈蚀严重，目前无法辨认释读。

在六朝墓群东北 50 米处，还清理了一座西汉墓，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向 95°，长 260、宽 150、深 230、墓底距地表 800 厘米，木质棺具已经炭化，根据痕迹判断棺具长 240、宽 120 厘米，出土灰陶壶 2 件、灰陶立耳鼎 3 件、黑陶罐 1 件，灰陶盒 1 件、灰陶钁 1 件。

此次墓群的发现在淮安城区尚属首次，这为研究淮安地区六朝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实物资料。

无锡越国贵族墓改写中国制瓷史

2005 年 4 月 10 号，专家证实了这次考古发掘的一个重大意义，我国成熟瓷器的制

造史至少被提前了 700 年。

记者现场：这是刚刚发掘出土的 500 多

件战国乐器中的一组编钟，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500 年前制作的编钟的声音，和以往考古发掘出土的乐器不同的是，这组乐器是用青瓷制成的。

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只零星出土过用青瓷制成的乐器陪葬品。而这次出土的近千件瓷器中，瓷乐器就有 10 个品种、500 多件，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瓷制乐器队，而且把我国成熟瓷器出现的年代从东汉晚期提前到了战国早期，至少提前了 700 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考古部首席专家 北京大学
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

李伯谦：这 1000 多件瓷器，它的胎质非常纯净，它的釉应该说非常匀称。而根据测定它的烧成温度在 1000 多度以上，因此从这几个条件来看，它确实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把成熟的中国瓷器提前了几百年。中国是瓷器的故乡，证据就更充分了、更为确凿了。

（央视国际）

中美加强文物保护合作

国家文物局 3 月 21 日在旧金山与美国规划协会签署了一项交流合作谅解备忘录，以加强两国在城市和区域规划中文物保护信息的交流与合作。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备忘录签字后说：“今天是一个起点，来自东方文明古国的文物保护机构与世界规模最大的规划组织将为双方的合作共同开启新的篇章。”他表示，为了保护文化遗产这个共同的目标和理念，中国国家文物局和美国规划协会之间的合作必将具有美好而广阔的前景。

单霁翔说，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世代相传的宝贵精神资源和物质财富，是城市的核心和精髓。妥善保护城市中的文化遗产，需要更多的城市规划师、建筑师积极参与，制定并严格实施与城市发展相协调的、切合实际的文化遗产保护规划。

单霁翔说，中国政府一直努力寻找更多的合作伙伴参与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国国家文物局期待着与美国规划协会在更为广泛的领域中开展长期合作，并相信这一

合作必将有助于促进城市规划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完美融合，使更多的历史性城市得到有效保护。

美国规划协会执行主任兼首席执行官保罗·法默说，这项备忘录将增进双方的合作与交流，共享教育、研究和发展机会。

根据备忘录，双方还将关注两国博物馆建设的进展，协助对方与各自国家的博物馆建立友好合作关系；鼓励开展人员、学术交流和培训活动；在科研领域与示范项目等方面合作并深入探讨遗产与文物保护的原则。单霁翔是前来旧金山出席美国规划协会 2005 年年会的。会上，他向美国规划师介绍了中国在城市发展中如何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美国规划协会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主要与其下属的美国注册规划师学会一起致力于自然、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的规划以及与规划有关的研究工作。目前该协会在世界各地拥有 3、3 万名成员，其中包括专业规划师、相关技术研究人员和政府官员等。

（光明日报）

埃塞俄比亚国宝阿克苏姆方尖碑回归故里

被意大利法西斯侵略者掠走的埃塞俄比亚国宝阿克苏姆方尖碑 4 月 19 日从罗马空运回到它的原址阿克苏姆古城。数以千计的当地民众载歌载舞迎接国宝回归故里。根据埃塞俄比亚和意大利两国达成的协议，阿克苏姆方尖碑被拆解成 3 部分分期运回，意大利

承担全部运输和重建费用。当天回到阿克苏姆古城的是方尖碑的一部分，重达 60 吨。负责空运任务的是一架安东诺夫—124 型货机。为迎接阿克苏姆方尖碑的到来，埃塞地方政府出资加固了阿克苏姆机场，并修筑了一条连接机场和阿克苏姆方尖碑矗立地点的公

路。方尖碑的另外 2 部分也将在近期被空运回国。阿克苏姆方尖碑由花岗岩构成，高 24 米、重 200 吨，至今已有 1700 年历史，被视为埃塞俄比亚文明的象征。1937 年，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下令将这块方尖碑运

到意大利，并把它树立在罗马城内，作为意大利“战胜”埃塞俄比亚的象征。1947 年，意大利向联合国承诺将归还所有劫掠的埃塞俄比亚文物，但直到去年 11 月，两国才就归还方尖碑一事达成协议。（熊思浩）

德科学家利用硅酸脂保护天然石材文物

德国科学家日前开发出一种保护天然石材制成的纪念碑等的新方法，利用硅酸脂对它们进行特别处理后，就可以有效防止汽车尾气、工业粉尘和酸雨等环境中的有害物质的侵害。据德新社报道，德国联邦环境基金会的卢茨·特普费尔在近日一次专家论坛上说，对天然石经过硅酸脂处理后可以获得加强巩固的效果，能够利用有弹性的硅胶来对付环境中有害物质的侵害，开辟了保护天然石文物的新方法。特普费尔说，这一方法特别适用于纪念碑等文物的保护，这些文物必

须就地现场进行护理。对于那些可以运走的物件，根据其密封特性，还有可能选择在丙烯酸树脂中浸渍的方法。特普费尔说，自 1981 年成立以来，德国联邦环境基金会推动了 550 多个文化古迹保护的创新开发解决项目。对国家有意义的花园、公园、公墓等也属于文化古迹的范畴。该基金会资助了对科隆大教堂和埃尔福德大教堂等历史文物采取保护措施，单在保护和修复石灰石、沙石和粗面岩等天然石材料的文物上，就投入了大约 3000 万欧元。（刘 向）

文化沉淀与中国文物保护现状

晏南山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历史个体，是有强大生命力的，然而中国保存至今的历史文化实体，则与其悠久的历史不相符，甚至在当今经济建设的大潮下，更多的文物古迹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或者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甚至荡然无存。

用文化沉淀观看当前文保工作

文化沉淀，我也乐于将其解释为文化信息，意思很容易理解，就是一个地区文化遗迹的保存量，当然这里“保存”的意思不光指“存在”，也与地区的文化生态紧密相关。例如贵州的屯堡古镇的文化沉淀既包括古镇的实体，也包括当地独有的地戏。这可以说，历史古迹如果没有活的文化载体，也不是真正的文化沉淀。历史古迹是文化沉淀的底线。不过，这条底线在中国的文保中是很模糊的。北京南城的会馆和戏剧文化是全国独一无二的，然而在前几年的城市建设中，却对宣武的文化沉淀进行了几次横扫。

“保护优先论”代替“保护有限论”。可

以说，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文保工作永远都是在减少问题，而不能根除问题。一个建设活动，涉及到文物的拆迁或迁移问题，怎么办？这本身不是个问题。文物不可再生，而且价值不能用货币或经济单位衡量，因此应该绝对保留。至于迁移位置，也应该在必需的情况下，而不是动辄就搞文物迁移。北京平安大街不管整体风格是否成功，但在修建时文物基本是保住了，街道没有必要修得太直，只要保证交通就可以。浙江定海古城的价值极大，就被三下五除二拆得面目全非，而且还有大量文保人士进行了干涉，当地政府美其名曰“保护改造”，搞出成片“四不像”商业街区。云南建水也搞了同样的政绩工程，最后古城特色全失，政绩迟早也要落个千古骂名。依我看，中国当前的“保护改造”很少，一般是一改造，就把该保护的都不保护了。其实留下一些历史遗存，实在不是什么难事，欧洲即便是非常现代化的城市，中间仍点缀着古老的教堂和老房子，比如德国法

兰克福的哥德故居，柏林的大量历史建筑，这些城市本身都能跻身世界的一流大都市，但同时文物也没有成为他们发展的障碍，反而增加了城市的文化底蕴，可谓是相得益彰。文物保护需要资金，更需要意识。

保护文物不应该以利益观为出发点，但我们很容易发现，保护文物的同时可以带来客观的经济利益。在平遥的问题上，如果没有听取同济大学阮仪三教授的呼吁而拆除了古城——如现在的建水，试问，游客从何而来呢？如果以当时的理念搞起了工业，能有现在旅游业带来的可观收入吗？一时的错误观念，造成的恶劣结果可能是永远的，因此在文物保护的问题上，一定要比其他问题都慎重，因为一旦没有了，就不会再生。

仿古街。这种东西是中国的独创：拆了古老的、有价值的，然后拿一批伪的去填充，名曰“文化名城”、“发展商业”，惨不忍睹，如天津老城厢商业街——其实这还算好的，根本没留下多少原先的文化沉淀。新建筑恶俗不已，不过还留下了一些重要的文化史迹，如广东会馆、徐家大院、仓门口天主教堂，还算有一点文物保护的理念贯彻其中。而估衣街的改造就糟了，看了冯骥才的《保护老街》，就能评判出这次改造是成功还是失败。逛了这条街后，就能评判出在商业和文保的标准下，这次改造是双赢还是双输。云南建水也把好好的老街拆了建了一条仿古街，既无古意也无现代美感。什么都不是，除了是“政绩”。

现在看来，建造仿古街的巨大动力已经没有什么人能阻止了。我们只能呼吁：对改造区的文物手下留情吧，不要仿着仿着，连真的都荡然无存了。要真想保护文物，凸现古都风貌，不这么砸钱玩也还有别的方法。

历史文化名城。这是一个奇怪的称号。中国只要稍有点年头的城市，都争着抢这个称号。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个称号很少能约束城市规划中疯狂拆迁文物的行为，大不了像长沙一样，除名就得了——尚未除名。所以，争这个虚名，恐怕更多的是经济的利益，

跟文化是没什么关系的。就算把老城推平了，也还是可以挂个名的，起码，本市“历史上”是一座文化名城，只是现在不是了。

名称不名称的，其实意义不大，如果有一点文化关怀，不是历史文化名城又怎样，难道里面有价值的文物就不保护了？文化，本身就不能用功利的眼光去评判。把文化名城当个饭碗，或当个政绩，对保护文物贻害无穷。

在保护文物问题上不要找托辞

文物保护是一件大事，关乎民族文化精神的延续，不过很多人真不把文物保护当事，今天是资金紧张，明天是这处文物成了某重大工程的瓶颈，必须拆除，又或者拆迁是为了更好的保护——类似于说杀人是為了他更好的活着；居民嚷着不搬，他还说“拆迁范围内的居民极其理解”。总而言之，文物保护不得力有一万个理由。一万个理由都编得出来，就是保护不了文物。

所以，中国当前的文物保护最需要的就是真正的用文化沉淀观去保护文物。一次改造，一座古建筑拆了，就再也没有了，我们一定要记录下来，痛心疾首地记下来，让人知道这次改造干了什么。说迁建，就必须问清迁到哪里，什么时候建，怎么建——四川有几处文物恢复得能让人目瞪口呆，否则，搞不好就是建到纸上去了。

一次去四川成都，到十陵，看地图上有一处药王庙，好半天找不到位置，没庙——庙址在当地小学内，原来庙在两年前被拆光了，修了新学校，只剩几个柱础，虽不精美，但也明显是古物。我们当然不反对修新校舍，但不用干什么事都跟文物过不去吧。管理人员说，资金不够，庙已成危房，会砸到学生，因为安全原因所以才拆了。

理由没有不冠冕堂皇的，但是我们不需要理由，我们只看结果。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怎么形成的呢？是靠慢慢的积累和沉淀形成的。一栋老宅，一座古刹，一棵古树，如果从功利的价值观考量它们可能就是一些破旧的老古董，是发展的

阻力，但其真实蕴含的文化价值是根本无法估量的。文化的积累需要漫长的时间，但文化的破坏却可以在一眨眼间完成，而破坏一旦形成，要挽回就极其困难了，在这个层面上，要恢复被坏文物的文化价值的难度可以和破坏了自然生态再去恢复的难度持平，或者说根本不可能。因此，最后我要说一句：

当今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虽然有所成就，但细节却千疮百孔，颇难令人认同。照此发展下去，中国文物——特别是文物建筑——所承载的文化沉淀将面临危殆的形势。

文物的保护同经济建设一样，都需要长远考虑，一旦拆完了就完了，现在的沾沾自喜，肯定会换来将来的痛心疾首。

以“镜”为主题的沟通

——由汉阳陵文物在挪威斯塔旺哥市的展出引起的思考

挪威的深冬季节，在美丽的斯塔旺哥市，中国陕西汉景帝阳陵 141 件（组）文物在这里的斯塔旺哥市考古博物馆展出了，在东道主——博物馆馆长亚克布森的主持下，神秘而厚重的汉景帝阳陵出土文物第一次在挪威面世。这次展览以“以史鉴今”为主题。从推介的主旨、到陈列的布局及声、光、电的运用上，都显得独具匠心，引人深思。

鉴：一个贯穿陈列的主题

展览之前，斯塔旺哥洋溢着浓厚的文化气息。主要的公众场所张贴着“‘古史鉴今’——中国汉景帝阳陵”的宣传画，主画面是一个汉代武士俑对着铜镜映照——有趣也很有意义。我们就餐的中餐馆老板荣耀地多贴了几张。而在专门印制的展览文物图录封面上，右上方写了极大的“鉴”字，左下方则是英俊的汉陶俑。鉴者，先为盛水铜器，用于映人及衣冠，后引申为铜镜，这一点，挪威的文物工作者研究的很清楚。在序厅里，先有“墓中之镜”的醒目标题，由大小不同的五面铜镜交错放置于单体柜中，表示从不同角度可得到借鉴。还采用多媒体的控制——使铜镜的影子在展厅四壁游动——展览的实物和观众时刻在铜镜的形影之中。第一个单元陈列着秦俑博物馆的武士俑和跪射俑，显得刚毅而威武，用不同颜色的灯光轮番照射，将讲解的回环体声聚集一个站点，提示语为“战争死亡与帝王”，预示和平与安定的时代到来了。第二单元是帝陵。景帝阳陵的封土、陵区布局、考古发掘现场、陈列馆相继映于展壁。在一大型的透明的展柜中，纵向排列着

汉阳陵出土的各类武士俑的战阵，紧随其后的是女俑和宦官俑、还有陶制的马、牛、羊、鸡、犬、豕，雄雌有别、长幼各异而栩栩如生。第三单元是建筑与艺术。陈列了阳陵出土的各类建筑构件、陶器、青铜器、玉器。形制不同的砖瓦、瓦当、水管、井、仓、灶、罐、盆、勺、杯、灯以及秦汉时期的印章、货币、封泥等，另有修陵人 2000 年前在劳作之余用过的围棋盘，让人联想当时是一种什么情景。起舞的、演奏的、杂耍的各类塑衣式陶俑单独陈列于一个多功能展柜。反映了当时林林总总的社会生活。最后的一个单元是丝绸之路，即为对外交流和开拓西域打下了基础。展厅的四壁游弋着各种铜镜的图案，使游客恍若处于铜镜的反射之中，产生诸多良思。不由人对这一主题的策划叫好！

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鉴——这一主题是怎样提出来的呢？斯塔旺哥市考古博物馆馆长亚克布森先生告诉我，2003 年，他曾到陕西的文物点去考察，当时他已经看中了汉景帝阳陵这个有一个时代特色的文物，但是怎么样陈列、体现一个怎样的思路他琢磨不定。当他走到陕西历史博物馆看到一面面精致的铜镜时，突然停顿下来，由此而萌发了一个念头，通过怎样的办法使我们看到过去，看到过去的国王和臣民的生活，以史实为主，并借鉴未来，使人自觉地得到总结，这对每一个国家都有好处，所以镜子是一个很好的象征。很有意思的是，馆长的这一思路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奥斯陆大学的文化历史博物馆馆长及挪威科技大学

博物馆馆长非常赞同。他们的共识是，历史常常比喻为一面镜子，一面使人们无论何时都能从过去吸取经验教训的镜子。他们赞赏中国人历史的意识和用实物记载和保留自身发展的思维，而且用这种思维和习惯保持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开幕式后的宴会上，宾主高度评价了历史是一面镜子的观点，斯塔旺哥的市长则认为，中国当今经济发展很快，正是不断借鉴历史的结果。挪威文化部秘书长在讲话中说，镜鉴文化，有跨越国界达到沟通的作用，我们就是想建立一座桥梁，达到文化的沟通，继而进行更广泛的交流与协作。一段的时间里，镜鉴文化已成为社会时尚的话题。

沟通之中的寻踪

以历史作为镜鉴，可以说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普遍为人共知的唐太宗名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曾子也曾说过“吾日三省吾身”等。反思、反省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且有着自己文化特征。而在地球北极的那一端——挪威人好学善思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开幕式的晚宴上，每一位

发言者都一丝不苟准备了发言稿，就镜鉴文化抒发自己的一个观点 大有学者之风。陈乃清大使告诉我，挪威人酷爱学习。这就不难理解 400 多万人口的国家出了易卜生，还有那么多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了。挪威人羡慕中国悠久的灿烂文明史，而且不乏造诣的研究学者，他们更珍视自己的历史，学习他人的长处。这个有漫长海岸线的国家，他们的祖先崇尚自由和探险，留下了勤劳坚韧的性格；这里有美丽的景色和富庶的石油资源，但挪威人平和而不事张扬；在这海水之滨、冰川之中、云杉林的幽静深处，宛若超凡脱俗的童话世界里，塑造了挪威人的单纯、和谐的性格；他们同样喜欢从历史中吸取营养、具有忧患意识。这种民族文化特征和习俗与我国汉初的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精神达到如此的默契！可见，不同国家的文化总有相同和交汇之处，重要的是找准沟通的切入点。看到在只有十多万人的斯塔旺哥市每天参观展览的竟有千人之多，不得不佩服挪威人文化修养之高和对精神文化的追求。

（中国文物报）



楚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影响

先秦时代，楚国历经八百余年的发展，由僻处丹阳一隅，到拥有中国半壁河山；从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到问鼎中原，饮马黄河，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为“天下强国”。此间，楚国不仅位列“春秋五霸”、“战国七雄”，而且创造了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楚文化。秦灭楚后，海内一统，而楚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则流传至今。

屈原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

一个民族不仅要有自己的民族精神，而且还要有体现本民族精神的典范。楚国的屈原就是这样一位跨越时空、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典范。

屈原见闻广博，“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为人“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在受怀王重用期间，努力实行其“美政”理想。他主张以法治国，“举贤才而授能”，并从制订“宪令”入手改革内政。在外交上，则竭力主张改传统的联秦政策为联齐抗秦政策。这两方面的改革虽符合历史实际，有利于楚国的发展，但触动了一些权贵以及秦国的利害关系。内外反对势力因此互相勾结排挤诬陷屈原，怀王不能明察，怒而疏远屈原。顷襄王即位后，又偏听“短屈原”的话，将屈原放逐江南。但屈原并不因被放逐而改变“前志”，而是时刻“眷顾楚国”，为表达其“存君兴国”（《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之意，以辞赋进谏。他痛恨那些祸国殃民的奸佞党人，同情人民的疾苦，敬仰人民的英雄，特在《九歌》中作《国殇》一章，热情歌颂那些为国捐躯的将士。在极度的抑郁苦闷中，他多次产生“远游以自疏”的念头，但或以“览民尤（灾难）以自镇”（《九章·抽思》）；或因“怀乎旧宇”，终于没有离开自己的父母之邦，直至以身殉国为止。正是这种执著的爱

国情怀，似“受命不迁”，“深固难徙，更壹志兮”（《九章·橘颂》）的“后皇佳树”，构成了屈原精神的特色。

千百年来，历史选择了屈原这个实有的历史人物，充当体现中华民族的精神的典范。历代帝王着眼于屈原“竭忠诚而事君”（《九章·惜诵》）：唐代昭宗特地追封屈原为昭灵侯，宋代神宗等封屈原为“忠洁侯”、“清烈公”，元朝仁宗封屈原为“忠节烈公”（《旧唐书》、《宋史》、《元史》），等等。一些文人学者多从儒家角度，引经据典评论屈原精神及其作品，汉代刘安首次把屈作楚辞同《诗经》的《国风》、《小雅》相提并论，并对屈原忠廉正直、出污泥而不染的操行予以高度评价：“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离骚序》引）。宋代晁补之认为：屈原爱君，“被谗且死而不忍去”，其行其辞，“实羽翼六经于其将残之时”，可与儒圣同等。故他说：“原之敬王，何异孟子？”（《鸡肋集》朱熹认为：屈原“乃千载而一人”，其“忠君爱国之诚心”，不辨自显；其书可以发“天性民彝之善”，“而增夫三纲五典（常）之重”（《楚辞集注》）。皆意欲将屈原纳入正统的儒家范畴。而人民则因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深切地寄予哀思，不仅在他的故里秭归和投水的汨罗江畔修建了屈原庙、屈子（原）祠和屈原墓，而且还以端午节吃粽子和赛龙舟的形式来纪念他。

屈原及屈原精神，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甚至于不同的国度，都具有强烈的感染力。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所倡议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中就有屈原。诚如毛泽东所言：“（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

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费德林回忆录：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

屈宋辞赋与中国文学

先秦时代，随着（《诗经》）热的衰落，以楚辞楚赋为代表的文学崛起于楚国，并将我国诗歌创作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高峰。所谓“自风雅（指《诗经》）寢声，莫或抽绪（继承），奇文郁起，其《离骚》（代指楚辞楚赋）哉！”（《文心雕龙·辨骚》）即指此而言。与此相应，涌现了以屈原为首，包括宋玉、唐勒、景差在内的楚辞、楚赋的作家群体。其中，屈原以楚辞著称，宋玉等人皆效法屈原而以楚赋见长。而水平最高、作品最多者，首推屈原，次为宋玉，故后世或以“屈宋”并称。

楚辞作为一种文体，在民歌体式的基础上，开拓了宏大的篇体和错落有致的句式。摆脱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句式的束缚，节奏韵律富于变化，表情达意更为深刻而委婉。屈原利用自己所创的这一文体，“发愤以抒情”（《九章·惜诵》），充分地展现自己的内心世界，把执著的人生追求与爱国主义思想融为一体。故“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迥而见义远”（《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还采用一系列的艺术手法，尤其是把当时流传的巫文化引入辞章，神游幻境，驰骋想象，开创了以现实为基础、充满积极浪漫主义特色的新文学天地，从而成为当世及后世文学艺术的典范。

《楚辞》同《诗经》一样，是我国文学两大源泉之一。历代文人学者几乎没有不读《楚辞》，没有不受屈作楚辞影响的。他们追慕屈原，摹拟屈作楚辞，宋玉、景差开其端绪，入西汉而形成热潮。汉代摹拟屈作楚辞的作品甚多，王逸《楚辞章句》所见11篇，如郑振铎先生所言，“不过百中取一而已”。汉代以后仿屈作者较多，唐代柳宗元“为骚文（楚辞）数十篇”（《旧唐书·韩愈等传》）；清初王夫之还将自己的仿屈作《九昭》收入其所撰《楚辞通释》一书中，尤为典型。屈

作楚辞真可谓“其衣被辞人，非一代也”（《文心雕龙·辨骚》）。至于“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诗经》）以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吸引中国乃至世界上一代又一代的学者研究楚辞，是屈作楚辞的一种深远影响。对楚辞的整理研究当始于宋玉，在汉代、宋代、明清以及20世纪，都分别形成研究热潮。20世纪的楚辞研究不仅专著多，单篇论文更多；涉及多种学科，影响更加广泛。此外，楚辞对其他诗文、戏曲等等也影响至深。

《楚辞》在汉文化圈内影响也很深广，它在唐代传入日本，对日本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此外，还被译为多种外语版本流传欧美及俄罗斯诸国。

楚赋与楚辞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文体。楚赋虽“拓宇于楚辞”（《文心雕龙·诠赋》），但它是在与楚辞完全不同的创作环境中形成的。宋玉、唐勒、景差等人，本来“好辞”，但因在襄王身边奉命而作，受宫廷御用性质所决定，结果不是以楚辞见长，“而以赋见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故司马迁将“辞”与“赋”明确区分开来。但后世学者往往将二者混为一谈，导致了楚赋的忽略。

楚赋是一种问答对话的方式，铺陈其事，极声貌以穷文，韵散结合的文体。屈原的《卜居》、《渔父》发其端，宋玉的《风赋》、《钓赋》，始标赋名，“与诗划境”（《文心雕龙·诠赋》），而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是赋的成熟之作，其写法开汉赋名篇《子虚》、《上林》诸赋的先河，对汉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宋玉的楚赋诸篇及其楚辞佳作《九辨》，借助《楚辞》、《文选》、《古文苑》，得以广泛流传，影响后世。李白“屈宋长逝，无堪与言”、杜甫“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的诗句，分别表达了一些文人对屈原、宋玉的仰慕。他们的作品至今仍受到人们的喜爱。总之，屈宋辞赋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文化韵味，感染国人，影响世界。

楚人的巫、道与中国的哲学和宗教

楚人的巫、道，是指先秦楚国的巫文化和道家学说。巫以楚为盛，道家学说是楚文化的特色内容，已为共识。这二者在中国哲学和宗教的发展过程中都发生过深刻的影响。

楚人的巫文化可上溯到远古时代的楚先祖祝融。祝融为帝喾高辛的“火正”，主“司天”，因功显名，故后世楚君多具有巫文化的传统。熊绎、平王、怀王等，是“巫祝之道”的比较突出的信奉者，而著名的巫学大师则是被称为“国宝”的楚臣观射父。

就其内涵而言，楚国的巫文化包括多神崇拜、各种巫术、飞升成仙等等内容。它不仅渗透到楚国文学艺术等诸多层面，而且对后世宗教信仰影响深刻。如：先秦时代，唯有楚人以东皇太一为至上神。马王堆 3 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太一出行图》，太一在诸神中处于主神地位；汉武帝重祭祀亦以太一神为至上神，显然继承了先秦楚人奉太一为至上神的传统。神仙观念是道教的基本观念，得道成仙是道教的终极追求。先秦时代的神仙观有两大系统，燕齐方士刻意于海上求取仙药，楚地则重在借助灵物飞升成仙。楚地这种神仙观及其各种巫术，都是后世道教神仙观和道教法术的重要来源。

道家学说，渊源于晚商时代的楚君鬻熊，而代表成熟的道家哲学思想的则是春秋晚期的老子和文子。文子是老子的学生，楚平王的大臣，他的思想对楚国朝政产生过影响。入战国中期以后，道家分化为两大派系：即老庄学派和黄老学派。老庄学派以庄子为代表，黄老学派，主要有冠子、环渊等人。

道家思想博大精深，在先秦各家学派中最富哲学内涵，对后世影响极为深广。汉初，黄老之学作为“君人南面之术”，清静无为，与民休息，治理战争创伤，使天下殷富，社会获得稳定发展。东汉以后，道教兴起，道家学说成为道教的理论基础。老子被奉为教主，称之为“太上老君”，其书《老子》被奉为圣典，称之为《道德真经》。后来，文子、

庄子也分别被尊为“通玄真人”、“南华真人”，其著作《文子》、《庄子》也被视作“真经”，列入道藏。魏晋时代，玄学兴起，玄学以老庄道家的无为学说为本，探讨纲常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最终使汉末陷入危机的名教重新焕发活力。唐初，李氏帝王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信奉道教，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使老子的地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儒、释、道三教长期合流兼容，老庄思想对佛、儒二家产生过重大影响。宋代理学开创者周敦颐的“自无极而太极”的理论，就来源于道家的“有生于无”，“复归无极”（《老子》）。老庄道家学说几乎在历史进程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发生思想共鸣。晚清民国初年，受社会危机与西方思想的影响，一些文人志士如谭嗣同、严复等，重新审视老庄文本，并从中发掘“民主”、“自由”的思想，再度将道家学说视为匡世安邦理论。当今世界提倡返朴归真，回归自然，遵从自然规律，加强环境保护，道家“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以及“无为而无不为”等思想，不仅在国人中，而且在世界上都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共鸣。

出土楚文化资料与现代学术文化

出土楚文化资料，主要是指考古发现的先秦楚人的文化遗存，包括有文字的和无文字的两类。其中一些重要的发现，在我国乃至世界学术界都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影响。

20 世纪 30~40 年代，因盗掘先后在安徽省寿县和湖南省长沙楚墓，出土了著名的“寿县楚铜器群”和“楚帛书”等重要文物资料。这两大发现当时就在学术界形成了研讨热点。尤其是楚帛书流落到美国后，其研究也逐渐国际化，促进和掀起国内外的帛书研讨热潮，并为中国史研究走出疑古时代提供了帮助。

20 世纪后半期，是楚文化考古成就最大的时期。

楚简批数多，数量大，居全国先秦简牍之冠。迄今为止已发现 30 余批，其中已产生较大影响的有长沙仰天湖（M25）楚简、信

阳长台观（M1）楚简、荆门包山（M2）楚简、荆门郭店（M1）楚简和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简。尤其是郭店楚简，资料一发表，就引起强烈反响，学术界接连在北京、美国、武汉举行3次国际学术研讨会。

青铜器及其铭文也有重大发现，如安徽省出土的鄂君启节、河南省浙川下寺春秋墓铜器群、湖北省随州曾侯乙墓器群，等等。其中尤以曾侯乙编钟编磬举世闻名，复制演奏，令世人耳目一新，为我国音乐文化大增光彩。

楚国的货币也很有特色，主要有蚁鼻钱和金币。蚁鼻钱，是一种有面文的仿海贝的铜质铸币。楚金币是一种称量货币。楚国是先秦时代唯一通行黄金铸币的国家。据初步统计，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土600余件，总重量接近4万克。其中江苏省盱眙穆庄乡南窑庄出土的11件“郢称”金币里，有一件长12.2、宽8厘米，重610克，有完整的印记54个，半边形印记6个，是所见最大最

重的一件。这些楚币不仅为楚文化学界所重视，而且也吸引了经济学界人士参与研讨。

中国传统的丝织工艺，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享有盛誉，而领先于东周列国的楚国丝织工艺则是先秦中国丝织工艺的代表。湖北江陵马山1号战国楚墓，出土丝织衣物38件，丝绸片452片，既多且精，品种齐全，色泽鲜艳，被誉为“丝绸宝库”，甚为丝织与服饰研究者所重视。

楚地多宝，地下矿藏丰富，湖北大冶县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南北长2公里，东西宽1公里，开采时间上起西周下至汉代，出产过大量的铜矿，揭示了楚人，也揭示了我国古代采矿和冶铜的生产情况，填补了中国冶金史上的一大空白。

楚文化丰富多彩，对楚文化的考察研究既有利于开发地域文化资源，也有利于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巫术时代论”影响下的中国古史研究

晁天义在《求是学刊》2005年第1期上撰文指出，在20世纪的中国古史研究中，关于巫术文化的讨论无疑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英国古典进化论派人类学家J·G·弗雷泽“巫术时代论”错误观点的影响下，近年来国内的不少古史研究者将史前中国解释为巫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对历史上各种来源多样、性质复杂的传说不加辨析和区分，而是无一例外地视为著名巫师及其巫术的证据，这是近年来中国古史研究中一种显著的错误倾向。

这种错误倾向之所以出现，一方面是由于研究者对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化精神的错误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精神“重现实而轻玄想”。在这种文化精神之下，巫术在古

代的发展空间和作用非常有限，因此可以说中国古代根本不存在一个“巫术时代”。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西方古典人类学单线进化论的影响。不可否认，20世纪以来西方人类学理论和材料的输入对中国的古史研究有重大的启示作用，但并非所有的西方人类学理论都对中国的史学研究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弗雷泽的“巫术时代论”运用到中国古史研究当中就使国内出现了一种将中国文化解释为西方文化翻版的错误倾向，并由此认定所有的人类文化都必须经历西方式的“巫术时代”，任何文明都只是欧洲文明的“复制品”。从而夸大了人类文化的共同性，忽视了各文化体系中不同文化特质的不同。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近现代北京城乡关系研究

中心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不是孤立的个体现象，而是与周围乡村聚落的产生和发展相

互联系的。这种联系有时非常密切，有时则相对松散。近现代社会的激烈动荡，促使北

北京的城乡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行政区划、思想观念、文化事业、经济联系、城市建设、人口波动、土地开发、交通状况等许多方面。此外，城市扩张导致乡村聚落的消失、城市发展对周围乡村产业结构变迁的驱动、乡村与城市之间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相互影响等，也是标志城乡关系发展状况的关键因素。本项目选择了北京城乡关系演变的几个重要方面，从历史文献、档案资料的收集分析入手，依据历史地理学、区域地理学研究的一般理论，结合文化地理、城市规划、环境生态、地名学、城市发展史研究的某些方法，梳理北京近现代城市发展与周围乡村之间关系演变的基本脉络，以期当代北京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

作为历史悠久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北京对全国的吸引是其它城市所无法比拟的。由于地理上的便利，周围乡村与它的联系显然更加直接。行政区划制度是国家对所辖领土实行政治管理、体现国家意志的手段，其界线的划分既照顾山川形势，更看重历史与现实的现实政治经济联系，从而成为显示城乡关系的标志之一。封建帝都时代的北京城，其地域界线非常清楚。城市发展的缓慢，使历史上约定俗成的“北京城”的概念，基本上是固定、统一的。清代以前的北京城乡关系，由近及远，可以分为“北京城”与其近郊、顺天府各县、外围军事重镇三个层次；在特定的情况下，还涉及与河北、山东、山西等地的远程联系。随着国家行政区划制度的改变，清末民初行政区划系统中的“市”制推行以后，留给北京的外围乡村亦即未来的发展空间却在缩小。这样，民国北平市时期，一批接受过西学熏陶的规划人员，参考国外城市规划理论，做出了扩展市域范围、调整城乡关系的计划。这个计划尽管由于政局频繁变动、方案自身的不足等原因而未能予以实施，但其基本思路确是科学的，对以后的城市规划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解放后，在新的政治、经济前提下，按照城区、郊区、辖县相结合的方式，经过多年调整，形成了

北京市区与周围区县相结合的行政区划系统，为城市自身以及城乡关系的新发展，奠定了制度上的保障。行政辖区的变更，折射出了北京城乡关系发展的轨迹。

在城乡关系中，城市通常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城市自身的政治、经济、生活方式的变迁，对于周围乡村地区往往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但同时也会产生经济利益以及某些思想观念的冲突。在一定意义上，北京的城市近代化过程，就是近代西方的某些思想观念、技术创造在北京传播与发展的过程。清末同光新政，开启了引进国外技术以自强的先导。北京城在成立自来水公司、打通正阳门、成立电车公司等涉及城市近代化的重大事件中，表现出了典型的社会冲突。不同社会群体的人们对这个过程的认识和反应，形成了包括城乡关系在内的多种多样的矛盾。其中，在通县铺设运煤铁轨建立发电厂、在孙河建立自来水公司的水源地，发生了与当地人士的激烈冲突；改造正阳门与保护历史建筑，发展城市电汽车与维护人力车夫利益，自来水公司营业与山东送水夫之间，在城市内部也形成了激烈的对抗。这个过程的最最终结果，是推进了城市近代化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多少带动了周围乡村的进步。

城市对于周围乡村发展的引导作用，还体现在城市的文化特色所产生的影响力方面。北京长期作为国家政治、文化中心，具有领袖群伦的特殊地位。在帝都时代，除官吏、商贾云集京城之外，国子监、翰林院、史馆等学术机构是文化教育的最高权威，科举制度更是强烈地吸引着知识分子，使北京同时成为文人聚集的地方。对各类进京者而言，会馆供他们落脚居住，戏园、茶馆等供他们消遣；书肆既为举子储备应试资料，也是藏书家及普通知识分子的淘金之地。以琉璃厂为代表的北京书肆，在江西、直隶书商的经营下，作为全国古旧书业的中心，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地位。清末废除科举制度后，北京在兴办近代教育过程中依然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众多昔日的王府成为大学校园，

显示了城市机能的新旧转换。戏曲、曲艺尤其是京剧艺术，形成了对全国具有强大号召力的众多流派，艺人居住、演出的地点大都在南城前门外。这些情况，对于城乡结合部的发展，尤其具有深刻影响。

1937年7月——1945年8月沦陷于日本侵略者之手，是北京城市发展史上惨痛的一页。在加紧经济统制和资源掠夺的同时，日寇制定了《北京都市计划大纲》，以作为开拓殖民地的初步计划。为把北平变成在华北沦陷区的统治中心，他们致力于西郊“新市区”和东郊“工业区”的规划与实施，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比较明显的作用，也促使城乡关系在这一特殊时期出现了某些变化。日本侵略者以践踏中国主权、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为基础，完成了东西郊征地及其初步的掠夺式、突击式开发，完全不顾旧城区的改善。从纯粹的城市布局角度看，西郊新市区和东郊工业区的选址是比较恰当的，考虑了各自的自然地理、交通运输条件等因素。在总体布局上，长安街向东西两侧延伸，穿过新辟的城门连接东西郊，拓展了北京城的横向轴线，确定了较长时期内区域平面形态的框架。沦陷期间的北平城市规划与初步实施，是八年沦陷这段惨痛历史的记录，其中关于城市产业布局、功能分区的设想，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北平沦陷期间的城乡人口态势和市政建设，是影响城市发展与城乡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城市人口的集中分布地区依然如故，人口总数有所增加，但人口的出生率低于死亡率，即自然增长率为负数，表明人口总数增长的主导因素不在于自然增长而在于机械变动，这是在城市人口外流的同时又有更多的外地人口流入的结果。日本侵略者实行的殖民政策，使日侨大量涌入北平，这是城市外侨发展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日侨激增和日军疯狂的经济掠夺，使北平的粮荒日益严重，饥饿、疫病造成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这对于一个人口高达150余万、以传宗接代传统生育观念的大城市来说，是无比

的社会灾难。大量流入的日侨虽然没有改变北平人口数量与分布的总体格局，但他们仰仗日军势力挤掉了北平人民的居住空间，实施了大规模的经济侵略。东西郊“新市区”的建设使北平的建成区范围相应扩大，郊区人口也有比较明显的增加，在短时期内影响了城市的人口和建筑布局。这一切，都是以中国人民所遭受的空前惨重的民族灾难为代价的。

清末京城外围地区土地功能的转换，非常典型地反映着近现代北京城乡关系的发展变化。作为皇家园囿，从元代的“飞放泊”到明代的“南海子”再到清代的“南苑”，持续了六百多年的时间。通过历代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窥见南苑开垦之前森林、草原、湖泊、河流以及多种动物构成的自然景观，体会它们在保持水土、防风固沙、涵养水源、保护区域动植物等方面不可替代的生态功能。不料，在清末遇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变局。人口增长、经济匮乏、内忧外患、国势衰微的时局，迫使清朝不得不放弃祖宗成法，将南苑放手开垦，以解燃眉之急。光绪末年的招垦令颁布后，权贵显宦、富商大贾纷纷涌入南苑，招募山东、河北等地贫民租种开垦，在很短的时期内，南苑由昔日的皇家苑囿迅速变成农耕区，其土地功能与生态环境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其后的五十年内，开垦土地约20万亩，形成村镇聚落230余个，其名称也带上了文雅的色彩。经济形式、人口数量、地理风貌的巨变，显示着社会生活与城乡关系的更迭。

交通条件制约着城市的运转能力和发展空间，帝都时代的北京聚集了大量人口，其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物资尤其是粮食，基本上依靠大运河从南方产区调运而不是在京郊就近解决。大运河沿线的通州、张家湾依靠漕运码头的地理优势而发展起来，在元明清三代达到鼎盛。当光绪年间近现代交通条件发生重大转变，特别是铁路运输取得了空前进步，进而取代了大运河成为国都新的生命线时，张家湾、通州的水运优势风光不再，它

们对于北京城的重要性大不如历史上漕运兴盛时期，只能与运河沿岸其它城镇一起衰退。与此同时，铁路沿线的另一些城镇纷纷崛起。丰台由于是三条铁路的交会站，从历史上的种花、观花胜地迅速成长为重要交通枢纽，靠近铁路的黄村等地也日益显现出发展的潜力。一些以供应城市生活原料为特点的城镇，其地位往往也有所变化，但摆动的幅度不如运河沿岸城镇那样巨大。其中如京西的门头沟，在清代是京师煤炭与建筑材料的供应地，清末民国时期修建了由西直门到门头沟以及门头沟到斋堂镇的铁路，专门承担煤炭运输任务，改变了原来依靠人力畜力运输的落后局面，也带动了城镇的发展。尽管山西大同、河北开滦最终成为首都最主要的能源基地而削弱了门头沟的地位，再加上自然条件的制约而进步缓慢，但门头沟与北京城的经济联系一直在加强，在现代与丰台、通州、黄村一起成为北京市辖区的政府所在地。城乡之

间相互影响的历史事实，对于协调未来中心城市与卫星城的关系，不失为有益的参考。

城乡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这里的研究仅仅是几个专题的初步分析，只能显示北京城乡关系发展的若干侧面。城乡之间经济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城市自身的变革对于周围乡村地区产业结构、风尚习俗、社会心理、文化趋向等方面的影响，需要综合更多的数据、分析更多的个案来研究，其中很多方面已打破了学科的界线，呈现出必须综合研究的大趋势。至于城乡之间在生态环境变迁方面的相互作用，乡村作为城市的绿色屏障和后备空间的意义，城市化趋势下的城乡协调发展等问题，尤其需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关学科共同参与。实现了这样的学科综合，北京城乡关系的研究将会获得突破，研究成果对于未来城乡发展的理论指导，也会更为直接有效。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规定降低旧城人口密度

北京市召开的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规定要降低旧城人口密度。该《条例》将于5月1日起正式施行。按照惯例，地方性立法往往经过两次人大常委会的审议，但是，在去年进行《条例》的草案修改稿审议时，一些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提出，《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正在进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法规内容应注意与其相衔接。因此，目前出台的《条例》根据《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以及国务院的批复内容进行了修改，并进行了第三次审议。

根据国务院批复中提出的“有序引导中心城人口和功能的疏解与调整”精神，以及总规划中“积极疏解旧城的居住人口的规

定”，《条例》在第二十一条规定，市和有关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保护规划的要求，制定调整旧城城市功能和疏解旧城居住人口的政策和措施，鼓励居民迁出旧城市，降低旧城人口密度，逐步改善旧城居民的居住条件。

《条例》还规定，对负有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职责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出现违法调整保护规划、违法调整历史文化街区范围、违法审批、滥用职权等情形下，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此外，《条例》对违法拆除、改建、扩建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以及未按有关保护规划的要求和风貌修缮标准履行管理、维护、修缮义务的，处以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新华网）

全球最大的中华古籍全文数据库“国学宝典”开通

轻点鼠标，就能查阅从先秦至晚清的所有重要典籍文献，打开手机，就能找出任何一句唐诗宋词的出处、原文及作者简介。这样的便利是由大型中华古籍全文数据库“国学宝典”（www.gxbd.com）提供的。2月27日，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展示了这一具有突破性的成果。“国学宝典”网上检索系统共收入古籍3800多部，总字数逾8亿字，收书种类和总字数都超过了《四库全书》。数据库目前仍然以每年2-3亿字的速度扩充。这一系统采用国际通用的unicode汉字编码，字库容量大，扩展性强，可在全球所有网络浏览器上正确显示汉字。该数据库采用最先进的搜索引擎技术，具有

强大的检索功能，不仅可以快速检索字、词、句子，而且可以多条件组合检索，检索范围可由用户自己设定。此外，古汉语字典、整卷查看、内容提要、繁简转换、帝王年号表等多种功能均可实现网上在线使用。值得一提的是，这套先进的检索系统可以在普通手机上实现其全部功能。对于这一成果，到场的专家学者给予了高度评价。有专家指出，网络版《国学宝典》的出版，不仅扩展、延伸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外的影响，而且使它拥有了巨大的附加值，为更好地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了现代化的技术支持。

西安规划恢复古都风貌 新城古城实行“分治”

投资13亿元、历时两年建成的国内第一个全方位展示盛唐风貌的大型皇家园林式文

化主题公园——大唐芙蓉园今天在西安开园。今后，来西安的游客可以在这里通过唐

诗、唐乐、唐舞以及唐风建筑等，领略到盛唐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外交、民俗的繁荣盛况。大唐芙蓉园的开园，标志着西安市“皇城复兴”计划正式启动。

据介绍，古唐皇城（长安）位于今西安城墙内南城区西部，加上西北部的大明宫区域，两者面积约为 9.41 平方公里。“皇城复兴”计划主要是针对这些区域拟定的长远规划，规划时间为 30 年到 50 年。规划内容主要是根据老城的历史文化内涵，以及经济、社会形态，结合商业、科技、旅游，保护及恢复传统街区，进行城市改造，还原西安历史古都风貌。

规划初步设想将古城空间发展结构分为中心发展区、顺城旅游服务区、城市功能发展区和入城区。中心发展区以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为轴线，钟楼、鼓楼和城楼为标志，区内以突出老城整体形象为主。顺城旅游服务区为顺城巷及周边区域，主要发展观光旅游，缓和中心发展区的压力，构建和古城的互动模式。城市功能发展区位于中心发展区和顺城旅游区之间，保留原有城市功能，以确保城市历史文脉传承并提供老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入城区以城楼、护城河、环城公园等区域为范围，以东、西、南、北门及朱雀门为标志，提供交通转换和旅游相关的

服务设施。同时，通过对交通系统的改善、文物古迹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改善、人口控制等多项举措，降低人口和建筑密度，改善老城环境，打造人文化、生态化西安。

西安市文物局副局长孙复喜告诉记者，配合“皇城复兴”计划的实施，西安将实施“古新分治”，加大对古城墙内的文物古迹、历史街区与传统民居的保护力度，不得任意拆迁；逐渐弱化和分离“古城”的行政、交通、居住等功能，强化其旅游观光、文化交流的功能。同时，与“古城”保持一定的间隔，集中建设“新城”，以承接从“古城”转移出来的部分功能，重组和完善西安城市功能体系。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张锦秋对“皇城复兴”计划给予高度评价。她说，西安有 3000 多年的历史，13 代皇朝先后在此建都，是中国建都时间最长、历经朝代最多的城市，现存文物古迹十分丰富。西安市提出“皇城复兴”计划，旨在加大对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还历史本来面目，这对保护西安的历史文化底蕴、弘扬悠久中华文明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西安提出的“古新分治”城市建设理念，对我国许多历史文化名城的现代化建设具有借鉴意义。（人民日报）

深圳市政府确定今年为“文物保护年”

3 月 11 日深圳市政府召开会议审议了市政协提出的《关于将 2005 年确定为我市“文物保护年”的建议》，决定把今年确定为深圳市“文物保护年”。会议认为：切实保护和充分利用历史文物，可以提高市民的文化素质和城市的文化品位，是实施“文化立市”战

略的应有之举，也是建设高品位文化——生态城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重要内容。深圳市政府将进一步加大文物保护的投入力度，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共同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有关部门要以“文物保护年”为契机，加大对文物保护和深圳历史的宣传。

海峡两岸及香港专家在港纪念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

郑和下西洋最远到了哪里？肯尼亚是否有郑和船队的船员后裔？应该如何认识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壮举？3 月 18 日，海峡两岸及香港的学者汇聚香港城市大学，共同研讨，以纪念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1405 年，郑和

奉诏率领庞大船队开始了扬帆万里、波涛壮阔的 7 次“下西洋”的历程。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在开幕礼上致辞。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林梅村教授、台湾学者陈国栋博士、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院长庄国土教授和厦门

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陈支平教授、香港大学中文系冯锦荣副教授，分别从考古学、科学史、中外交流史等角度，探讨了“郑和下西洋”在中国历史和全球文明发展史中的地位和意义。与会的一些“郑和迷”们认为，此次研讨会的成果非常具有原创性，既有专家的实地考察，也有原始资料的新发掘，在研究视野上也非常开阔，在探寻历史真相的同时，把郑和下西洋放到中国文化发展以及整个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去思考，对当代很有启发。据了解，为纪念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进行了“郑和研究计划”，举行了同一主题的多次研讨会。

甘肃省文物局改进省直文博系统
目标管理工作

近日，甘肃省文物局召开省直文博系统

目标管理工作会议，重点研究了目标管理工作的完善和改进问题。甘肃省省直文博系统自 1999 年实施目标管理以来，有效地促进了各单位乃至全省的文物工作，但由于没有现成模式和规范借鉴，在实践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内容庞杂、任务量大、重点和难点工作不突出、管理效果欠佳等问题，为适应当前文物工作新形势，贯彻将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融入各项工作实践的客观要求，对原有的目标管理实施办法进行了较大幅度修订，进一步加强宏观管理，突出重点，解决难点。会议听取了有关人员就修订后的《甘肃省文物局目标管理实施办法》所做的说明，对实施办法进行了认真讨论，建议做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印发执行。

2005 年申报世遗项目巡礼：走近“澳门历史建筑群”

夕阳余晖中的澳门，常常让人产生一种融入其中的冲动：那些临风伫立的教堂、古朴苍凉的城墙，以及重门紧闭的中式院落，总令人联想起一连串的词汇，诸如：历史、融合、共存……

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些毗邻而居的古老建筑所传递的普世价值后，一个新的名词开始在澳门报章上频繁出现，并力争列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这就是：“澳门历史建筑群”。

将于 2005 年 7 月提交第 29 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的“澳门历史建筑群”，是中国今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唯一项目。在文明源流从未间断的中华沃土之上，文物古迹浩如烟海，“澳门历史建筑群”脱颖而出，其价值可见一斑。

“澳门历史建筑群”的概念，从 2002 年提出至今，经历了重要的调整，已由当初突出分散的 12 个建筑物，丰富为历史街区。这个街区以澳门旧城区为核心，通过相邻的广场和街道连为一体，展现了东西方不同国家在空间结构概念、建筑风格、美学观念、工匠手艺和技术方面的交流融合。徜徉其中，

宛如置身东西方建筑艺术的博物馆。步入街区，人们会惊异地发现，这里保存着中国最古老的西式建筑群，其风格包括了文艺复兴以后出现的大部分的欧洲建筑形式，从巴洛克到新古典主义应有尽有。数量众多的宗教建筑，也因教派的不同而各具特色。同时，这些西式建筑在其原有风格中又糅进了印度、日本以及中国沿海一些地方的建筑特色，甚至连天主教堂的壁画也以中式手法表现，整个街区布局体现了风水学的影响。中国岭南风格的庙宇、清末院落式大宅和广东“西关大屋”式民居，更令这个街区的建筑风格变化多端。

当一批又一批游客慕名前往大三巴牌坊游览时，人们常常会惊诧于它的“名不副实”。这个有着地道中文名字的建筑，绝非宣扬忠孝节义的中式牌坊，而是一处西式教堂的残壁。这就是澳门的历史建筑，哪怕是一个小小细节，都见证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与对话，证明了中国文化永不衰败的生命力及其开放性、包容性，以及中西两种相异文化和平共存的可能性。

行走在澳门的历史街区，总能感受到中

西文化的和谐共存。这是一个集合多种信仰和习惯的居民生活空间：供奉中国海神妈祖的妈阁庙与葡萄牙人航海主保的圣老楞左教堂相隔咫尺；葡萄牙人生活区旁坐落着中国近代思想家郑观应的中式大宅；巍峨的大三巴牌坊之侧是精致小巧的哪吒庙；东望洋炮台的圣母雪地殿教堂墙壁上，是中式图案的壁画……当历史逐渐远去，这些保存至今的

建筑，仍刻录着中西文化交融并存的记忆。

直到今天，在这个历史街区，有着不同信仰和习惯的民众，依然秉持各自的传统，以丰富多元的节庆活动，延续着澳门的中西合璧。也正因如此，这个活着的街区，才引起了文物专家的兴趣，并开始了将其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努力。

（新华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利用宇航技术保护世界遗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 3 月 1 日与美国宇航局负责人在华盛顿签署合作协议。按照协议，教科文组织将利用美国宇航局空间技术加强对世界遗产地的保护和生物保护圈的监测，同时有关技术还将应用于教科文组织在自然灾害和教育方面的工作。

据这一组织发表的公报，该项合作不仅可以促进教科文组织成员国利用宇航技术、遥感数据和科学成果，提高有关保护工作的效率，还能帮助成员国提高减灾抗灾的能力。该组织认为，本次合作将拓宽教科文组织在

空间教育和其他科学领域的活动范围。

教科文组织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就与国际航天界进行了多种合作。特别是近几年在利用卫星数据方面，开展了建立全球对地观测系统(GEOSS)的执行计划，目前已有 60 个国家加入此计划。

此外，在欧洲航天局倡议下，阿根廷航天部门、加拿大航天局和摩洛哥航天中心在教科文组织工作的框架下建立了合作关系。印度航天局、中国科学院以及其他的航天研究所和大学也正准备加入到该倡议的合作协议中。（中国文物报）

“欧亚非考古与文明系列讲座”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举行

由中国国家图书馆、法国远东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合作举办的“欧亚非考古与文明系列讲座”4 月 21 日起在国家图书馆分馆“文津讲坛”举行。

作为“法国文化年”的一项活动，本次讲座将把法国各个海外学院主要的研究成果介绍给中国听众。在 2 天半的讲座中，资深专家将向听众介绍西班牙的腓尼基与希腊移

民、罗马帝国与印度洋的联系、希腊的萨索斯岛、埃及的金字塔、柬埔寨旧都吴哥的城市化、越南湄公河三角洲的考古遗址以及几年来中法合作发掘河南民居遗址的成果。每场讲座都设有翻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将受邀对法国同行的演讲进行评述并开展讨论。

（中国文物报）

印度开始测量泰姬陵尖塔最新倾斜度

据印度亚洲通讯社报道，一支由 10 人组成的印度测量队于近日开始测量泰姬陵主建筑周围的 4 个尖塔的倾斜度，测量队已经确定了测量尖塔倾斜的基点。有关上述尖塔倾斜的消息最早出现在 1942 年的一份印度考古调查队的报告中，另一次有关尖塔倾斜的调查是在 1993 年进行的。印度历史学教授拉

姆·奈斯认为，泰姬陵旁边一条河道的干涸加速了尖塔的倾斜。测量队这次将用先进仪器测量尖塔的倾斜度，相关工作将持续 30 多天。之后，印度考古调查队将根据测量结果提出补救建议。据报道，印度专家对尖塔倾斜的原因存在分歧。一些考古专家认为，上述尖塔略向外围倾斜是故意设计的，如果发

生强烈地震，尖塔将可能向外围倒塌，因此不会砸到泰姬陵主建筑的圆穹顶。但另一些历史学家则否认这种看法。拉姆·奈斯说，建造泰姬陵的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建筑师和工匠是完美主义者，泰姬陵本身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工程，它在几何学上是非常完美的。他还认为，莫卧儿王朝的建筑师把河流设计成

了泰姬陵整体工程的一部分，但目前泰姬陵旁已干涸的河流最终可能导致一些泰姬陵建筑倒塌。泰姬陵是印度莫卧儿王朝第五代国王沙贾汗为悼念其爱妻泰姬·玛哈尔而修建的。它位于印度北方邦阿格拉市郊区，距新德里 195 公里。该建筑始建于 1631 年，前后共历时 22 年才完成。

『名城』岂能『创』出来

湖北鄂州市博物馆 熊寿昌 黄国红

自 1982 年首次公布“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以来，国务院共公布“名城”五批(次)101 个，此举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有关资料显示，因为有“名城”这项“桂冠”，当地城市的建设在得到发展的同时，历史文化遗产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保护；城市扩大了知名度，促进了旅游服务等产业的发展。因此，很多地方的政府便积极开展起了“名城”的创建与申报工作。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某些行业和部门热衷于各种各样的“达标”、“评优”、“创建”、“申报”等活动，其结果是活动内容真假虚实、鱼目混珠，所以，在一些政府领导心中便自然形成一种印象，以为“名城”的审定公布过程也像上述“创建”一样，是一项活动，经过一番人为的“努力”，是能够“达标”的。如此一来，便使得一些地方搞起了不切实际的创建活动。譬如：聘请专家考察，照顾得体贴周到；组织有关人员制作申报材料，装帧得漂漂亮亮；指示电视台摄制专题片，制作得精精致致；“创建”的宣传工作，搞得热火朝天等等。也许，经过这样一番努力、一番人为的包装，人们的历史文化保护意识会增强一些，但是，站在另一角度讲，这种活动却是无形中进入了“‘名城’是可以‘创’出来的”误区。

我认为，“名城”的申报评审涉及三个层面的问题。其一，是申报资料的搜集、整理及宣传资料编写之类所必要的文字、案头工作。这是申报工作中的一个环节。其二，是文物古迹风景名胜与城市街区历史特色的调

查管理；政府对文物保护单位的公布；传统文化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历史文化遗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的制定；历史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及经费的落实等一系列政府行为。这是申报“名城”的基础工作。其三，是历史文化遗产中今天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它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从广义上讲，历史文化名城的创建，至少应包括上述三个层面的内容。如果围绕着它们去积极的做工作，那么，这种创建活动便应该大力提倡，并在全国宣传推广之；从狭义上讲，如果将“名城”的创建与人们心目中的一些“评优”、“达标”之类的活动等同起来，那么，它仅仅是停留在上述第一个层面上，这就与评审公布“名城”的初衷大相径庭，这种“创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没有多大的好处，相反，它会造成形式主义、虚假作风的蔓延，理应受到遏制。

“名城”的概念是在总结了国内外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如西方某些国家，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大规模开发过程中，破坏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产，造成了永远的损失和遗憾。其结果是后来又不得不去花更大的代价来保护、收集这些遗产。据有关资料介绍，有些国家保存了五十年的建筑不能随便拆除，连一根旧电线杆也要保护！今天，我们公布“名城”其主要目的便是为了在城市规划建设中使其存在的历史文化遗产得到更妥善的保护，同时发挥它们的综合效益(不仅仅是经济效益)，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所以，“名城”不是海市蜃楼，也

不是空中楼阁，它是一种客观存在，是由一个城市的历史地位、历史作用和文化底蕴所决定的。我们不能主观地用“纸糊箴扎”的方式去搞“创建”，更不能以“画饼充饥”的办法去代替历史文化遗产的客观存在。如果说需要主观上的“创建”的话，那也只能是进一步向世人揭示这座城市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展示它的客观存在，使人们对这个“藏在深闺人不识”的城市进行重新认识，对其历史文化进行重新定位，还它一个本来所应有的“名分”。因而，对于申报工作，我们的舆论应该着力进行事实上的澄清，让我们的一些行政领导或部门明白，“名城”不是靠一日一夜的功夫就能“创”出来的，它需要一个过程，有时在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上还要

进行利弊的权衡取舍；在政绩是留给本届任期内还是留给继任者的问题上还要进行痛苦的抉择。

所以，对于具有一定历史底蕴的城市而言，我们需要的是广义的“创建”，是以上述第三个层面的客观存在为基础和依托，花一定的时间，脚踏实地地去做好第二个层面工作的一种创建。如果到现在有的地方还在“吃老本”，不去落实应有的规划与保护措施；或者历史文化遗产一方面在不断地消失，一方面又在不停地去造新的景观的话，那么，这座城市哪怕你第一个层面的工作做得再怎么好，那也只是肤浅的，恐怕与“名城”也是无缘的。



《光凝秋水——清宫造办处玻璃展》在永寿宫开幕

《光凝秋水——清宫造办处玻璃展》于2005年4月13日在故宫博物院内西路的永寿宫区域隆重开幕。

清代宫廷玻璃器的制造始于康熙朝。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造办处玻璃厂建立，开始制造御用玻璃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代玻璃器制造的鼎盛期，当时皇家征调了山东博山和广州等地的最优秀的技术人员在玻璃厂轮班供职，并邀请法国的技术人员入宫进行指导，使玻璃制作工艺得到极大的发展，并发明了诸多艺术加工方法，产生

了八个工艺品种。造办处玻璃厂制造的玻璃器色彩绚丽、装饰典雅，既蕴涵了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又带有浓重的宫廷色彩。

本展览遴选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具有代表性的131件玻璃器，分类进行展示。展览共分九个单元，即清代官造玻璃器款识、单色玻璃器、玻璃胎画珐琅器、戗金玻璃器、搅玻璃器、雕花玻璃器、金星玻璃器、点彩玻璃器、套玻璃器，以使观众最大限度地领略到昔日清宫玻璃厂的盛况与辉煌。

展览预计于今年10月31日结束。

《太阳王路易十四——法国 凡尔赛宫珍品特展》

4月21日下午，筹备已久的中法文化年重要项目《太阳王路易十四——法国凡尔赛宫珍品特展》揭幕仪式在午门西马道举行。

3点整，我国总理温家宝、法国总理拉法兰一起步入象征中法友好的大门——法国凯旋门与紫禁城朱漆大门的合璧，为展览揭幕。国务委员陈至立、文化部部长孙家正、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中国驻法大使赵进军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和法国驻华大使菲力普·盖吕、中法文化年委员会法方主席让·皮埃尔·安格勒米、法国凡尔赛宫主席克里斯蒂娜·阿尔巴内尔等法方随行人员300余人出席了开幕式。在中法双方官员及筹展专家

的陪同下，两位总理亲临午门现代化展厅一起参观展览，共同感受法国路易十四时期（1661—1715年）历史、文化和艺术的独特魅力。

展览参观结束后，法国总理携夫人及随员一行又在文化部部长孙家正、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等领导的陪同下参观了故宫三大殿。

中法两国总理共同登临午门展厅，为《太阳王路易十四——法国凡尔赛宫珍品特展》揭开了序幕，再次见证了中法两国之间的深厚友谊！

展览于5月1日正式对外展出。

揭开“舍利”谜底 国宝重器“五一”光耀世纪坛

2005年4月26日——6月15日，由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政府共同主办的“中华的文明——世纪国宝展Ⅱ”在中华世纪坛展出，在世纪坛举行了开箱仪式。

主办方负责人介绍：此次《国宝展Ⅱ》共171个目录213件展品，这些展品汇集了中国15个省市（自治区）近50家文博单位。

展览规模，体量之大，展品等级，品质之高可谓空前。

2000年的世纪国宝展，既是中华世纪坛的第一个展览，也是国家文物局与北京市政府的首次合作，是国宝级文物在国内博物馆的首次大规模集中展示。内容主要由考古实物组成，文物时间从公元前5000年至唐朝，

共 141 件，展出的文物在教科书、新闻报道上都有见到，并且是早已发掘出来的，许多专家和学者对文物都有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时隔 5 年，中华世纪坛应观众响应举行“中华的文明——世纪国宝展 II”，这是对 2000 年国宝展的品牌延续，因为中国许多国宝级的文物都分散在各个省市级博物馆，而在国家文物局与北京市政府的共同促成下，再次

为普通的观众们提供了近距离欣赏国宝的机会，将成为北京市文物展览中的重要品牌。

另有消息，世纪坛向公众承诺，今后将每 4 年把全国重要的考古新发现做一次集中的展示，力争全部都是未和观众见过面的考古新品，展览内容都将包括两个主线：一个是以中国 5000 年历史中的线索为主题，一个是 4 年中新发现的国宝级文物。（阿为）

大型艺术展览《激醒——中法艺术的碰撞与融合》在京举办

大型艺术展览《激醒——中法艺术的碰撞与融合》于近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该展览得到了法国文化年组委会的大力支持与协作，拓宽了中法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其在展览模式等方面的创新让人耳目一新。

展览共展出来自 60 余位不同国籍、不同艺术领域的艺术家的作品，展示了从 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装饰艺术风格直至今日装饰艺术、纯艺术以及生活方式的展品共计 300 余

件。此次展览，不仅探讨了中法两国间、东西方之间在“过去、现在”阶段的文化交流，更注重探讨与展望其在未来阶段的文化交流。展出前一周，未作任何的说明，作者是谁也不标出，由观众自己猜测、揣摩；时装设计同美术及装饰艺术被揉合在一起，从而驳斥了美术高于装饰艺术这一传统偏见。

（中国美术馆）

“2005 毕加索北京艺术大展暨毕加索时尚艺术季”在京展出

作为深圳、上海之后的中国巡展第三站，“2005 毕加索北京艺术大展暨毕加索时尚艺术季”将在北京皇城艺术馆展出两个月。

该艺术大展是迄今为止毕加索原作在亚洲地区最大规模的展出。参展作品包括毕加索的 265 幅版画、水彩画原作。

“国际华人诗书画印艺术大展”在京举行

由中国画研究院、文化部文化艺术人才中心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国际华人诗书画印艺术大展”，于 4 月 17 日在北京中国画研究院美术馆举行了获奖作品展开幕式，获奖作品集首发式同时举行。当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有关方面的领导、海内外获奖作者代表以及在京的书画家、诗人 500 余人出席了系列活动。

本次大展共收到 40 多个国家 8 万余件诗书画印作品，共有 822 件作品获奖，代表了当代国际华人艺术家创作的较高水平。

这次展览是一次规模大、阵容强、影响广、作品水平高、学术含量精的国际大型艺术活动，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为弘扬祖国传统文化、增进海内外文化交流、展示华夏儿女精神风貌、推动中国文化艺术事业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文物拍卖管理暂行规定

2003年6月19日经国家文物局第21次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

发文单位：国家文物局

发文时间：2003-6-19

生效日期：2003-7-14

第一条 为加强对文物拍卖的规范管理，保护祖国历史文化遗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制订本规定。

第二条 以下列物品为拍卖标的的拍卖活动，适用本规定：

1、1949年以前的各种艺术品、工艺美术品；

2、1949年以前的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

3、1949年以前，反映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

4、1949年以后，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实物；

5、1949年以后，国家文物局公布的列入限制出境范围的中国已故著名书画家作品。

第三条 依法设立的拍卖企业从事本规定第二条所列文物拍卖活动的（以下称文物拍卖企业），须经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向国家文物局申请文物拍卖许可证。

第四条 申请文物拍卖许可证时，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1、拍卖企业设立时，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拍卖行业管理部门的审核许可文件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注册资本的验资证明；

3、5名以上取得高级文物博物专业技术职务的文物拍卖专业人员的资格证明材料；

4、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核意见。

第五条 国家文物局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决定批准的，发给文物拍卖许可证；决定不批准的，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文物拍卖许可证不得出租、出借或转让。

第六条 从事文物拍卖的专业人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并取得文物拍卖专业人员资格：

1、熟知国家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2、具备一定的文物保护知识和鉴定能力；

3、具备一定的文物拍卖运作知识和能力。

第七条 文物拍卖专业人员资格由国家文物局认定。经认定合格的，发给文物拍卖专业人员资格证书。

第八条 国家文物局对取得文物拍卖许可证的拍卖企业和取得文物拍卖专业人员资格证书的人员进行年审。

第九条 文物拍卖企业应当在每年三月底之前向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报送年审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根据企业经营情况和文物拍卖专业人员从业情况提出初审意见后报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局作出合格或者不合格的年审结论，并发布公告。

第十条 文物拍卖企业拍卖的文物，在拍卖前必须经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审核。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审核拍卖标的时应当征求有关文物专业机构或专家意见。不能形成一致意见的，应当报国家文物局审核。

文物行政部门不负责文物拍卖标的出具真伪鉴别证明或价格评估证明。参加文物拍卖标的审核的专家,不得在文物拍卖企业任职。

第十一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在拍卖公告发布日15日前将拍卖标的资料及审核意见报国家文物局备案。

第十二条 下列文物不得作为文物拍卖标的:

- 1、依照法律应当上交国家的中国境内出土的文物;
- 2、依照法律应当移交文物行政部门的文物,包括国家各级执法部门在查处违法犯罪活动中依法没收、追缴的文物;
- 3、银行、冶炼厂、造纸厂以及废旧物资回收单位拣选的文 物;
- 4、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以及其他国家机关、部队和国有企业、事业组织等收藏、保管的文物;
- 5、国有文物购销经营单位收存的珍贵文物;
- 6、非国有馆藏珍贵文物;
- 7、物主处分权有争议的文物;
- 8、其它依法律法规规定不得流通的文物。

第十三条 文物拍卖企业为使竞买人了解文物拍卖标的是否准许携运出境,可事先征求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意见。买受人如将文物携运出境,须依法另行办理文物出境审核手续。

第十四条 文物拍卖企业在境外征集的文物拍卖标的,携运入境时,应向海关申报,经海关将文物加封后,交由当事人报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办理临时进境手续。临时进境

文物在境内的滞留期一般不超过十二个月,如有特殊需要,应当办理延期手续,延期不得超过六个月。

第十五条 来自境外的文物拍卖标的拍卖成交后需要出境时,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按国家有关私人携带文物出境的规定办理手续:

- 1、买受人为境内公民或法人的;
- 2、在境内滞留时间超过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期限的。

第十六条 国家对文物拍卖企业拍卖的珍贵文物拥有优先购买权。国家文物局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部门可以要求拍卖企业对拍卖标的中具有特别重要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文物定向拍卖,竞买人范围限于国有文物收藏单位。

第十七条 文物拍卖企业应当在文物拍卖活动结束后30天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内容,将该次文物拍卖记录报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部门备案。国家优先购买的文物的拍卖纪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部门报国家文物局备案。

第十八条 文物拍卖企业未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部门批准,不得利用互联网举行文物拍卖活动。经批准可以利用互联网举行文物拍卖活动的文物拍卖企业,在开展文物拍卖活动时,应当遵守本规定的规定。

第十九条 文物拍卖企业违反本规定的,由文物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书。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首都博物馆 3 月—4 月动态

3 月 1 日—3 月 10 日，是我馆招收讲解员报名的时间，截至 3 月 10 日，培训班报名 303 人，通过面试 225 人。3 月 15 日—16 日我馆对这些人员进行了初试，经考评小组严格评审，225 名入围者中 60 人通过初试，进入复试。3 月 23 日，培训班复试入围考生 58 人，实考 52 人。经初试、复试有 29 名被录取，4 月 11 日起，我馆对这些学员开始进行讲解员培训工作。当天，首先由社教部主任介绍培训班管理章程、培训班学员守则、预备期培训的课程；然后，由每个学员做简单的自我介绍及阐述为什么想做讲解员。最后，由韩永馆长为培训班讲第一课——介绍首博的沿革及发展。讲解员的军训结束，进入技能培训。我馆外请了朱祖希、于延俊等专家，给讲解员进行职业道德、北京通史、礼貌礼仪、英语口语等方面的培训。

3 月 7 日，我馆与北京市规划展览馆进行了奥运会会旗、残奥会会旗、奥运会会旗复制品、残奥会会旗复制品的交接工作。首博接收北京市规划展览馆移交的奥运会会旗、残奥会会旗。与此同时，首博将奥运会会旗、残奥会会旗的复制品 B 号旗交北京市规划展览馆。交接工作由市政府同志、北京规划展览馆馆长赵莉、首博王武钰副馆长等同志共同完成。

3 月 11 日，北京市秘书长孙政才、中央督察组吴振钧等一行 16 人来我馆视察，陪同的人员还有：北京市旅游局局长于长江、市文物局局长梅宁华和首博馆长韩永。中央督察组人员首先听取了韩永馆长汇报“首博新馆工作情况”、王武钰副馆长汇报“首博文物藏品情况”，之后，又对馆藏文物进行了鉴赏并参观北京孔庙。

3 月 22 日，美国纽约华美协进社下属中国美术馆馆长海蔚女士到我馆参观、交流，韩永馆长进行了接待，双方就展览交流、人员培训等问题进行了友好协商。下午，海蔚女士又观赏了馆藏部门民俗文物。

3 月 23 日下午，在党总支书记崔学谕同志的布置，首都博物馆与国子监全体党员分为两个小组进行了“关于党员先进性教育“回头看”的重要性的必要性的认识”的讨论。

3 月 29 日，接待山西省博物馆一行 10 人来馆参观。

3 月 31 日，我馆召开了首博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17 名职工代表（实有 19 名）参加会议，20 余名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列席会议。会议通过了 2005 年工作报告和年度预、决算报告，同时收到并通过 6 类 15 条议案。本次职代会一大特点是：配合首博党员“保先”教育活动，利用职代会这条与群众沟通的渠道，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充分发扬民主。

4 月 21 日，首博党员“保先”教育活动第二阶段结束时，我馆还将继续召开党总支在职代会范围内公开反馈的意见。

由首都博物馆、广东美术馆、英国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中国文物学会文物摄影专业委员会、中国博物馆学会博物馆数字化专业委员会、瑞士爱玲珑公司共同举办的，并邀请英国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影像公司总经理 Andrea Stern，安德里亚·斯特恩女士，出版部主管 Mary Butler，玛丽·巴特勒女士联合主讲的“博物馆数字化推广之博物馆影像版权管理与经营”培训班，于 2005 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2 日在首都博物馆进行。举办方希望通过培训，为国内的博物馆和美

术馆带来影像版权管理及经营的未来先进经验，并以此促进全国各馆之间的友好交流和文化合作，使中国的博物馆业迈向新的知识领域！

4月7日，在我馆举行了“孔庙暨国子监古建修缮工程开工仪式”，市文物局梅宁华局长进行了讲话，施工人员、工程设计人员及几家新闻单位参加了此次仪式。

4月7日~10日，我馆组织全体党员进行第二阶段“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集中剖析评议，整个过程包括学习动员、观看反腐败案件录相、党员个人写剖析材料、支部民主生活会通过个人剖析材料、个人材料交党总支这五个环节。

为新馆的开放，我馆还在加紧做着展陈文物的借展、复制、索回工作。

4月20日，举办了“北京智化寺音乐光盘首发式新闻发布会”，由智化寺82岁高龄

艺僧张本兴老人代表北京文博交流馆向北京收藏家协会捐赠智化寺音乐光盘珍藏版，北京收藏家协会常务理事、著名火花收藏家李福昌代表协会接受捐赠。

4月26日，首博职代会第二届三次会议继续在我馆召开，市文物局工会刚杰副主席出席并对会议的成功召开表示祝贺。我馆工会王武钰主席总结了本次职代会为配合党总支进行党员保先教育所做的工作：征集了6类11条议案并做出决议；通过召开职工代表、群众、党员不同层次的座谈会、下发各种征求意见的表格和意见箱等不同形式共征求76条意见，分别为：领导班子及成员28条、党总支29条、普通党员19条。之后，崔学谕书记就上述意见分两部分做了反馈：①代表馆领导班子和党总支通报了首博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反馈及整改方向；②通报本届职代会决议承办部门的意见。

首都博物馆新馆工程进展

1. 行政办公楼、地下室：新风机房、卫生间以及13.5m办公楼以上机电专业安装；地下室库区、指示通道开始逐步收尾。冷冻机房、泵房到25日土建局部开始施工。

2. 礼仪大堂：御道石材铺装；电子大屏幕结构焊接接近尾声。

3. 北广场：御道砼垫层完成。计划28日文化休闲广场土方施工（包括混凝土垫层）完成。园林进场施工最迟不超过28日，目前正在做管线配合。

4. 公共区域：东、西平台铝板龙骨焊接安装基本完成，铝板包梁、包柱以及新燕龙骨安装已接近尾声；筑邦西平台吊顶灯槽已做2层；地下室墙面龙骨再有7天焊接基本完成；在7天之内进行-6.3m扶梯的安装；青铜门套开始安装。

5. 机电：有关通风、空调水除大堂消音器外其余施工基本完成；冷冻机房、新风机房正在抢工；电气穿线、配管基本完成。

6. 行政办公楼：完成东侧四、五层楼地面铺砖和西侧二~四楼地面铺砖，管线安装及

吊顶安装进展不大，门窗安装未开始，已完成5间卫生间地面铺砖，办公楼东西侧机房装修均未全部完成。

7. 地下部分：各机房装饰工作未能完成仍在收尾，库区地面继续进行修整工作，无明显工作进展。完成职工食堂和武警食堂的地面铺砖。完成库房三防门安装后的初步验收。

8. 礼仪大堂及公共空间：对大厅内已铺装的御道青白石进行了表面磨平处理。牌楼安装已组织面瓦到场，准备施工。完成地下一层B轴石材墙面的龙骨安装，已开始石材安装。铝板包柱除斜拉索部位其余已基本完成，平台内铝板包梁完成过半，序厅墙面装饰开始施工。液压梯井道钢构施工结束，组织设备到场。

9. 北广场：完成80%御道石材铺装，开始广场西侧步道的地面铺装，地面铺装工作虽有进展但仍比较缓慢，目前已基本完成北广场的绿地分隔条施工和地面平整，大面积作业条件已逐步形成。

10. 1#临时展厅钢结构吊点焊接28个；

2#临时展厅钢架吊点焊接,主钢梁预拼接二条,主钢梁安装一条(7轴8轴间),隔墙封单面双层石膏板;13#临时展厅吊顶主龙骨安装已完成;)1#临时展厅钢架场外制作已完成45%;1#临时展厅钢架吊顶化学锚栓安装已

完成;2#临时展厅吊点焊接安装已完成85%;1#、2#临时展厅隔断龙骨安装已完成;通史二层已完成样品展柜安装;通史二层铝板墙面样板安装。

